

高唐文史资料

15

海内外高唐人考辑

政协高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高唐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海内外高唐人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高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高唐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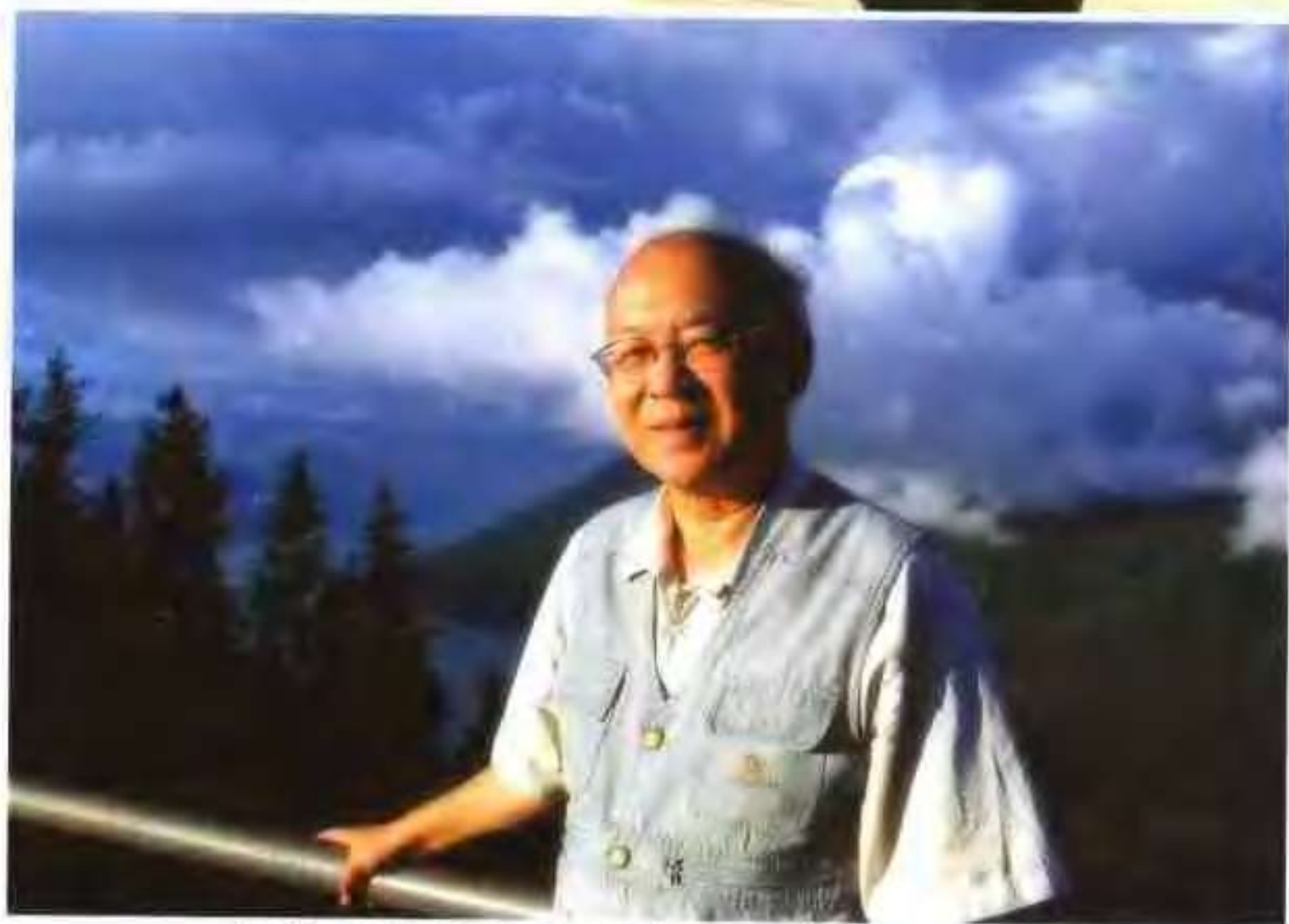
第十五辑

(海内外高唐人专辑)

大 32 开本 7.5 印张 140 千字

印数:2000 册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中科院院士张新时在野外考察生态环境



张玉泉先生行医照



台胞张玉泉、梁笑梅夫妇在其家乡捐建的举仁小学院内

张兴华先生近照



张兴华先生（中左）在上海静安医院向干部进修学员
布置工作（1980年）



阎韵清老师正在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喜迎建党
八十周年
图展
阎韵清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副总编辑时的刘野（1990年）



刘野在香港《瞭望》周刊海外版出版时答记者问（1985年）



姜志民（中）在基层采访（1978年）



姜志民（右一）指导记者修改稿件

杨文彩近照



高级工程师杨文彩（左一）在适航研究和管理工作会议上



作家李怀仁近照



任新华社军事记者时期的张春亭（1979年）



张春亭在《瞭望》周刊驻香港办事处工作



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



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李兴诗

林业专家宋玉河近照



气象专家张世昌近照



张世昌（左）在农业生产一线指导科学实验



戏曲音乐家苏智



彭玉奎近照



北京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彭玉奎在工作



高级工程师白若景在制导雷达设计审定会上



白若景在调试地炮雷达天线



窦希贵（左）在话剧《大海作证》中扮演林彪



窦希贵在曲艺学习班上授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级工程师常庆之在计算机房工作（2000年）



常庆之在实验室（2002年）



原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北京市经协办主任郑焕明



烤鸭圣手李兴禄



航天科研工作者孙泰仁

陈洪德近照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教授陈洪德为病人诊断病情



李遵林近照



地质工作者李遵林在西藏

田兰身近照



高级工程师田兰身在可控硅供电装置一角（1986年）



王富仁教授近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在书房



作家韩英珊



张廷禄近照



济南国贸大厦副总经理张廷禄（左一）在主持全国企业文化研讨会（1997年）

特级试飞员姚月福近照



姚月福在“运七”飞机上



山东金珠粉末注射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华涛



内蒙古著名民营企业北方建设
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方庆



目 录

- 国际国内著名生态学家张新时院士 张春亭(1)
- 海峡难隔游子情 郑宽亭(10)
- 我所了解的张兴华先生 王 琴(16)
- 化作春泥更护花
——记把爱心献给孩子们的离休教师阚韵清
..... 文史科整理(20)
- 刘野自传 刘 野(28)
- 苦孩子的幸福人生 姜志民(36)
- 我的创作道路 李怀仁(44)
- 在航空工业战线上 杨文彩(51)
- 从贫苦的农家子弟到新华社记者 张春亭(62)
- 生物物理学教授李兴诗 刘刚整理(75)
- 矢志不渝 献身气象事业
——记山东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张世昌
..... 刘 刚(80)
- 游子魂系乡土风 苏 智(86)
- 林业专家宋玉和 文史科整理(97)
- 机会与动力 彭玉奎(99)
- 国防工业一兵 白若景(106)
- 我的艺术之路 窦希贵(113)
- 常庆之传略 文史科整理(117)

激流勇进改革者

——记“十三大”代表、原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郑焕明

- 王琴整理(122)
- 在攀登航天科技高峰的路上 孙泰仁(133)
- 我的成长道路和点滴体会 陈洪德(144)
- 边陲往事 李遵林(152)
- 幸运人生 田兰身(158)
- 烤鸭圣手李兴禄 张春亭(165)

情系学海半生涯

——记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

- 曹志娟 吴 亮(178)
- ## 白霜冷月凝秋菊
- 略述我的创作历程 韩英珊(187)

商海弄潮人

——记济南国际贸易大厦副总经理张廷禄

- 文史科整理(200)
- 三十年飞行蓝天路 姚月福(206)
- 故土乡情 育我成人 金华涛(221)

潮头创业者

——记内蒙古北方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方庆

- 郑宽亭(226)
- 后 记 (235)

国际国内著名生态学家张新时院士

张春亭

虽然张新时并非在山东省高唐县出生,但迄今为止,他却是祖籍高唐县唯一一位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知名人物。

说到张新时院士首先应该谈谈他的父亲张静愚先生,他便是最早从高唐县城出去的唯一的一位民国初期的头面人物。张静愚 1894 年出生于高唐县城关镇南街一个士绅家庭。他在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生预备学堂毕业后,回高唐县中教学一年,后应招前往英国,享受公费进入利物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学习。1924 年结业回国,先后任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广东航空局业务处长、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处长兼海军处国民党代表。1928 年任国民政府北伐军航空队司令,参与北伐战争。1929 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署中将署长,实际上就是空军总司令。北伐战争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外语教官。1932 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总政治训练处长。不久,改任河南省建设厅长、省委委员。1940 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全国税务署署长。1946 年为“国大代表”。1948 年为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 年去台湾,先后任“经济部”次长,台湾

因而积累了许多业务知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新时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被抓住把柄,打成一个什么“分子”。就是这样,也有几次到了“反革命”的边缘。“文革”中期,有人写大字报,说张新时的父母在美国。张新时看了觉得好笑,心想:“说他们在台湾还嫌不够,还要说在美国,看来又升格了。”他心中又好生紧张,但过后并没有出什么事儿。“文革”中,他曾听说当年在延安党中央是不同意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有一次野外考察,他在帐篷里对人谈起了此事。不料后来就有人写大字报揭发了他,结果又遭到了批判和斗争。他的上述言论被上纲上线,成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论”,他也险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1971年林彪暗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当时政治运动的矛头立即转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方面,张新时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才被一风吹了,因而他也得以脱身。他的妻子慈龙骏不仅跟着他到新疆去受苦,还一天到晚跟着他担惊受怕。但她对自己在婚姻方面的选择始终无怨无悔。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国家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张新时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直至这时,组织部门仍然不敢相信他。有一次,张新时要求到西藏去作科学考察。因为他要去的地方位于中印边界,所以组织部门要对他进行政治审查。一天,张新时正和八一农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梅生谈话,恰巧组织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走

凡经过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那时最注重阶级成分,加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像张新时这样,本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儿子,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被怀疑的对象。但就在大学时代,有位比他低一年级的安徽籍女大学生慈龙骏却愿与他交友。此时,慈龙骏已是共产党员,学校原本选她做留苏预备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后来党组织找她谈话,告诉她,如果她和张新时继续保持关系,将会影响她的前途。但她怎么也割舍不了她对张新时的感情,结果,连留苏预备生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张新时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大学农林系任森林教研组主任、助教,慈龙骏也到了新疆,并和张新时结了婚。刚参加工作不久,张新时便承担了三门功课的教学任务。从做学生,到当老师,除了讲课,就是备课,课外活动很少。张新时曾开玩笑地对人说:“当了一年多的教师,我觉得一下子快变成老头儿了。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学校也应该给予培养和提高才是。就是一头老黄牛,也还得吃草吧。”没想到,在1957年反右派时,就是这几句调皮话,竟被人揭发出来,受到批判,被上纲上线为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多亏张新时有个好朋友,提醒他要主动做检查,他照此办理,才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9年,张新时又被调到新疆八一农学院林学系任教研组主任、助教。当时没有考察队,他便和别人一起到野外去考察森林和植被,每年总要在野外考察三四个月,

因而积累了许多业务知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新时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被抓住把柄,打成一个什么“分子”。就是这样,也有几次到了“反革命”的边缘。“文革”中期,有人写大字报,说张新时的父母在美国。张新时看了觉得好笑,心想:“说他们在台湾还嫌不够,还要说在美国,看来又升格了。”他心中又好生紧张,但过后并没有出什么事儿。“文革”中,他曾听说当年在延安党中央是不同意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有一次野外考察,他在帐篷里对人谈起了此事。不料后来就有人写大字报揭发了他,结果又遭到了批判和斗争。他的上述言论被上纲上线,成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论”,他也险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1971年林彪暗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当时政治运动的矛头立即转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方面,张新时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才被一风吹了,因而他也得以脱身。他的妻子慈龙骏不仅跟着他到新疆去受苦,还一天到晚跟着他担惊受怕。但她对自己在婚姻方面的选择始终无怨无悔。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国家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张新时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直至这时,组织部门仍然不敢相信他。有一次,张新时要求到西藏去作科学考察。因为他要去的地方位于中印边界,所以组织部门要对他进行政治审查。一天,张新时正和八一农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梅生谈话,恰巧组织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走

来,请示孟书记能不能让张新时参加考察。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党委书记高声地说道:“张新时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还不能相信他吗?”于是,组织部门马上盖章通过。这时,压在张新时身上几十年的那个大包袱才算被甩掉了。

在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张新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音信皆无。那时,他不敢去打听,也不想去打听。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中美恢复邦交正常化后,张新时才耳闻他的父母真的在美国,但是彼此依然没有书信来往,更没有电话联系。直到1978年,他才和父母取得联系。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为张新时一家办理了赴美探亲、移民的手续。经学校领导同意,张新时决定前往美国探亲。在他办理出国手续期间,孟书记关切地对他说:“手续要快办,越快越好,早去早回。”同年12月底,张新时便偕同女儿、儿子飞往华盛顿。亲人相见,顿时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然而,张新时并没有被这幸福所陶醉,他很快便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在美国进修深造。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是四十四岁、拖儿带女的中年人,但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此时不学,更待何时?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非常赞成和支持他的想法。经与康奈尔大学怀特克教授取得联系,以新疆八一农学院林学系系主任、副教授的身份,他成为康奈尔大学生态学与系统学系客座教授,从事生态学研究。1981年转为博士研究生,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与研究,他终于在1985年五十一岁时获得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博士学位。

张新时取得博士学位不久,便于 1986 年 2 月返回祖国,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并被聘为研究员。1990 年任该所所长,并主持信息生态学研究室的工作。1991 年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在植物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连任两届,1998 年卸任。期间,他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至 1999 年。

大学毕业四十多年来,张新时一直从事我国高山、高原、荒漠与草原植被地理研究。1956 年至 1978 年,他先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队、新疆八一农学院对新疆(中亚)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天山山脉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山地植被和荒漠的考察与研究;1974 年至 1976 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于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地区的考察;1986 年至今,又主持了中国高山植被垂直带系统、中国西部沙漠——绿洲生态系统、内蒙古半干旱地区荒漠化控制和中国 SCOPE—ENUWAR 项目专题等数十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

1999 年 12 月 16 日,张新时又被正式聘请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此之前,他正在野外参加一个科研项目,北师大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史培军专程到黄土高原向他表达了该校的诚聘之意。张新时院士欣然接受聘请,随后便参加了由该校承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 项目”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研项目,其子项目就有 100 多个,其中仅“草地与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重建机理及优化生态生产范式”一个项目,国家即投资 3000

万元。张新时就是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近几年来,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已达 100 余篇,专著若干部,应邀在国内、国际学术会上作报告多次。他主持与合作主持的“中国植被”、“青藏高原植被研究”、“毛乌素沙地乔灌木沙地质量评价”、“新疆植被及其利用”等项目分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创作的科普片剧本及其科教片《西藏的高山植物》获贝尔格莱德国际大众科教片金奖;他还曾荣获新疆八一农学院杰出科教工作者、新疆第一届科学大会杰出科研工作者及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张新时提出了高原地带性的新论点、青藏高原对中国植被的作用、中国气候——植被相互作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理、格局与动态等一系列新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许多研究成果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科学决策依据,而且对国际生态学经典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与完善,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近二十多年来,张新时院士还致力于信息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他是我国数量植被生态学和国际信息生态学研究的创始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植被数量开放实验室,开发了计算机应用程序用于生物和环境数据的多元分析和模拟,在生态信息系统、退化草原生态系统恢复、荒漠化治理和全球

环境变化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使中国生态学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并使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构建了覆盖中国关键生态区的两条陆地生态样带。目前这两条样带已成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样带,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推动了国际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GCTE)和陆地样带(NECT)的研究。张新时院士因而也成了国际著名的生态学家。

张新时院士的现任学术、团体职务和荣誉称号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生态学会理事长、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常务理事、IGBP中国委员会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顾问、中国自然资源学会顾问、《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中国植被图》主编、《植物学报》和《植物生态学报》名誉主编、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和兼职教授等职。

张新时先生自大学毕业四十六年来,除赴美深造七 years 外,几乎每年都要用五六个月的时间在沙漠高山地带考察。仅2001年他便三赴新疆、两赴内蒙古、一次去陕甘宁黄土高原考察;2002年已两赴新疆、一赴黄土高原考察。同年9月5日,记者采访张新时院士时,适值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前夕。9月8日这天,既是北师大校庆之日,恰恰又是原新疆八一农学院(今新疆农业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之际。尽管北师大百年校庆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张新时还是决定赶赴新疆出席新疆农大五

十周年校庆。一是因为该校毕竟是他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学校,二是他参加完校庆活动后,即于9月10日赴南疆罗布泊进行生态环境的考察。谈到常年在野外考察苦不苦的问题,他笑笑说;“对于我而言,过去却并不是什么苦不苦的问题,而是让不让去,能不能吃到这个苦的问题。比如前面讲过的那次去中印边境考察就是这样。作为一个从事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进行野外考察,向大自然学习,有许多实际的知识往往是从书本上根本无法学到的。所以,如果不能外出考察,反而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而若能够获准去参加野外考察,那简直就是一种最大的快乐和享受。至于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帐篷被风沙撕裂,那都是寻常事,也就不在话下了。能够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祖国,造福于人民,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海峡难隔游子情

郑宽亭

2000年10月,张玉泉先生由台湾飞回朝思暮想、生他养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唐县。他是高唐中学1925年首届招收的中学生,这次是特意赶来参加10月6日举行的建校75周年庆祝活动的。

校庆大会上,他代表老校友发言,使近五千与会学子和通过电视看到实况转播的乡亲们目睹了玉泉先生耄耋之年不见暮气的尊容,聆听了他充满游子之情的讲话,使人们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张玉泉先生1911年4月出生在高唐县尹集镇解庄村一农民家庭中,自幼聪颖好学,在家乡完成初级中学学业后,先后就读于省立高级中学理科和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毕业时获得医师及甲种公职资格。这求学的岁月,正是依赖家乡形成世界观的时期,鲁西北的玉米、母亲河的黄水滋养了他勤劳、好学、爱祖国、爱家乡的优良品德。

他挺胸的形象、昂首的行姿、响亮的语音,是他半生军旅生涯的遗风。学校生活结束后,他先后在山东省健康教育委员会任医师、济南育英中学和平原乡村师范学校任卫生教员兼校医。他满腔热忱地从事卫生教育及医疗工作,以报祖国及乡亲的教养之恩。但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他追求安定的美梦,扭转了他一边从医、一边从教

的人生轨道。为反侵略、保祖国，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日行列，开始了半生军旅的流移生活。“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誓死不做亡国奴”，张玉泉说到了亦做到了。他是位身体力行的爱国者，早在济南高中求学时，他的爱国尽忠思想就曾有充分的表露。那是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我东北，而国民政府不准抵抗，日军不发一枪一弹便垂手而得我东北三省，此举激怒了全国民众，尤其山东青年更是忍无可忍了。由省立高中和省立第一师范发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全省各地学校纷纷响应，未几便齐集济南火车站，组成了山东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当时在省立高中就读的张玉泉被推荐为请愿团纠察队负责人，参与组织了卧轨，迫使当局增派加长火车，编队后，带领3000余学子乘火车南下，到南京后协同指挥几经交涉，使蒋介石亲临请愿团表态抗日；进而，组织参加游行示威，掩护学生逃脱军警的追捕；最后在武装军警押解下，保护山东学生请愿团安全回鲁。这是玉泉先生爱国爱民、置自己险阻于度外的精神最早最集中的一次表现。

进入军营之后，张先生先后在69兵站医院、第六重伤医院、流动手术大队、208师野战医院任外科主任、专科医师、手术大队分队长、医院院长等职，在火线抢救、军中医疗、外科手术中使数以千计的抗日战士获得救治，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较大贡献，同时为军医建设费尽了心血，亦取得了突出成就，多次获得嘉奖、记功、勋奖章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任北平市第一医院外科主任、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卫生大队大队长兼野战医院院

长,他在青岛总医院任医务长及社会医学部主任时,代行院长之职,该院去台后更名为 803 医院。1949 年张先生随医院迁居台湾,筹建容有 2700 床位的肺病疗养院,先后任肺病疗养院院长、804 总医院副院长、代院长、805 总医院院长、军医署研究发展室主任等职。1967 年因年高他以少将级职退出军营,期间曾获国民政府颁授的“忠孝传家”匾额。

退役后,他虽年近花甲,但精力充沛,遂被聘为台湾电力公司医师,为大甲溪三所水利电厂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十多年后,他以公务员身份在台湾电力公司再次退休。此时的张玉泉仍然耳不聩、眼不花,步履矫健,思维敏捷,尚愿发挥余热,继而受聘为中国医药学院校医。在此,他努力工作,成绩优异,两次获银质奖章。1994 年秋,八十二岁的玉泉先生第三次退休离岗。

纵观玉泉先生的人生道路,还有两大特点不能不说。

其一为学而不厌。他的口头禅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工作中要学习,工余时要进修,终生学习,永不休止”。年幼在家时从不懒惰,拔草喂牛、养猪、放羊、拾粪、耕田、锄地、驾车,无所不学,无所不做;在校求学时,除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外,篮球、网球亦称能手;工作之后在实践中,除向同事学习外,还借休假之时赴美进修。本为外科医师,经学习,又掌握了肺病的防治方法,他曾任肺病疗养院院长。在任军医署研究室主任时,为军医法规和有关制度的订立做出了贡献。退休后还在针灸、基因、干细胞等方面进行学习了解。年过八旬,他又学会了使用电脑,

为进一步学习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另一特点是不忘民众、牢记家乡。他在高唐一中 75 周年校庆大会的讲话中说道：求学的目的是“造福人群”，“良知以求正心”，“克己勿忘助人”。他青年时期曾排除万难，赴南京请愿；在山东省健康教育委员会任医师时，重点解决了学生的砂眼问题；后在军队中的医疗工作中，除加班加点为战士解除伤病痛苦外，在 804 总医院和 805 医院任院长时，因地方医疗机构设备简陋，便开设民众诊疗处（部）和社会医学部，亲自出诊，为民众医疗服务，颇获地方民众好评。

他不忘民众更牢记乡亲。1987 年 4 月，由台辗转返抵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得知村内无小学，儿童入学要远走他村，故村内仍有不少辍学儿童，遂生捐建小学之念，同时想借此举，使乡情传递下代。回台后，他号召全家节俭集资，由玉泉先生长女曼琳两次回乡与县政府协商，决定捐资建校。于是他亲自伏案设计，组织亲友监工，能容 500 名学生上课的设施齐全的学校施工奠基仪式于 1997 年 3 月举行，前后他共投资 5.5 万美元。当年 9 月 9 日学校全部竣工后，由张庄乡政府验收接管。玉泉先生为念其父连举公生前重视教育，其师解仁甫先生启蒙之恩，撷取名字中各一字组成校名，提请当时县长张延安裁定为“举仁小学”。此名并含有举发仁爱精神之深刻含义。

玉泉先生已年过九旬，赤子之心永驻青春，亲情乡情与日俱增。他的奋斗精神时空不能限，早在故乡生根；他的光辉事迹海峡阻不断，已为两岸传颂。他曾撰《怀乡

咏》二首，可见乡情之浓，现录后：

怀乡咏

(一)

别乡流离六十年，
朝思暮想回家转。
虽然海峡相隔绝，
怀乡情丝斩不断。
一朝破空返故里，
拜谢亲友了心愿。
亲朋好友相见乐，
互叙别情说不完。
我敬重的乡亲呀，
您的关怀比地广。
我亲爱的师友呀，
您的教诲比天长。

(二)

我的家乡多可爱，
田野肥沃又广旷。
亲戚朋友真和气，
父老兄弟都慈祥。
村里虽没大花园，
白杨垂柳绕村庄。
住房虽非高楼阁，
四合院落最舒畅

我敬重的乡亲呀，
您的恩惠比地广。
我亲爱的故乡呀，
您的风光比天长。

我所了解的张兴华先生

王 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张兴华先生给高唐县委统战部来信，信中流露了他晚年深切思念家乡和迫切回家的愿望，并说到由于父亲张静愚是国民党北伐时期的高级将领原因，他了解早期国民党组织在高唐活动的一些历史情况。我从事文史工作十几年，知道这是高唐历史的一个空白点。有关高唐国民党组织及其活动的情况，1936年编修的《高唐县志稿》曾有过记载，但由于日寇入侵，修成的县志稿未付梓便流失，后落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邓协忱手中，邓的属下曹英瑾为了掩盖国民党及他本人的历史，在印刷前将志中有关介绍国民党的第五册第七卷中“政治志·党务”全部撕毁。1986年失而复得又重印的《高唐县志稿》无此记载，政协文史科和县政府史志办公室十几年来收集到的有关国民党的史料也是“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张兴华先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人。我按照统战部提供的地址，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即给张先生去信，没想到张先生很快回信，信中字里行间都能看出老人对离别七十年的家乡的思念，我为之感动。对我提出的要求，张先生表示愿意就他所知道的情况写一篇回忆文章，没多久，他就寄来了《高唐县国民党初期发展及活动情况》的初稿。看了他的

文章,真是佩服之极,先生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记忆惊人,很难相信此稿件出自一位耄耋老人之手。后来他又用文笔介绍了一位早期高唐人物张学诚,为此我们多次通话、通信。为了资料的完整、真实、准确,先生多次来信,补充或纠正文章中的说法,甚至连错别字都一一纠正,后来又将修改后的二稿寄来。先生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为我所敬佩。从来信及电话中得知先生一直在等待他的儿女抽空陪他回乡。2000年10月高唐一中举行建校七十五周年校庆,终于促成了他的高唐之行。

初次见面,我不敢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位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声音洪亮的老人已年近九旬。当我问及在高唐的活动时间安排时,他说除参加一中校庆安排的活动外,他到高唐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去烈士祠拜祭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的同事、朋友,我县最早的共产党员金谷兰烈士。交谈中,我对张兴华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张兴华先生,字梯云,1912年出生于高唐县高唐镇南街,自幼读书,1925年8月考入高唐县立中学前一级,1928年7月毕业,遂考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1932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修业五年,1937年7月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遂报效军旅,任军医,后任贵阳市卫生局防疫统计科科长、中央卫生实验院医师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山东,任省卫生处技正兼省会卫生事务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上海市卫生局技正、上海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教师、上海市卫校(后改上海医专)卫生学科主任、上海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教研组主任、上海

第二医学院和南通医学院教师等职,1971年退休,现住上海,享受教授待遇。

在他退休前三十多年的医学实践中,他为我国的早期卫生事业,特别是卫生统计和生命统计工作的开展做出了一些成绩。1938年到1941年,他在贵阳市卫生局防疫统计科从事生命统计工作期间,著有《贵阳市生命统计工作分析报告》,曾在昆明中华医学会年会作专题报告,并登载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当时贵阳是抗战时期唯一开展卫生防疫和生命统计工作的省会。1941年至1946年,他在卫生署下属的卫生实验院任职,又在璧山县创办乡村生命统计工作,著有《璧山县乡村生命统计工作汇报》,在当时国民政府卫生署主办的杂志《医育》上刊登。1950年他在上海市创办蓬莱区生命统计实验区及宝山县乡村生命统计实验点。他搜集整理的的数据资料,填补了当时我国卫生工作的空白,受到了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和赞许。生命统计工作与人口健康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历年搜集整理的我国历代人口资料以及世界各国人口资料,具有现实意义和科研价值,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生命统计和卫生统计工作受到了社会的全面重视,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国策以及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水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2年他开始在上海卫生学校(1958年改为上海市医专)及医专任学科主任。上海是建国初期我国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培训基地,张兴华先生在担任学科主任、负责学科工作的二十年间,为上海市及全国各地培训了大

批卫生统计专业人才,充实了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机构。他的著作有:《卫生统计图表制作》、《计算机的应用》、《保健组织学》等。

他受卫生部委托组编中专卫生学校专业教材,他主编的《儿童少年卫生学》(中央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57年作为全国卫生中专学校统一教材。1952年他主编的《卫生统计学》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南通医学院应用教材。

另外,他撰写的有关上海市居民卫生情况调查及上海市儿童生长发育等十余篇报告及论文,均刊登在上海市卫生局主办的《上海卫生》杂志上。

在那个论出身和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张兴华先生虽学富五车、医术精湛,但由于出身和台湾关系等原因,始终没有被重用,他只能小心翼翼、默默无闻地钻研业务,做好教学工作,环境不允许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1971年即退休赋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重视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他感到生命的春天来到了。1979年,他被上海卫生干部进修学院聘为顾问,负责教研工作,并带班教学。但随着年龄的增大,长期教学已感力不从心。1983年他又参加了上海静安区政协办的老年医学会,当选为学会副理事长,仍开展医学科学研究,77岁那年才退下来。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为上海卫生事业的发展 and 缓解由于“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匮乏的矛盾做出了积极贡献。如今他年事虽高,仍乐观向上,关心国家命运,关心家乡建设。

化作春泥更护花

——记把爱心献给孩子们的离休教师阚韵清

文史科整理

在陕西省宝鸡市,有这样一位高唐人,他虽年过七旬,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却仍在那里“不用扬鞭自奋蹄”,以实际行动谱写新篇章,他凭借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在关心教育青少年工作中倾注了一片痴情,做出了突出成绩。至2002年,他先后十六次被评为省、市、区关心教育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模范离休干部,被授予老有所为精英奖。中央电视台、《陕西工人报》、《各界导报》(陕西省政协主办)、《宝鸡日报》、《三秦都市报》及《中国火炬》、《金秋》杂志,多次报道刊登了他的感人事迹,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名人大辞典》,他就是宝鸡市龙泉中学离休教师阚韵清。

一 特殊应聘书

阚韵清1926年5月出生在高唐县三十里铺镇谢里长屯村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起先后在本村小学和高唐文庙小学读书,1941年考入平原县简易师范学校,当时由于日寇的入侵,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他经历了七年的流浪生活,跟随学校在安徽阜阳、陕西汉阳、四川三台、重庆沙坪坝等地求学,1949年初经地下党组织介绍,他从重

庆到陕北延安大学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参了军,修建过宝天铁路,参加过抗美援朝,1964年转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那顶莫名其妙的“特嫌”的政治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虽然浑身是劲,却一直是靠边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抬起头,挺直了腰杆,但又到了离体的年龄。他不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欣赏“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需惆怅近黄昏。”虽然头发斑白,年过七旬,仍决心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使阚韵清深深感到,青少年易受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不抓紧进行正面教育,就会出现思想迷惘,甚至误入歧途。1987年他离体时,恰逢宝鸡市金台区关心教育青少年工作委员会招聘德育报告员,阚韵清立即跑去报名,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尽点力。

当上了报告员,阚老师查历史,找资料,认真准备。他讲课认真,态度和蔼可亲,学生们都喜欢听他做报告。在头一年的工作中,他发现青少年道德滑坡现象严重,便萌生了用图片展览这种直观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念头。说干就干,他翻箱倒柜,找出以前教历史课的挂图,又找熟人托关系,四处搜集各种各类图片资料,还和新华社图片中心建立了联系,自费购买了一些图片。他又专程去北京解放军出版社购回了一套四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图片选集》。他把精心搜集来的四千多张图片

分门别类整理，裱糊在挂历上，再亲自写好前言、标题和解说词，将其中的 1500 余幅图片分为“党史系列”、“八一军史”、“抗美援朝”、“雷锋精神”、“百年沧桑”、“革命领袖光辉形象”、“延安精神”、“珍重生命、远离毒品”、“牢记百年耻辱”、“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祖国宝岛台湾”、“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反邪教法轮功”等十几个题材，内容十分丰富。他花钱买了一辆小三轮车，装上资料图片四处奔波。宝鸡市金台区的龙泉、斗鸡、金台、卧龙寺、北崖等中学他都去过，远在二三十里路以外的宝鸡县金河乡的一些小学校他也去过，宝鸡市的不少工厂、医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无论酷暑严寒、风霜雪雨，阚老师都坚持把精神食粮送到人们最需要的地方。他每到一处，都要讲我党的历史、讲我国改革开放、讲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办图片展，让青少年直观地感受到祖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真正使德育发挥了作用。他蹬着三轮车在宝鸡市、咸阳市七个县区的学校、部队、监狱、戒毒所、家属小区、公园、厂矿、医院办展览和作报告三百多场次，参观者和听报告的人二十五万多人次。他的举动受到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得到了媒体和各级领导的肯定。2001 年 4 月宝鸡市金台区文教局、关工委、老干局和科技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以阚韵清收集的图片作为教材组织巡展。

然而，他的工作刚举步时，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和机遇。

1996年12月的一天清晨,当阚韵清将400多幅爱国主义教育图片捆在自行车上,踏着白霜迎着寒风来到十几公里外的金河乡后桥小学时,迎接他的不是笑脸,而是猜疑和审视。师生们以为他是来学校推销商品的商贩,连拉带拽地将他推出校门。经解释说明来意后,学校当即决定停课,让师生参观图片展览。参观的场面感动了金河乡干部,他们又联系了两所学校,让阚韵清为师生又做了两场图片展览和报告,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在拓展延伸。

岁月不饶人,同志们见他这样辛苦,担心他受不了,劝他量力而行,保重身体,就近开展活动,不要跋山涉水地四处奔波了,他却感到在宝鸡的活动“吃不饱”,委托记者、朋友和教育界的同行们帮他联系展点,他还独出心裁地于2000年5月26日在《华商报》上向社会发出了一份特殊应聘书,他在应聘书中写道:“我应聘的范围是,为大中小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要求待遇是:情系下一代,无偿献余热,不要工资和酬礼,享受新鲜空气和童真的笑容,食宿自理。承诺:无偿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图片4000余幅。”应聘书使陕西各界人士看到了他的思想和品德,看到了他的人格和追求。

二 与青少年广交朋友

中央提出用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的方针后,他针对一些学校和教师仍旧围绕考试指挥棒转的问题,多次借助媒体,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疾呼:“从思想道德品质上救救孩子们”、“把孩子们从分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他结识了许多“忘年交”，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和不顺心的事就找他。2001年5月阚老师收到一位女中学生的信，说她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最近却直线下降，迫于无奈，向他请教。接信的当天下午，他就火急火燎地赶到学校，不巧没有见到她，回来后给这位女生复信，答应帮助她。不久，他与她倾心长谈，使她放下了思想包袱。

2000年11月，西北大学团委邀他举办图片展览。他认为，大学生们即将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犹如马拉松的“冲刺”阶段，需要有人为其擂鼓助威，加油鼓励。热情的大学生们很快将千余幅图片悬挂在礼堂前的路两侧。连续两天，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达七八千人次，后又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阚韵清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大学生为了救国救民，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真理的事例，激励大学生为建设祖国努力学习。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人欺凌，所以我们的祖国一定要繁荣富强，建设祖国的重任就落在你们肩上……这些人尽皆知的道理，出自一位无私奉献、受人敬仰的长者之口，在年轻人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称赞阚韵清的话“犹如一缕清风，拂过我们焦躁的心灵，给我们指出了人生该走的道路”。会后大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请他签名题词，他给同学们的赠言是：“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老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赵玲丽同学代表同学们在阚韵清的留言簿上写道：“我只给您写几个字表达我们的心情，用真情教育下一代，用生命召唤真善美。”说出了阚韵清

老师的不懈追求和殷切希望。

他给大学生们送去了精神食粮,使其健康成长,大学生们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他与同学们同吃同住,一起谈天和娱乐,使他年轻了许多,吃饭时同学们要给他买高档饭菜,他谢绝了;晚上同学们将厚厚的毛毯盖在他身上,给了他无限温暖;离开时同学们要给他买返程车票,他却自己花三百元雇了一辆车。特别是同学们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青春的活力,不仅使他听到大学生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企盼,更使他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给他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回到宝鸡后,他收到了二十八位大学生的来信,他们亲切地叫他阚爷爷,自称是他的孙子和孙女,阚韵清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三 无悔的追求

十几年来,阚韵清老师把自己的精力、心血、金钱都倾注到爱国主义图片宣传活动中,起初邻居不理解,儿女不同意,可阚老师矢志不渝,他对儿女们说:“你们都别拦我,你们好好上班工作,我干我的宣传”。有人问他:“您图个啥,展览一次多少钱?”他觉得世界上有些东西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要说挣钱,1990年儿女们在咸阳为他开了一个门店,收入也可观,可是他毅然放弃了这个挣钱的机会,回到宝鸡,干起了没有报酬、东奔西跑的关心教育青少年的工作,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余热。

阚韵清老师在工作中经常碰到一些橡皮钉子,有时候他去单位联系图片展览,人家用审视的眼光打量他半天后说:“您有介绍信和证件吗?”“您的讲稿让我们看

看”，“你回去等通知吧！”碰到这样的单位，大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他经常收留一些孩子，“忘年交”们也常来拜访，打乱了家庭生活秩序。为招待孩子们吃饭，老伴累病了，子女们也埋怨说：“花钱买劳累，何苦呢？”还有一些人说他“傻”，甚至讽刺挖苦说：“你搞家教挣多少钱？”他却无怨无悔地走自己的路。

各级领导的支持，使他很受鼓舞。1996年，他原来所在部队的政委张作义从大连给他寄来了二百三十八幅千金难买的军史图片。2000年春节前夕陕西省关工委的领导专程到宝鸡慰问，并给他送来了慰问金和慰问信，宝鸡市各级领导对他的宣传工作都给予了肯定，还为他的工作提供机会，创造条件。2000年6月26日，金台区公安局以区禁毒严打领导小组名义，通知全区所属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都以阚韵清的禁毒图片进行巡展，收到很好的效果。

尤其使他感动的是，许多素不相识的同志也给他大力支持。中纪委离休干部陈麒章从1997年开始，月月无偿地给他邮寄家教漫画和报刊文摘选编《怎样教育孩子》。厦门市鼓浪屿的家教学者冯龙士为他寄来了宝贵的有关家教和素质教育论文。江苏省如东县老年大学家庭组的十三位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也给他寄来了珍贵的资料，他们为了什么呢？还不都是为了祖国的下一代。

有一年秋天，他在陈仓镇代家湾小学做报告后，数百名学生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送上精美的笔记本，请他签名

题词,老师担心他受不了,护送他“逃”到校长办公室。为此他感到很不安,他常想,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没有什么技术专长,也没有流利的口才,讲不出什么深奥的理论,我只是向孩子们提出一点希望和要求,却在他们心里掀起了波浪,说明社会 and 孩子们需要我,我乐于做孩子们需要的人。他向社会呼吁: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全社会都应为他们们的健康成长尽点力量。

清人龚自珍诗曰:“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阚韵清就是化作春泥的“落花”,他愿做将全部余热和爱心献给孩子们的护花使者。

(本文根据陕西省政协《各界导报》2001年10月15日《化作春泥更护花》一文及本人提供资料整理。)

刘野白传

刘野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高唐度过的。

1930年12月25日，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松岩本不是高唐人，但由于我母亲是高唐西街人，父亲便到高唐县来工作了。父亲曾经当过高唐县的邮政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东北去参加抗日工作，回家探望过一次以后，便音信全无了。据说，他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我的母亲李学文(字，彬如)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本是高唐西街贫民之女(姥爷打烧饼维持全家生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外国在高唐设有教会组织，教堂就建在西街。教会学校招生时，母亲有幸被录取，并在教会的帮助下读完中学及大学，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在旧中国所办的大学，先后设置神、文、理、医、工等学院)毕业后，在苏州工作时和我的父亲结婚。苏州的生活本来是很安逸的，可是她为了照顾孤苦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动员父亲一起到高唐工作。在父亲当邮政局长、母亲当小学教员的时候，我的家庭可以说是幸福而又美满。但是，日寇入侵中国，不仅给我们祖国带来了灾难，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灾难。父亲在抗日前线牺牲后，我和姐姐的生活全部靠母亲当小

学教员的工资来维持。在高唐,我们家既无房产也无地产,用一个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来维持三口人的生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我的母亲经常处于失业状态。芦沟桥事变以后,母亲怀着国破家亡的双重仇恨毅然参加了抗日工作。在范筑先将军的部队驻守高唐期间,母亲曾经担任过高唐县妇女抗敌救国后援委员会(简称“妇救会”)主任,在高唐各地积极开展救亡工作。高唐沦陷后,母亲不得不到农村隐蔽起来,在城东李小庄、孟楼、赵秦庄、十里园一带当小学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后来就在张庄乡赵秦庄落户了。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把高唐作为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高唐,并且经历了战争、流亡、贫苦、饥饿,我的坚毅性格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这个时期在母亲的影响下养成的。

我是高唐县有名的穷学生,也是当时有名的高材生。1942年到1945年,我在高唐县简易师范读书,在我记忆里,每次考试我都名列榜首。但是,当我刚刚读完一年级的時候,便因为家贫而辍学了。在简师读书并不需要交纳学费,但学生们每月都要从家里背几十斤粮食交给学校伙。我的家庭饥寒交迫,哪里交得出几十斤粮食,只好退学。学校当时觉得我的成绩好,退了学太可惜,特地允许我在学校里当工友,半工半读,免缴饭费,于是我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一个穷学生在食不饱腹的情况下还能有学习的机会,怎能不加倍珍惜呢?!因此,我立下誓言:“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百之”,以十倍的努力,发愤读书。结果,我这个“小工友”虽然每天在课前课后

都要提个马蹄表,拿个破铜铃,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摇着铃铛跑遍全校,此外,还要负责烧锅炉、打扫校院等等,我上课的时间比同学们少,温习的时间不如别人多,但是我的学习成绩仍然位居前列。不怕困难,积极向上,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1945年夏天,我从高唐简师毕业,年龄不足十五岁便只身一人到禹城国立第十七临中读书。半年后,学校迁至济南改为私立,我又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不得已,只好在学校附近一家小饭铺打工,勉强维持到1946年暑假。这时候,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管饭吃的济南师范,在这里一直读到1948年7月。

值得回忆的是,在济南师范,我这个在求学道路上步履艰辛的好学生,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有了初步认识。这期间,我和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了济南地区的学生运动。1947年夏天,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贴到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门卫哨兵背后的墙上。这个勇敢举动当时在同学中传为佳话,但是我也由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不断遭到特务的跟踪和监视。到了1948年7月,我在济南师范已经处于危险境地,地下党组织为了我的安全,介绍我进入华北解放区,到位于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大学习。从此,我加入了革命队伍,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重大转折。

在华北联大,我接受了革命的洗礼,系统地学习了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创建后的第一批团员。几个月后,我就被分配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人民日报社工作。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随报社一起进城,担任编辑、记者,兼做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56年入党。1961年10月调新华社工作,曾任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新华社内蒙分社记者、新华社总社国内部编辑、《瞭望》杂志负责人、《瞭望》周刊副总编辑、《瞭望》周刊社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辑、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1991年离休。离休后曾担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华网新闻顾问。

我在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五十多年,离休后仍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工作。可以说,我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我热爱新闻工作,也在这个岗位上受到了党的培养和教育,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不敢说自己对党的新闻工作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出了应有的努力,算得上是一名称职的编辑、记者。

要把五十多年的新闻实践都叙述一遍,实在是很困难的,因为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一定要我向高唐的父老乡亲们交一份答卷,我只能简要地写出如下几条:

一、在五十多年的新闻工作中,写了大量新闻通讯、述评和评论,主要著作有:《青年修养通讯》、《调查研究的故事》、《新闻评述的时代风格》、《兴邦集》、《多难兴邦》

等。我当记者,不图虚名,不是一味地通过写美文来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是着眼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比如,我在陕西当记者时,看到陕北地区的水上流失十分严重,便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题为《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的调查报告,同时写了一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提出水土保持是山区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我在内蒙古当记者时,看到广大牧区也搞以粮为纲,开荒种地,严重地破坏了草原,影响了民族关系,便写了一篇题为《牧区生产要以牧为主》的报道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我以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写了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新闻述评,旗帜鲜明地支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舞群众振奋精神,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我在《瞭望》杂志创刊号上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写了题为《多难兴邦》的一篇评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曾以柳笛、林旭等笔名在《人民日报》和全国其它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顺便说一下,我之所以采用“柳笛”这个笔名,是从怀念故乡而来的。记得小时候,每到初春时节,家乡水边路旁的柳树发出嫩绿的枝条,我们一群顽童常常剥下柳条的嫩皮做成口哨吱吱地吹着,象是报告“春天来了”的消息。正是从这种乡情和“报春”

的美好意境出发,我用“柳笛”的笔名写了不少杂文。比如,《解放思想鬼神退位》、《寻根究底去伪存真》、《多管闲事》、《包打困难》、《一门忠义》、《久久为功》等几百篇杂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这些杂文本来都是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和新生事物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残酷的批判。这以后,我很长时间不写杂文了,直到离休以后,我才重新提笔写起杂文来。近几年,我写的《谈处士横议》、《公议、公默及其他》、《狡黠的智慧》、《权术与奸术》、《“官本位”断想》、《史官的厄难》、《记者与史官》、《司马迁觉醒》等杂文,又一次受到了读者的称赞。

三、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说一说,就是我和《瞭望》的故事。

1978年到1980年,组织上送我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班学习了近两年。回新华社后,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要我创办一份名为《记者与生活》的刊物,我认真考虑后建议创办一份新闻周刊。因为,在我国的新闻史上有着办新闻周刊的优良传统,而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一本新闻周刊,从当时读者的需要看也应当有这样一本刊物。穆青同志和社党组批准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全力投入创办《瞭望》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主持制定了《瞭望》“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先办一份月刊,积累经验,训练干部,探索道路,形成舆论;第二步,把月刊改为新闻周刊,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国内版、海外版、英文版三个版本;第三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以

这三个版本为母体逐步创办国内外的地区版,从而使《瞭望》周刊成为一本大型的、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的新闻周刊。这个“三步走”的长远发展规划,展示了《瞭望》的美好前景。与此同时,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又一起研究确定了《瞭望》的编辑方针和独特风格,提出新闻周刊要以新闻综述、新闻分析、新闻述评为主,评说天下大事,瞭望世界风云,使广大读者对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为了体现这种编辑方针和独特风格,特意开辟了《中南海纪事》、《国情与战略》等著名专栏。当时,新华社党组对创办《瞭望》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新华社各部门和各地分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新华社党组的直接领导下,1981年4月,我主持了《瞭望》月刊的出版;1984年1月,主持了《瞭望》周刊的出版;1984年9月,我到美国纽约主持了海外版的出版;1986年1月,又到香港主持海外版的改版和扩大发行。不出所料,《瞭望》的创办,从月刊到周刊,从国内版到海外版,不仅受到了党中央和新华社的高度重视,也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里,有两件鲜为人知的事:

一件是在《瞭望》月刊创刊前,为了开辟《中南海纪事》专栏,编辑部拟定了《中南海的春天》、《时刻想着八亿农民》、《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等三个题目,准备以新的视角报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一举动事关重大,必须得到中央的同意。于是,我建议穆青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请求支持,令人喜出望外的是穆青同志的信发出

后,小平同志很快便批示:“可以”。这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可以说,《瞭望》是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创办的。

另一件是关系到我个人政治前途的事。1982年,正当我办《瞭望》最起劲的时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希望我去内蒙古党委工作,当秘书长。因为我曾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过,他们对我有点了解;同时,现任新华社社长的田聪明同志当时在内蒙古党委工作,他也极力推荐我。我感谢周惠同志对我的信任,可是,由于我当时热衷于办《瞭望》这项事业,加上新华社也不会同意放我,所以周惠同志同我谈了几次,我都没有答应。没想到,1983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下发调令:“调新华通讯社刘野同志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我在穆青同志那里看到了这份调令。穆青同志不同意我走,他说:“你走了,《瞭望》还办不办?”就这样,我继续留在《瞭望》工作。我说这些,是想表明,我这个人不想当官,只想干事,我对党的新闻事业是作出了个人牺牲的。

2001年11月2日于北京

苦孩子的幸福人生

姜志民

人到老年原本就爱回忆往事。接到家乡县政协约写介绍本人生平事迹的征稿信后,更是往事如烟,连夜里做梦都是童年的故事。

为求生路来到关外

我193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出生在鲁西北高唐与任平两县交界的琉璃寺镇南姜庄。这里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

1943年,鲁西北遭受历史罕见的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人们只能用树叶树皮维持生命。日本鬼子和杂牌军临近末日,垂死挣扎,四处抓人放火,抢劫民财。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姜庄因饿而死的多达几十人,其中就有我祖父。为求生路,父母忍痛将我送人。于是,我便于1943年春天下了关东,来到被日本鬼子侵略统治的伪满洲国一个小镇——苇河(后与珠河县合并为尚志县)。这年我刚十二岁。

我从小就很想读书,很想成为一个能识文断字的人,只因家庭贫穷,进不了学校。到了关外的新家,不仅吃饱了肚子,还让我上学念书,真把我高兴坏了。从走进校门那天起,我像“吃书”一样,四年时间跳了两次级,先由二

年级跳到四年级,东北光复后,1947年共产党在一面坡以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名字开办了一所尚志中学,我又从四年级进了尚志中学。这时的东北解放战争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由防御转入反攻,前方后方都极需要人。我在中学念了半年,1947年8月,响应学校号召,十六岁就跟随蹲过七年日本监狱的张老师投身到革命队伍,穿上绿军装,成为尚志县文艺工作队的队员,用文艺演出形式,宣传动员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和参军支前。

参加工作后,文化学习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天天上课了。但生活在集体之中,和文化水平高的同志吃住在一起,可以拜身边的同志为师,随时随地向他们请教。同时,我坚持看书自学,写日记。一本四角字典和我朝夕相伴,遇到不认识或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这本不会说话的“老师”帮助我认识了很多生字,长了很多知识。

1948年,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大批干部进关、南下,尚志县委会、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出现了严重缺员情况。为补充这三个部门的人员,文工队被一分为三,我被分配到县委会改行做了青年团工作。中间到城关区当了不到一年团区委书记,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又回到县委会,在宣传部当干事,直到1953年3月,被调到当时的松江日报社,成为一名新闻战线上的新兵。

一篇小稿改变了命运

我本没念几天书,实属“才疏学浅”之辈,怎么干上新闻这一行呢?这要从一篇几百字的小稿说起。

1948年冬天,尚志县的土地改革结束,开始民主建

政。可是，我下乡看到一些农户家的院墙上用白灰写的大标语还是原来“翻身解放”、“土地还家”等等，有的已残缺不全，成了反意。我把看到的这种现象写了一篇建议换成新标语的小稿，经过一番犹豫，鼓起勇气寄给了《东北日报》。几天之后，果真登出来了。我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对我的鼓舞太大了，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有了这第一次，更想第二次。从此，我便随时随地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选其有价值的写成稿子寄给报社。可能当时给报纸写稿的人少，我写的稿子虽然水平不高，有的竟是白字，可时不时就被采用。这样我越写胆越大，越写越想写，除了投给《松江日报》，《东北日报》、《生活知识》，《中国青年》、《新农村》杂志也常见到我的稿子。身边的领导和同志给了我很多鼓励，外地不相识的人也来信向我讨要写稿的秘诀。特别是松江日报社和《新农村》杂志社的几次表扬和奖励，不仅使我写稿积极性达到痴迷程度，而且推动了我的政治文化学习。

有一次，我用写稿得的稿费买了一件弹力背心，虽说不值几个钱，穿在身上却别有一番滋味。也就是因为这种持之以恒的积极性，常有稿件见于报端，1953年3月我被调到松江日报社，由业余变成一名专业新闻工作者。

方格纸上的长途跋涉

新闻工作本是我所羡慕和向往的职业。可是，当真的迈进报社的门槛，成为一名专业新闻工作者时，由于自己文化底子薄，知识面窄，一时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却又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要求重返县里工作。报社领导

没答应,并说:“既然调你来报社,说明你能做好这一工作,困难是暂时的,可以克服。”

服从组织决定是共产党员的天职。既然命运注定要我干这一行,只好安下心来,迎着困难去拼搏。

那年我二十二岁,还没成家,正是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干什么都不服输的时候。为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我决心下定:一要肯学,二要肯干。知道自己水平低,业务不过硬,工作中我“慢雀先飞”,不怕劳累,多花功夫,尽量把工作做好。工作之余则集中精力读书学习,写心得笔记,摘、抄精典著作中的精彩片断和名句。资料室我是常客,公出每到一地必去新华书店。当时新华社定期出版一本《新闻业务》,其中既有系统讲解新闻理论的“新闻讲座”;又有资深记者、编辑介绍个人成才之路和采访与写作的经验体会;也有典型报道的点评和分析。每期我都逐篇逐句仔细阅读,并作记录,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遇到问题再到书中找答案。这种干中学、学中干、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真可谓“立竿见影”,使我受益匪浅。同时,我把编辑部的老记者、老编辑都视为老师,写出来的初稿,请他们提意见、修改,发表在报纸上的稿子也请他们“评头论足”,找不足。经过这样“摸爬滚打”,不到一年,我的新闻理论和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工作中可以独挡一面。1954年4月,我下乡到宁安县,采写了一篇《团山子农庄的春天》通讯,发表后不仅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还被《东北日报》转载。之后,我又去双城县采访幸福农庄,

从多角度写了一系列报道，报纸连载之后，黑龙江出版社汇集成书出版，书名就叫《幸福之路》。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头，坚定了我吃新闻这碗饭，走新闻这条路的信心和决心。从助理编辑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文革”前晋升为编辑、责任编辑。同时多次被评为报社和省直机关的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

“文革”后，作为《黑龙江农村报》的领导，在拨乱反正中如何把握舆论导向，对我是个新的考验。由于十年浩劫，“四人帮”给全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为我亲身感受、亲眼所见，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我发自内心赞成和拥护。因此，我以极大的热情，深入下去，抓典型，树样板，开展大讨论，并亲自撰写了一系列评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送到千家万户，送到农民的心坎上。一时间，《黑龙江农村报》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他们说，“报小胆大，替农民说话”。对农村丢掉“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2年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总结推广了《黑龙江农村报》的经验，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小报在向大报挑战》的通报表扬，同时被选为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从1953年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到1990年离休后我又继续工作了十二年，在方格纸上整整跋涉了四十八年。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杂文、评论、社论和论文近三千篇，三百多

万字。并出版了《新闻采写精要》三本书(有的合著)。其中社会反响最大的,是长篇人物通讯《永不生锈的铁孩子——高风志》,受到省委嘉奖。

离休后继续工作十二年

1990年,我年已花甲,离休了。但组织上没让我离开编辑部,而是以顾问身份,继续在老年报工作,只是不再担任老年报总编辑了。后来被返聘到黑龙江农村报,直到2001年8月过了古稀之年,才不再上班,完全休养。

离休后继续工作的十二年,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考验。原来的部下成了顶头上司;原来指挥别人,现在被别人指挥;原来签发别人的稿件,现在写了稿需送别人签发。“这种先后不同的位置大调个你能适应吗?你心里感到平衡吗?你不觉得失落吗?”有人这样问我。我说:“离退休这项制度不是给哪个人规定的,到了年龄谁都得走这一步。一个穷人家出来的孩子能有今天,我已经很知足了,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所以,离休,我的心情很平和;留下来继续工作,我更高兴,毫无不平衡之说。宣布离休的第二天,我就主动把桌子从领导屋里搬出来,和同志们坐在一起。工作中我更是注意放下原来领导的架子,不说三道四,不指手画脚。对年轻的新领导,我真心实意地相帮、尊重、服从,当好参谋。新领导对我也是以诚相待,工作和生活中给了很多关怀和照顾。十二年中我们同心同德,互相合作,相互支持,从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我在完成份内工作任务的同时,没有停笔,继续为报纸写报道和评论。十二年仅发表在报纸上的就有三百多篇。

离休后继续工作的另一大收获,就是身心比过去更健康了。干报纸工作,特别是当领导与其他岗位不同,除了掌握舆论导向,每张报纸、每个版面都要周密考虑,重点稿干要审,大样要看,没等今天的报纸发出,就得安排明天的,始终工作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晚间躺在床上,还要过滤今天的报纸有无漏洞,明天的报纸把什么放在突出位置。离休后不同了,减去了肩上领导的重担,确有“无官一身轻”之感,每天都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不必再去过滤其他事情,饭吃得香,觉睡得足,身心自然比过去更加健康。过去我得过心肌梗死,一年多没能上班。今年4月份老干部体检,大夫说我的心肌功能恢复得很好,看不出有过心肌梗死的病史。同志们也说我除了白发有增无减,越活越年轻了。

抚今追昔,从关里到关外,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半个多世纪如同在梦中度过。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童年时代连顿没有糠菜的饭都吃不上的穷孩子,竟然改变了祖祖辈辈没一个读书人的家史,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新闻战线上辛勤耕耘了四十八年,上了《中华精英人才库》和《中国当代创业英才》名人录,当选为黑龙江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黑龙江省老年学会理事;万万没有想到,晚年会有这样温馨的家庭,幸福的生活。从解放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幸存下来的老伴,深知能有今天来之不易,工作时爱岗敬业,离休后治家有方,给孩子们树立了榜样;女儿大学本科毕业,现在也是《黑龙江日报》的一名记者;外孙女聪明可爱,老少三代生活在一起,每天都充满了阳

光,充满了欢乐。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走向繁荣富强。

我的创作道路

李怀仁

我能走上创作道路,应归功于自学。

1932年我生在高唐县韩寨乡(今属梁村镇)西军屯一个极贫穷的家庭里,从我往上数十代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外祖母家在夏津县李官屯,家中只外祖父母两人,无子嗣,故我从五岁便住在那里。

外祖父幼年是个孤儿,稍大后在饭店里当小工,他人穷志不短,硬是在那种条件下跟管帐先生学字,后来达到能执笔记帐了。我的自学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响。1942年前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多小学后,念不起辍学了,就在拾柴捋禾的空隙里跟外祖父学字,也就是在看书中遇到不认识的字便问他。

这样自学的好景也不长,1942年秋,外祖父饿死了,临死前他连想吃一口净面饼子的愿望也没达到。我失去了一位亲人,也失去了我能随时可以求教的人。孤苦的外祖母养不起我了,我回到了老家西军屯。

当时在农村流传着许多“闲书”,也叫“唱本”。实际上是些明清小说。我家东邻居徐永秀老先生是个四书底子,我叫他二大爷。他家道穷落了,但他读的那一屋子书却舍不得动,都珍藏着。记得我向他借的第一本书便是《水浒》,金批七十回木刻版本,读《水浒》,不认识的字便

问这位二大爷。人们都说他脾气有些古怪,但他对我却很和蔼,我问什么字,他都很耐心地告诉我。他那满头的白发、清矍的瘦长脸,至今印在我的脑子里。

1945年解放后,我又回到夏津李官屯外祖母家,与孤苦伶仃的外祖母一起生活。李官屯是个四百余户人家的大镇,流传着的“闲书”、“唱本”也多。从这时起到当地土改结束的1949年,是我自学的重要时期。“闲书”、“唱本”是我自学的教材,其中有四部古典名著中的《水浒》、《三国》和《西游记》,也有一些武侠公案和世情小说。最近我到书店和书市浏览了一下,见目前出版的各种旧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但我情有独钟又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水浒》。书中宣扬的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精神激荡着我的心,描写的一个个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英雄人物,特征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大概与我的家庭出身很有关系。

在外祖母家那几年里,我参加了当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当时我是农会的基层干部,又是青年民兵,从减租减息、增资倒佃、打土豪分田地,到大复查分胜利果实,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打还乡团我都参加了。1949年土改结束,我村的驻村干部说:“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也该在文化上翻身了”,他们做通了我父亲的思想工作,父亲把我从夏津李官屯外祖母家叫回来,送我去范庄完小上学。因我村党支部对我在李官屯土改斗争中的表现十分了解,我回家不久,就发展我入了党。在宣誓入党的那天晚上的党支部会上,我看见父亲也坐在

那里,这才知道父亲早已是党员了。

到范庄完小(高唐第六完全小学)后,学校叫自报读哪个年级,最高的是予科,予科学的是高小一册算术,初小八册国语。上课后我觉得上国语课有点驾轻就熟,把劲往算术上用得多了些,期终我考了个第一名。学校规定免试升入高小,我自己要求参加了考试。因为来升高小的是全梁村区的初小毕业生,我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究竟如何。结果,我仍考了前四名。我的作文在予科班里也是较突出的,进入高小后,在班里仍名列前茅。读了一年半高小,学校批准我们班的前五名提前半年毕业,有李恒河、赵以西、徐金亭、赵德信和我。结果,我们五个都上了初中。我考的是德州中学(后改为德州一中),在14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第五名。

从初中到高中,我所在的班虽换过许多语文老师,但我的作文始终很好,每次发作文,老师几乎都是先念我的。或许是在写作文上受表扬多了,我逐渐地喜欢上了写作,羡慕那些文笔好的“笔杆子”,如搞文学创作的人和当新闻记者的。记得初中毕业前夕,省里的工作组来了解初中毕业生的情况,组长是大众日报社记者田牧,组员有当时团省委的李永先、省工会的李华民等,田牧深入到我们那个小组里座谈。他问我:“毕业后想干什么呢?”我说:“党和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他说:“你自己心里想干什么呢?”我说:“如果允许,我看你这个工作就蛮好的!”一句话激起了他的兴致。他说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社经常给他要稿子,徐建春那篇

报道就是他写的,如果我们谁要参加农业生产,做出徐建春那样的成绩,他一定去写谁。

读高中时,学校建立了许多研究小组,有理化小组、数学小组、语文小组等,都是由在某科学有专长的学生组成的,我自然加入了语文小组。当时我根据假期在家中见到和听到的情况,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小说《秋收的时候》,这是写我村合作社秋天分黍子的事,黑黍子皮薄出米多,黄黍子皮厚出米少,社员都争要黑黍子。我塑造了一个先进的老社员把他老伴抢着分的黑黍子扛回场里,换成了黄黍子,表现先进和落后两种思想的矛盾。小说抄出来贴到语文小组的板报上,受到全校同学和老师的好评,寄到《北京文艺》,受到编辑的好评,尤其在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方面,给予了肯定,但稿子退回来了。我纳闷,不知为什么。按一般初学写作者的稿子水平,我觉得不在他们之下。于是,我又将稿子寄到《大众日报》文艺组,一位姓王的编辑在退稿信中,除了《北京文艺》的编辑肯定的那些外,不同的是指出小说结尾部分有模仿李准的《孟文泰老头》的痕迹。初学写作往往要模仿,而这又是最忌讳的一点,不是如此,也许我的处女作就是这篇小说了。

创作冲动上来就往往控制不住,也就在这时,我又忽发灵感,想起了县城北湖水牢困梁山泊英雄的传说,于是又写了水浒传说故事《高唐州红枣救英雄》,寄到《前哨》(《山东文学》前身)不久,便在第二期上发表了。1957年1月《高唐县报》转载了此文,这竟然成了我的处女作。

几次考试的成绩说明我的自学是成功的；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作文成绩则说明我在自学中受文学作品的影响而受益；轻而易举地发表了《高唐州红枣救英雄》，说明《水浒》这部名著对我影响之深，这篇短文确实有点《水浒》味。

进入大学后，埋头钻研，只嫌时间太少，把创作暂时搁到了一边，但有时也写点诗歌和短文，发表在校报上。毕业后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随后是“文革”十年，思想上的创作冲动少了。1975年我从禹城调到高唐广播局后，因操笔写东西，这才又启开了我创作的闸门。土改时期轰轰烈烈的斗争生活，如浪涛般撞击出我创作的激情，我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血火浇铸的大地》。不久，因写作的原因，我被调到了高唐文教局，在这时已写出了三十万字的《血火浇铸的大地》初稿。1980年的《高唐文艺》第二期和第三、四期合刊本上连载了开头的五章。编者按说：“这是一部多卷式的长篇小说，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描写了鲁西北马颊河中游一带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上卷开头几章写旧社会的状况，从十四章开始，写1945年解放后的土改运动。”

1980年我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与人合作写成的民间传说《杀盐巡》，在《海鸥》上发表小说《兄弟》。

就在此时，许多人认为我写的土改题材的作品不合时宜，恐怕很难出版，一盆水浇凉了我的创作激情，我在犹豫徘徊中放下了修改的笔。

我那时正担任高唐创作组组长又兼教电大，还是电

大班的班主任，不能完全停笔，在百忙中又写了《黑旋风高唐州贩枣，鼓上蚤后花园除霸》，寄给菏泽《牡丹》文学双月刊后，《牡丹》发了这篇水浒传说，主编朱希江是我的老同学，他给我来信鼓劲说：“你何不在水浒传说故事上大干一场呢？”于是我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在《牡丹》上发了十余篇。1983年7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外传》选人我的两篇。1986年1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外传》（续集），又将我的中篇《鼓上蚤时迁》，计八回，五万余字选人。我与李新民同志共同主编的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光狱春秋》也在这时出版了。

1985年12月我被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86年又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1987年4月，我的中篇评书《时迁小传》在郑州被全国电台文艺节目评审会评为全国九个优秀交流节目之一。当年7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时迁新传》。由于《水浒外传》故事的发表和对《水浒》民间性及“水浒外传”创作的研究，1989年4月我参加了全国第五届《水浒》学术讨论会，被吸收为全国《水浒》学会会员。同时，在山东《水浒》学会会议上，我被选为山东《水浒》学会理事。

没想到，我的创作历程前后这么相似，花了力气的现实题材作品没有发表，没侧重的题材的作品却连篇累牍地发表。目前我的另一个长篇小说《高唐飞盗传》即将脱稿。

从1980年起，在我担任高唐创作组组长的四、五年

中,在壮大我县的文学创作力量上下了很大工夫,先后发现文学爱好者周庆红、张艺民、刘文忠等同志,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切磋创作问题,激发他们的创作才能和热情。周庆红因在县城工作,几乎每晚都到我那里畅谈,张艺民和刘文忠隔三差五地来一趟,他们把作品送给我商讨,或共同研究一些创作上的疑难问题,能给他们帮助的,创作组能办的事都全力办了。如在《高唐文艺》发表他们的作品,研究他们的作品,修订后寄出去。这期间,刘文忠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姐姐》并获奖,还发表了《望儿》、《张笛》等小说,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张艺民被评为山东省模范通讯员,选为县人大代表,他在全国刊物上经常发表民间传说,他的《李苦禅故事二则》的素材就是我讲给他的。周庆红后来出版了诗集《我是一棵树》,还与刘文忠自办了《大地》文学,出版了三十期。

我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还兼教电大班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和写作课。这三门课在省电大统一考试中(省里阅卷),高唐电大班成绩均居聊城地区第一。

1985年我调离高唐后,一直在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任职,先是任《胜利教育报》副主编、《黄河学刊》编辑,1986年又兼教中文系写作课,1988年我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退休,现住东营市。

在航空工业战线上

杨文彩

我是山东高唐县尹集镇杨寨子村人,1933年7月出生,1948年在山东济南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部沈阳112厂工作,先后任车间工艺员、工艺室主任、工艺部门装配室主任、总装、试飞室主任、主管工艺师、型号工艺师、歼六飞机厂抖动工作组副组长等职。1981年我被调到北京航空工业部三〇一研究所适航质量管理室任研究员、专业组长、驻上海航空工业(集团)公司MD—82飞机专家工作组副组长,高级工程师。现为北京科源轻型飞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适航办公室主任等职。五十年来,为报效国家,我在航空工业战线上奋斗拼搏,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设计制造飞机

我1949年10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渤海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称辉南剧团),后调到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工作,经常深入到各部队体验生活,写兵、演兵、歌唱兵。

1951年5月至7月,我有幸参加以山东军区政治部

文工团为主组成的华东军区赴朝慰问团,代表华东军区和人民对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进行慰问。我们去各大战地医院慰问刚从前线受伤下来的英雄人物,到战地前沿进行现场慰问。除了演出已准备好的传统节日外,还采访志愿军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边写边演,得到志愿军领导好评。我在这次活动中荣立四等功。

1952年初我从部队转业后,被选送到南航学习航空制造专业知识,毕业后分配到国营112厂生产一线,从事飞机设计、制造和生产工作。开始是跟着苏联专家对口学习,掌握飞机的结构和特点,修理苏联援助的飞机,如米格-9、米格-13、米格-15等飞机,以后就是仿制苏联的飞机。

1955年9月我被批准参加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五飞机试制工作,当时我激动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我认真学习,消化、理解苏联的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掌握产品结构特点和系统原理及施工方法,参加了现场试制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图纸、技术文件与实物和工艺装备并不完全协调,这样给飞机试制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如有的零件与零件之间不协调,有的部件与部件之间不协调,还有的零件与部件之间不协调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深入现场,对各个环节和图纸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对实物及工人操作方法和安装步骤进行全面了解,得出正确的结论,迅速解决问题,保证了试制任务顺利进行,我因此被评为“青年突击手”。1956年7月13

日,由我们车间总装完成的第一架编号为“中 0101”的喷气式歼击机送往机场进行试飞,7月25日试飞成功。我记得9月10日那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亲赴我国重工业基地——沈阳,参加沈飞厂在试飞站举行的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为“中 0101”号飞机剪彩。

在歼五飞机试制成功后,经过近一年的准备,航空工业局决定在沈阳 112 厂成立第一个以歼击机为主的设计室。为培养新飞行员,经上级机关批准,决定研制歼教 1 型飞机。

1957 年底歼教 1 型飞机设计方案、样图、初步设计和样机基本上完成,随后召开样机审查会,通过后便开始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工厂工艺部门抽出以陆总工艺师为首的主管工艺师组成工艺审查组驻设计室,参加工艺设计,负责结构工艺性审查工作,拟定工艺总方案、装配方案、协调图表等指令性工艺文件,设计编制各类生产工艺文件。

为了早日把自行设计、制造的飞机送上天,当时我们设计、工艺人员深入到生产第一线,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共同奋战,终于在7月20日总装完毕。7月26日首架歼教 1 型飞机试飞成功!8月4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空军司令员刘××专程来到沈阳飞机厂参加报捷庆祝大会,并观看了飞行表演。

我在喷气式教练机研制中是青年突击队成员,由于工作认真负责,设计的工艺方案严谨可行,对研制中可能

发生的重大技术问题都有备用方案,从而保证了研制任务的顺利完成,被112厂评为突击能手。

1958年我们开始试制歼六飞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超英赶美”、“大放卫星”波涛汹涌,盛行瞎指挥和高指标,规章制度遭到粗暴践踏,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为时尚,“左”的倾向在生产领域愈演愈烈。当时沈阳飞机制造厂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

如歼六飞机是仿制苏联米格—19C的飞机,当时是空军急需的主要机种之一,试制之后,未经生产定型就投入了批生产。开始飞机在地面试验时,平尾就产生抖动,苏联专家用手放在翼尖处感受抖动不大,就说:好!合格了,飞机可以出厂交付部队。后来苏联专家回国了,无专家验收,中国质检人员没有这方面的权威,当时生产的大批飞机出不了厂,已交付部队使用的飞机也因抖动影响作战训练,直接威胁着飞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了歼六飞机排抖工作组,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组。

经过数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架飞机操纵系统和五架飞机零件制造质量检查;三架典型飞机和三套典型助力器进行各种组合的地面对比试验;完成了三十余架飞机、九十五个起落的飞行试验,终于找出飞机抖动的原因,提出了排抖方案,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重大的技术问题。这样不仅使几百架飞机得以使用,还大大提高了飞机性能和固有质量,为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做出重大贡献,也为新机设计积累了经验。由于歼六飞机抖动工作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攻克质量关键问题七十余项,为歼六飞机优先

过关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贡献突出,集体荣获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我被评为一等奖。

1962 年初,沈阳飞机厂决定由我负责米格—21 飞机散装件的技术准备工作。歼七飞机是原苏联的米格—21 飞机的仿制型,它是高空高速歼击机。根据双方协议,米格—21 飞机图纸资料和散装件全部到达沈阳飞机厂。1964 年 4 月 30 日,第一架用苏联散装件装配的歼七飞机在某基地首飞成功。到了 1964 年底,首批十架用苏制散装件装配的歼七飞机交付部队使用,我空军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屡建战功,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三架。通过十五架份的苏制散装件的总装、调试和试飞,为我们研制国产歼七飞机打下扎实的技术基础。

1964 年 3 月,我厂全面进行国产歼七飞机的试制工作。当年完成两架供静力试验用飞机总装。1966 年,国产歼七飞机试飞成功。整个歼七飞机试制周期为两年半,我们提前一年多完成了三机部下达的试制任务。1966 年 12 月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七飞机生产定型并转入批生产。

1965 年上半年开始歼八飞机研究准备工作。在总工程师高××领导下,由总工艺师罗××主持成立结构工艺性审查组,邀请工艺专家和老工人进行三结合设计,对重大设计问题进行专门研讨,共同提出解决方案,从而完善了图纸设计。我当时也参加该审查组,我们共提出各类问题约三百多项,其中重大改进的有四十多项,改进了飞机设计,提高了飞机的工艺性。在此基础上分别制订

工艺总方案、部件装配方案、协调图表等三十多份指令性工艺文件,大量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保证了飞机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歼八飞机研制最紧张的时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一月风暴”、“文攻武卫”和夺权风的冲击下,沈阳飞机厂批生产线几乎陷于停顿,唯独我们歼八研制工作照常进行,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师傅甚至冒着人身危险上班,使歼八飞机研制没有中断。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阳飞机厂的机场上,当由我厂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的我国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又平稳降落在机场上时,在现场观看首飞的领导和沈飞厂职工群情激奋,欢呼雀跃,热烈祝贺我国自行设计的新战机诞生。

我在歼击机研制中,通过参加几种型号飞机的研制,总结出歼击机研制基本经验,写出《飞机研制程序》、《论工艺样机在飞机研制中的应用》两篇论文。其中《论工艺样机在飞机研制中的应用》一文于1980年获辽宁省航空学会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适航研究和管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我由设计、制造飞机转为飞机的适航研究和管理工作。

当代世界航空运输业发达的国家,都对民用航空飞机实行科学的适航管理,如美国1958年就颁布《联邦航空法》,西欧有《联合航空法》,苏联也有《航空法》,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民用航空器的适航管理还是空白。改革开

放后,为保障航行安全,维护公共利益,促进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航空工业部于1980年筹建中国航空工业部适航性研究管理办公室(CAMO)。此时我从沈阳飞机厂被调到北京航空工业部三〇一研究所,从事飞机的适航研究和管理工作的。

运十二飞机是我国第一种完全按国际适航法规自行设计、制造的飞机。当时是边建立适航法规,边进行适航审查,我们引进、翻译和出版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国的资料十余种,约1000万字以上。在充分研究消化国外适航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一批我国的适航标准、管理文件和指导资料。如1983年编制的中国适航标准二十三部,即现在的CCAR—23部。当时的初稿后来成为运十二飞机型号设计的审定基础。1985年底取得第一个《运十二飞机型号合格证》,1986年取得第一张《运十二飞机生产许可证》,这样就实现了我国民用飞机适航管理零的突破。

我参加了运十二型飞机适航法规的制定和《型号合格证》及《生产许可证》的审查全过程,在生产许可证审查中担任秘书长,组织全体审查员对哈飞公司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控程序进行审查,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所因此于1987年12月集体荣获国务院颁发的重大技术装备贡献奖。我个人荣立部级三等功。

运十二飞机获得适航管理两证后,又对运七飞机发动机和螺旋桨分别进行了取证工作。我们组织适航专家,深入各公司现场,查质保体系、质控程序、生产设施、

人员培训、实物质量、原始记录等,通过实地检查帮助各公司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分别使各公司达到适航法规规定的要求,取得了《运七飞机生产许可证》、《涡浆五甲发动机生产许可证》和《J16G10A 螺旋桨生产许可证》。我也获得部级“生产许可优秀评审员”光荣称号。

之后,我又相继参加了农五 A 型、运八 F 型和 AD—100 型飞机的取证工作,于 1993 年 6 月和 1995 年分别荣立部级三等功和航空工业总公司三等功。

1986 年初我参加了中美合作生产 MD—82 干线飞机工作。MD—82 飞机是可乘 147 名旅客的干线飞机,装有两台美国惠普公司生产的发动机。与国外合作生产干线飞机的目的是:一方面购买一批干线飞机,另一方面引进生产技术,为自行设计生产干线飞机打下基础。我受部领导委托参加部专家工作组并担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从生产、技术、质量和管理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提出建议、及时汇报,既对航天部负责也对上海市负责。两年来,与上海航空工业公司职工共同努力,团结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一批使麦道公司专家难以置信的问题,首架飞机试飞成功后,按计划于 1987 年 7 月 30 日交付。

首架飞机试飞交付时,美方派出了尼克松访华时的专机驾驶员进行试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他走下舷梯时高兴地说:“这是我所飞过的飞机中最好的飞机之一。”到 1991 年上航公司共装配交付了 25 架 MD—82 飞机,全部获得 FAA 颁发的适航证,已在国内外 121 条航线

上运营,使用情况良好,质量可靠,用户满意。

为了开展民用航空适航工作,我还参加编写了《民用飞机适航管理》一书,该书于1995年获航空工业总公司颁发的科技二等奖。

再创佳绩

1993年7月我退休,几十年的工作积劳成疾,按说应好好休息,安度晚年了。可是刚退下来,就有几个单位争相聘请,北京科源轻型飞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就是其中之一,几次到家来要我给他帮忙,并说可以不坐班,每周来指导几次就可以。当时我爱人和孩子们都不同意我应聘,而我认为北京科源公司是为我国研制一种轻型飞机,可以弥补我国这方面的空白,属我国民族工业的一部分,我学的是航空专业,又有几十年实践经验,尽管身体不好,还可以发挥些余热,于是就答应去试试,结果一试就是八年多。

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我参与了两件事:一件是为中国航空业和北京市建成一个航空产品生产基地;另一件是为航空工业又研制成功两种新型号的民用航空产品——AD—200型飞机和中华型热气飞艇。

AD—200型飞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第四代轻小型飞机,属多用途飞机,可以作为教练机、农用机、空中旅游机和遥感机等。

1994年初,北京科源飞机公司开始研制这种飞机,当时根本不具备研制这种飞机的条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公司一方面按照AD—200飞机结构特点和性能要求,提

出改进和扩建厂房的方案及机场建设要求,由总经理主抓基本建设;另一方面从消化 AD—200 飞机图纸资料开始,组织对图纸结构工艺审查、编制工艺总方案等指令性工艺文件、组织设计工艺装备图纸和编制生产工艺文件,委托兄弟厂家制造工艺装备和生产 AD—200 型飞机零件及组合件,组织招聘工人和管理人员及培训等。经过公司员工共同努力,团结奋斗,终于在 1995 年将第一架飞机生产出来,并首飞成功。

1996 年 2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民航总局代表国家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的 AD—200 飞机颁发了《型号设计批准书》,向北京科源轻型飞机有限公司颁发了《AD—200 飞机生产许可证》,正式批准北京科源飞机公司生产该型飞机,结束了北京市不能生产飞机的历史。

中华 1 号热气飞艇是在 1996 年夏天开始研制的,于当年 10 月 16 日首飞成功,从此结束了中国没有飞艇的历史。11 月参加了珠海首届国际航空展览会,1997 年参加了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航空实验学会组织的飞艇体育表演大会。当时参加国家有六十多个,在亚洲仅有中国北京科源飞机公司制造的中华 1 号热气飞艇参加,我国获得了第十二名。

中华 2 号热气飞艇是 1997 年研制的,1998 年首飞成功!

这两种型号的飞艇均已开始小批生产,分别在北京、珠海、西安、宜昌、连云港等市地进行市场调查飞行,受到广大用户和体育爱好者的好评。

在航空工业战线上虽然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仍将发挥余热,继续报效祖国。

从贫苦的农家子弟到新华社记者

张春亭

贫苦多难的少年时代

我1934年8月30日生于山东省高唐县固河镇前窑子坡(今前坡)村一个祖祖辈辈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家庭,是姐弟四人中最小也是唯一的男孩,父亲张学恭决心省吃俭用供我上学。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奶奶也早已过世,父亲后来就过继给我的二奶奶做儿子,从此我们便有了一位比亲奶奶还亲的奶奶。

1941年秋,父亲送我入本村小学读书。那时的我常常因为家中无钱为我购买课本和文具而掉泪。家里本来已经很穷了,可父亲偏又得了三叉神经痛,经常疼得死去活来,奶奶到处托人找医生,寻求各种偏方,为父亲治病。先是在茶壶内装了滚烫的开水,用热气熏脸,父亲的右脸都被熏烂了,仍不能止疼。后又口含砒霜水以毒攻毒,这使得父亲常常整天整夜地坐在炕上,不敢稍稍打一个盹,生怕不慎咽一口砒霜要了命,就是这样,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供我上学,在最忙的时候还得下地干活。奶奶说服他变卖家产,到济南去治病也无济于事。有一天夜间,父亲疼痛难忍,便揭起炕沿上的一块砖头砸自己的脸,结果砸掉了两颗牙齿,从此,父亲说什么也不想活了。一个漆黑

的夜晚，父亲在院子里的槐树枝头上吊了，奶奶及时发现，把几位叔父喊来，他们把父亲放下来时，父亲已经断气了。见此情景，奶奶又叫叔叔把父亲的好朋友、略懂一点医术的王廷运请来做人工呼吸，直到快天亮时，父亲的心脏奇迹般地恢复了跳动。这时，我们全家人都哭了，如果不是奶奶临危不乱，恐怕我和姐姐又都成为没有父亲的孩子了。

不知是过去使用过的偏方起了作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父亲的三叉神经疼后来逐渐好转，家中也好像有了一些欢乐，但日子仍然过得非常贫苦。不管怎样，我的学习也安心一些了，因而学习成绩还比较好。稍大一些，每逢春节，我还为邻居们写写对联，受到乡亲们称赞。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到了1943年我九岁时，家乡又遭遇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父亲便带着我继母和三姐以及我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小弟弟下关外逃荒要饭，奶奶带着二姐和我在家度荒。

灾荒之年，学校自然也关门了。奶奶带着我和二姐靠吃糠咽菜度日，她老人家怕我吃不饱，便叫我去割草，送给日子比较富裕的人家喂牛，以期换得一口干粮吃，但没想到得到的回答竟是：“我们家的牛不吃青草，再不用割啦！”我们只能继续靠吃棉籽皮、树皮、野菜和草根来充饥。奶奶还要把稍微好一点的東西留给我和二姐吃，她自己却把枕了多年的一个脏枕头里的秕谷倒出来，淘洗了几遍，晒干碾碎掺上野菜蒸着吃。因此她严重中毒，两腿肿得发亮，最后小腿生疮流脓，疮口都露出骨头，连路

也不能走了,生命危在旦夕。我和二姐吓得直哭,但又没有钱给奶奶请医生,只能天天给她挤脓擦洗,没想到,奶奶竟奇迹般地好了。稍后,奶奶便又挪动着一双“小脚”,带我和二姐去种地。

没有粮食吃,三个人又怎么活呢?奶奶狠了狠心,托人给不满十四周岁的二姐找了个婆家,换回来十多斤玉米糊口,不这样,我们祖孙三人也只有等着饿死。二姐出嫁了,我和奶奶就用那十几斤粮食继续掺着野菜、草根、树皮吃,总算勉强接上新粮下来。

父亲、继母和三姐他们在东北过着逃荒要饭的生活,小弟也因冻饿生病而夭折了,父亲又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直至抗战胜利才被解救出来,和继母、三姐相继返回家乡。我重新入学复习,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王庄完全小学五年级读书,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父亲肩挑玉米和柴火,到学校为我顶交学费。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学年后,我又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

1946年秋,家乡获得解放,随后本村又成立了小学。可我那时根本不可能想去哪里继续读六年级,便又重新入本村小学四年级读书。土改运动中,村里成立儿童团,我被任命为儿童团指导员,经常带领团员站岗放哨,参加土地改革。我们家也分得了上地、粮食、被褥等,生活有了好转,一家人都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我学习也更加用功了。

万万没有想到,一场飞来的横祸竟又降临到我的身上。那是1948年3月的一天,我在上学路上,小腿肚子被

一条狗咬了四个窟窿,随后又听说那是一条疯狗,父亲到处求医,为我治伤,各种迷信的、中医的方子全都用了。说也奇怪,我的四个伤口果真一处也不曾感染化脓,一个多月后,我竟又去上学了。

1949年1月,我再次入王庄完小五年级读书,因为是住校,奶奶还特意为我做了两条短裤,以免我和同学在一个屋里睡觉时还光着屁股。这是作为农家子弟的我生来第一次穿短裤,所以记得特别清楚。为不辜负家庭的期望,我在学校格外用功,因而也很受老师喜爱。1950年7月在全县会考中曾取得第十名,获县教育科颁发的笔墨之类的物质奖。我因辍学和重复入四、五年级读书,以致延误了三年多的时间。可是,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又怎么可能继续上学呢!

能够读完中学多亏国家给我的助学金

1951年1月,我考入高唐中学读初中,课余阅读《韬奋文集》等进步书籍,激发了爱国热情,积极要求入团,遂于1952年1月15日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任团干部。因我酷爱吹军号,中学期间参加了学校军乐团,经常参加下乡宣传活动。1952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来高唐县作报告,我更是使出全身的力气,吹响我的军号,以表示我对他们的热烈欢迎,还写了一首长诗歌颂志愿军英雄。

1953年7月,我初中刚毕业,便积极报考南京工程兵学校,卡车拉着我们到聊城进行体检。当时我的身体非常瘦弱,曾被工兵学校来招生的老师称为“贫血的小鬼”,

最后因为“体重不够”和“贫血”而未被录取。之后又被送回高唐。若按当时的家庭情况我是不该考高中的,但是我的目标是上大学、干更大的事。我又步行一百多里路赶回聊城报考高中,考试结束,再次徒步回乡。8月,我高兴地接到录取通知书,随即进聊城三中高中班读书。在学校,既刻苦学习,又积极要求进步,于1954年5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除认真学习课本知识外,就是入迷一般地热爱诗歌,灵感一来,常常辗转反侧,彻夜不眠,默吟诗句,强记在心,天亮就赶快写下来。那时,拙诗经常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校教导主任李春野老师多次鼓励我。在校期间,我任学生会学习部长,还于1954年1月和1955年6月先后获聊城三中文艺创作奖和优秀团员奖,并被被评为三好学生。

我之所以能够读完初中和高中,多亏国家发给的助学金。同时也曾得到老师、同学和亲友的接济,所有这些都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高中即将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在评定本班同学谁应该享受助学金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助学金是有定额的,我作为一个班干部,又是一名党员,若申请助学金,又怎么动员说服别人尽量不要申请助学金呢?为了表现自己,我决定放弃申请助学金。我一面给几个亲戚朋友写信借钱,一面给家里写信要求父亲想办法解决我的学费和伙食费问题。那时,在我下面已添了几个弟弟妹妹,家中经济依然十分拮据。奶奶便抓了她养的七只老母鸡换成钱,又叫父亲把过去用的一台旧轧(棉)花机当废铁卖了,钱仍差不少。父亲到我

早已出嫁的三姐家去筹措了十五元钱,我的学费是交上了,而这钱是怎么来的,我竟一概不知。时隔四十五年后的2001年“五·一”,我返乡省亲再次和三姐回忆祖母时,才弄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使我感到十分愧疚。这件事也说明我当时上学的艰难,但是,没有国家的助学金,我是绝不可能读完高中的。

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度过了大学四年

1956年7月,我高中毕业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破天荒地成为我们家第一名大学生,村里的人都为我高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离家到济南去上学前,奶奶将上改时分的大花格被褥重新拆洗后给我带上,还特意把她准备作寿衣的一条带暗花的黑绫子长裤给了我。那是一种大裤腰、大裤裆的中式裤子,对城里人来讲,这种样式的裤子早已过时了,而我却如获至宝般把它装进了行李,入学后还真的穿了出去,也未遭到别人的讥笑。

大学四年间,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磨练,除第一学年比较正规地在课堂上学了一些知识外,后三年基本上都在当运动员,坐下来听老师讲课的日子为数不多。1957年,党组织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委提意见。一天夜里,宿舍的同学在写一张给院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我不曾插一句话,他们把大字报写完了,为怎样签名的问题争论起来。我只说了一句:“就写‘中文系一群学生’不就得了吗?”结果在稍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我因此在党内受到批判,定性为犯了丧失党的立场的错误,多次作检查。值得

庆幸的是,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我积极拥护,踊跃参加。同年12月,在梁山县创办农业中学时曾获模范教师称号。1959年反右倾,我把回家过暑假时看到的家乡严重浮夸风和饿死人的现象私下告诉我最要好的同学,他叮嘱我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我吓得回头就把回乡写的日记偷偷地撕碎,扔进便池内冲掉了。同年末至1960年暑期,学校批判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就在这种声浪中一边批修,一边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撰写了《论人民诗人李季》(也是我的毕业论文)。尽管我们写的东西带有一些极左的思想,但最后这大半年,总算坐下来读了一些书籍。

大学四年间,我还因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抢收抢种和校内烧石灰等生产活动,两次被评为山东师院先进生产者,并获得劳动奖金。最后一年间,一天到晚忙的都是批修。大学期间,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并任院刊副刊编委,在院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每年寒假返乡,我都同村干部和戏曲爱好者一起组织学生和农村青年搭台演戏,开展文娱宣传活动,并扮演角色。大学最后一个寒假我和村里的几位青年被选拔参加了全县文娱汇演,在县文庙演出了一出小话剧。

原本想当教师,没想到却当了一辈子记者

1960年8月我大学毕业,恰逢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到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挑选一名记者,我有幸被选中。对于已经做好了当教师准备的我,实属喜出望外,许多同

学也都向我表示祝贺。9月我即到新华社山东分社上班，主要任农村记者。我在学校学的是语文专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便挤时间学习新闻知识，开始采写的几篇稿件都因主题不集中、材料不充实以及文笔幼稚等问题而未被采用。后经虚心向老记者学习，努力到实践中去积累经验，接受锻炼，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逐渐入门。

1961年，家乡遭受水灾，原本已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生活更加困难，父亲也在这年因病离开了人间。

1962年我结婚几天后，便赴沂源县山村采访，所写关于特等残废军人朱彦夫（《极限人生》作者）的人物通讯很快为新华社播发，被全国多家报纸刊登，引起了较好的反应。不久，我接到了上级调我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工作的命令。为报效祖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支援大西北地区的建设，我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调动，于1963年春节前夕，告别了妻子，独自一人奔赴兰州。在那里，继续任农村记者，经常到中部干旱地区和河西走廊等偏远地区采访，曾在张掖农村参加过“四清”。

1965年4月，越南形势紧张，我又奉命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参加军事记者集训，旋即到云南小勐养少数民族支队当兵锻炼和下部队采访。后受总社派遣，于同年8月1日随我高炮部队进入越南安沛市，参加援越抗美战斗，在北越战场任随军记者。进入阵地第二天上午，我军即击落一架美国F—105战斗机，美机驾驶员也被越南民兵俘虏，我参加了我高炮部队对美国战俘的审讯。以后又深入连队，和战士们生活战斗在一起，并几次参加了我高炮

部队的游击战,在雨夜和战士一起拉炮上山,滚得像泥人一样。一天,驻守北越东部的我高炮部队一个师的地下指挥所被美机的炸弹命中,该师主要首长和参谋人员大部分牺牲了,有位解放军画报社的记者也被深埋在上中。从那以后,每次敌机入侵,连队拉响警报,我们都必须从地下掩体里跑到地面上来,以便主动躲避敌机,防止被动挨炸。这期间,我写了不少内部参考稿件,还曾到越南首府河内参加中越双方军事会议,荣获越南“团结战胜美帝”徽章、“八五决胜”徽章、“模范战士”徽章,1966年初回国,正式调入新华社总社军事新闻编辑部任记者、编辑。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兴起,陈伯达指示《人民日报》、新华社组织记者团,我又被调入该团,负责采写并向党中央反映首都机关、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1967年1月,记者团奉命归并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我被任命为该记者站学校组副组长,负责采写北京所有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供毛主席和党中央参阅。这期间,我执行过毛主席、周总理下达的采访任务,所写内参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带头质问正在清华园内观看大字报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被另一派学生组织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我采写的内参反映了这一情况。此后,毛主席又指示记者站派记者采访蒯大富,我奉命到清华大学采访了正在被关押的蒯大富。毛主席看了我写的内参,批示让蒯大富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三千人大会。从此,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学生领袖(以后他走向反面,是他自己的

责任)。有一次,蒯大富对新华社的老记者彭运南说:“我要找你们的记者张春亭算帐,因为他写内参称我是反革命分子”。彭运南当即说:“那是保皇派那样称呼你,张春亭当时是客观报道。你可不要忘记,没有张春亭后来采访你,毛主席也不会作出批示解放你。你还应该感谢张春亭呢!”说得蒯大富无言以对。后来我得知这一情况,还真有点后怕,怕他纠缠不休,把我也打成“516分子”。

1967年春,记者站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派记者采访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我到河北省邢台地区完成采访任务后,又主动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采访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玉兰被残酷批斗的情况。周总理看了我写的内参后作了批示,为吕玉兰同志平了反,当年国庆节,吕玉兰即被请上了观礼台。

同年,武汉“7·20”事件(即造反派“百万雄师”扣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的事件)发生,次日我即奉命带领记者和发报员飞往武汉采访,那在一定程度上确有一些出生入死的味道。当时适逢造反派“百万雄师”攻打湖北大学,他们用推土机推倒了湖大的院墙,个个手持长矛追赶湖大学生的另一派。我也在被追赶的人群之中,跑了一段距离后,恰好碰到了军宣队同志出来紧急制止,才免遭一场灾难,我当即到军宣队办公室用电话向北京发了消息。那期间,作为一个记者,完全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不敢暴露身份,晚上还要另找秘密的地方住宿,直至“百万雄师”被勒令解散,我们才敢公开露面。在武汉一个多月,我所写的内参,有几篇

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对解决“7·20”事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文革”初期,我曾执行过周总理下达的任务。当时,学生造反派的“联动分子”活动猖獗,周总理指示记者站派记者前往天津向市委书记解学恭传达指示:“注意‘联动’动向,并采取措施。”只能口头传达,不得见诸文字。我奉命到了天津,得知解学恭已被造反派扣留,但不知关押在何处。经请示,认为即使找到解学恭,他也无法执行,我只好返回北京。

1968年,爱人在兰州生病,我请假探亲,事后再回记者站,却未获批准。那时,记者站内部正在搞运动,有些和我一起工作的记者被打成了“516分子”。事后想想,我也算万幸,如若获准回记者站,还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分子呢。我又回到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原新华社军事新闻编辑部)继续当军事记者和编辑。因为前期我没有参加新华社的派系斗争,我还被选为新华社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中间,我在解放军总分社主要负责国防部外事新闻报道。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巴卢库1973年最后一次访华,我自始至终跟随采访,还参加了国家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比如,1972年由外交部组织的东海大陆架科学调查,我随“向阳红”调查船在东海的广阔海域漂泊了一个半月,经受了七八级大风大浪的考验。船上几百人只有三人不晕船,我是其中之一,常常深夜和科研人员一起作业,其他年轻记者晕船呕吐,我就给他们洗涮和打饭。归来后发了消息和内参,所发新闻通讯,是粉碎“四人帮”

后新华社第一次以记者采访日记的形式发表的。1979年我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正团级编辑、记者,先后到全国许多部队采访。1981年到青藏公路各兵站采访,翻过海拔六千米的唐古拉山到拉萨,军区首长为我准备了氧气,我一口没吸,都给同行的记者用了。从事军事记者二十多年,写过大量军事国防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等,有些作品,如与他人合写的《刘帅与军事院校》等获得新华社好新闻奖。

1986年2月,我又转业到新华社《瞭望》周刊工作,先后任文教组副组长、《瞭望》海外版总编室主任、《瞭望》编委。1988年9月初,应邀赴芬兰采访,受到芬兰总统接见。1991年3月,应邀赴新加坡访问。同年4月,受组织委派赴香港任《瞭望》周刊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负责《瞭望》海外版的编辑、出版工作,编辑、校对、画版、跑印刷厂样样都干,经常通宵达旦,就是这样,我仍然插空外出采访,写一些人物通讯。1993年11月回《瞭望》周刊编辑部任编委兼政治编辑室主任,1994年被评为新华社高级编辑,1995年初退休,继续被返聘工作三年,1998年1月全退。在《瞭望》周刊工作十多年间,先后写有大量新闻评论、工作调查、人物通讯和报告文学等,有多篇作品获得全国民政好新闻奖、新华社和《瞭望》周刊好新闻奖,本人也多次被评为《瞭望》好编辑、优秀工作者。一生著有新闻作品集《创造奇迹的人们》、《垒石集》(合著)等,以及同夫人张月娥合写的环保教育科普读物——《听爷爷讲环保故事》(2001年5月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

奖)、《妇女与环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执行“妇女与环境”项目)等多部著作。前后共采写了五十多位海内外知名人物和部分英雄群体的通讯和报告文学,约四十多万字,正准备编辑出版。

我自幼酷爱诗歌,学生时代写过许多新诗,但发表的很少,在大学生校刊上曾发表过一些散文和诗歌。从事新闻工作后,因采访任务繁忙,写诗较少,仅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上发表过少数新诗和古体诗。所写新诗《新喇神颂》获1995年首届“洞庭杯”文学艺术大赛二等奖。退休后学习写作古体诗词较多,作品大多发表在新华社出版的《新华诗叶》、《老年生活》等刊物上,并有几十篇诗词被分别收入《中华当代词综》、《党旗颂·诗词联大观》、《类编中华诗词大系·景部》、《中国旅游诗精选》、《十家诗选》、《甘苦寸心知——中国当代诗词家代表作自赏集》等十多部诗集中。现为新华诗社会员、海南诗联协会会员。个人简历已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名人辞典和国内出版的《中华诗词艺术家传略辞典》等。

2001年被聘为北京民族大学分校教授,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学》。现在依然笔耕不辍,采写各种新闻人物,已在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发表十多篇人物通讯,还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编辑审阅过许多书稿。

生物物理学教授李兴诗

刘 刚 整理

山东师范大学原生物学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兴诗教授是高唐县高唐镇于庄村人。从教四十余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在生物科研领域有所成就，先后获得奖励十六项，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农学会、制冷学会会员，先后任山东省生理科学会、原子能农学会、养蜂协会、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山东省生物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山东省高等师范生物学系主任联席会主席。

1934年9月29日，李兴诗生于一个较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家乡于庄距县城近又靠公路，日寇侵华时期时常遭受日寇的骚扰，他五岁那年跟随大人在逃难的路上摔破了头，至今还留着伤疤。他的父亲李思远是小学教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高唐唐北区区委委员兼区长，解放后先后任高唐城内及尹集完小校长、高唐一中教导主任、夏津县一中教导主任等职，1985年病故。李兴诗七岁时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1943年转入高唐城内小学走读。1945年8月高唐县城解放，其父李思远此时受党委派创办高唐第一完小，李兴诗是完小第一批学生。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背着行李带着干粮，步行一百多里去报考临清一中，李兴

诗被临清一中录取,但他没有去临清上学,原因是当时高唐短期师范也在招生,上师范管饭,离家又近,城内完小毕业的甲等生还不用考。当年年底他免试进入高唐师范(二级)读书,在此期间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50年他所在的学校与清平师范合并为平原省清平联立师范学校,校址在清平。当时生活仍然艰苦,但政治空气较浓,师生积极性高涨,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常参加建校劳动,抗美援朝期间李兴诗还参加宣传活动,排演活报剧《刘胡兰》、《打渔杀家》等,他在《打渔杀家》中扮演卷毛虎倪荣,曾在旧城、张庙、聊城新华舞台演出过。

1951年7月他在清平联师毕业,分配到高唐西关石方院小学当教师,十六岁的他迈出了从教的第一步,他教一、二年级语文、三、四年级算术及全校的体育、音乐,均为复式教学。学校还有一位叫于忠义的教师,1951年雨水很多,一天早上醒来,水漫了整个学校,两人只好游泳出了学校。那时他渴望继续学习深造,当年9月,经县教育局批准参加考试,他被济南师范录取。1954年7月济师毕业又被推荐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生物系本科。由于品学兼优,积极上进,他是同年级第一个入党的大学生,四年中他勤奋学习,牢固掌握了生物学专业的基础知识,1958年8月毕业留校任教。从此,他在大学讲台上一站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

回首四十余年教学生涯,虽然清苦,但他感到无怨无悔,在生物学领域他用知识和智慧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断学习实践更新知识,圆满完成了十门课

程的教学任务。

1958年本来他是作为植物生理学助教留校的,可学校破格让他担任大一的植物学主讲,这种做法是过去少有的,他感到这副担子很重,但还是接过来了。1959年9月由于生物系增添尖端课程,李兴诗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山师大选派去北京中国科技大学进修生物物理学,直接受到中科院科学家的熏陶,学到了新知识,增长了新才干。期间科大缺少专业教师,校领导让他在进修的同时给科大生物情报系58级学生讲放射生物学。他拼命挤时间学习,“现发现卖”,教了学生,提高了自己,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讲生物物理学是他的本行,在科大进修期间他就承担了山东师范学院生物物理学的教学任务。“文革”中生物物理学停开,他改行讲微生物学,只是先当学生(自学)后当老师。他还给山师76级学生讲遗传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山师向学生开设选修课,他又承担了生物工程学、现代生物学概论的教学任务。1979年开始他给研究生讲授生物物理,1984年后陆续给研究生讲授低温生物学、细胞生物物理仪器与技术、低温细胞生物学三门新课程。

几十年来,他严谨教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参与和主持了以下七项科学基金项目:

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研究:在科大进修期间参加了 $^{60}\text{Co}-\gamma$ 射线对小麦、番茄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1963年组织专门人员研究 $^{60}\text{Co}-\gamma$ 射线对豚鼠器官、组织影响及 γ 射线对小麦染色体影响。

庆大和曲吉霉素的试制:是在“文革”期间参与试制工作的,填补了当时我省这两种药品生产的空白。

污水处理研究:1974年参加由轻工部等单位组成的济南造纸东厂污水处理联合攻关组,李兴诗承担了塔式生物滤池处理造纸废水试验,1975年底,上海建设人造板厂聘请他进行了人造板污水生化处理研究,连续工作四十多天,受到厂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肝抑素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获1984年山东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低温保存花粉、肝细胞、猫精子、兔精液的研究:1982年开始此项研究,陆续发表论文多篇,其中临清狮猫胚胎移植研究为省教委课题,他承担了猫精子的超低温保存,1989年获省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家兔精液的超低温保存获1994年省科委优秀论文三等奖。

名贵花卉唐菖蒲的研究:省教委课题,1990年通过鉴定,为国内先进。

天然山楂汁加工工艺的研究:省科委课题,1992年通过鉴定,为国际首创,产品属国内先进。

1991年,经山师大、省教委及国家教委选派,山师大生物学系动物胚胎移植研究组——李兴诗等三人以访问学者身份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动物学系工作三个月。

李兴诗1994年退休,后被返聘工作至1998年夏,现住济南。

他的著作有《生物物理学》、《细胞生物学实验》等,另

外几十年来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他的传略被《当代中国科学家发明家大辞典》(第二卷)、《东昌人物》(续集)、《世界名人录》等二十多种书刊登载。

矢志不渝 献身气象事业

——记山东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张世昌

刘 刚

张世昌,九三学社社员、山东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1934年他生于高唐县尹集镇大张庄,先后就读于高唐县立中学、济南市黎明中学,1951年考入山东农学院附属农校,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德州专员公署建设科工作。1954年组建地方气象局时被选送到华东军区司令部空军气象处学习,后留在省气象局工作,从此与农业气象工作结缘。他是我省农业气象工作开拓者之一,先后从事气象测报、气象教学、气候资料分析、农业气象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及农业气候资源调查和区划等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他被省政府农业区划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86年被国务院农业区划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同年被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评为四化建设先进工作者。

一

农业气象是介于农学和气象学之间的一门边界学科,专业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又广,对于农业、水利等十几个行业的影响和作用巨大。张世昌自知基础较差,只有不断充实提高自己,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几十年来他边

学习边实践,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农业气象知识,从一个农业气象门外汉变为业务能手。他至今忘不了对他影响较深、受益最大的一次学习机会。

那是 1958 年,苏联专家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全国气象讲习班,分给山东气象部门一个名额,张世昌幸运地被选中参加。期间他在苏联气象专家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农业气候学、农业气象学、农田小气候等十多门课程,掌握了农业气象的基础理论,为后来的科研和独立主持业务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从事气象工作几十年的实践中,他注重知识更新,不断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农业命运密切相关的气象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张世昌认为这是把气象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大好时机,为适应新形势下农业气象工作的需要,提高业务水平,1980 年张世昌又争取参加了国家气象局举办的全国农业气候区划学习班,听取了气象专家们的专题报告,学习了农业气候分析与区划方法、数理统计等课程,为完成农业区划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世昌广泛涉猎各类有关书籍,从中汲取知识和信息,图书馆便是他的常去之处。在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他经常一泡就是一整天。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山大生物系的著名教授周光裕先生,深受其影响,并在周光裕先生的力荐之下,于 1984 年加入九三学社。

1984 年,张世昌负责全省农业气候区划工作,工作任

务重、时间紧,但他还是抽时间参加了山东省第一期农业系统讲习班,进修了线性规划、排队论、系统论、对策论和决策分析等课程,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期间他由于学习领会快、经常帮助其他学员,被学员们称为“半导体”。结业时五十岁的他,硬是凭着坚韧的毅力拿到了平均90分以上的好成绩。后来,他又自学了两门外语。在张世昌看来,知识需要更新,要适应工作需要就要勤奋学习,勇于实践。

二

张世昌长期从事农业气象业务技术指导和管理工作,他淡泊名利、爱岗敬业,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他认为搞好气候区划工作“功在调查,重在协作,贵在综合,好在应用”。

在气候资源调查工作中,他亲自到山区、丘陵、湖泊、平原等各类型区布点考察,获得了大量科学数据,摸清了山东气候资源的家底,揭示了各地区气候变化的规律,为全省农业气候分区划片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实地考察中,张世昌和年轻人一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不以前辈自居。负责气候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的八年中,他带领有关人员深入基层,踏遍了山东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完成了123个县市的农业气候资源分析和区划报告,审稿累计达170万字。每一个课题的规划、编制、调研,每一份报告的起草、修改、审核,他都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审查稿件经常通宵达旦,但成果出来后他很少署名或将自己的名字署在最后,心胸的豁达可见一斑。同时,他在干

部培训工作中,主讲了农业气候等多项课程,共培训干部1008人次,其中中高级技术骨干286人,都能独立编写区划报告,初级技术人员714名都能完成资料统计等各项任务,为搞好全省气候区划打下了技术和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后,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气象工作更加重要,张世昌感到遇上了发挥才能、贡献知识的好时机,他拼命工作,每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基层度过的。1986年,在张世昌同志的协调策划下,烟台市气象局抽调的4名业务骨干,对烟台市的气候资源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烟台市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探讨》的调查报告。初稿拿出来后,张世昌亲自修改,一熬就是半夜。那天正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八月十五,而忙于工作的张世昌却没有想起来,更不用说回济南与家人团聚了,直到烟台市的领导邀他一起过中秋节时,才知佳节已至。

三

作为农民的儿子,张世昌深知农村的落后和生活的艰苦,坚信只有科学才能强国,只有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才能富民,所以工作中他勇于开拓,并将自己农业气象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他的研究成果为农业的合理布局、分区发展、确定和改革耕作制度、栽培措施以及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等提供了农业气候依据,为保证农业生产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克服不利的农业气候条件,实现农业的高产稳产、优质高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西洋参原产于北美洲东部,是一种名贵的药用植物,我国药用西洋参始于清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一向靠从外国进口,每年需支付大量外汇。为了改变西洋参依赖进口的局面,张世昌参与了烟台市气象局农业气候区划课题组,初步分析了西洋参的气候生态环境条件,在农业气候分析鉴定的基础上,利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提出采用隶属度来标征西洋参气候生态适宜程度,从而区划出了西洋参在烟台地区的适宜种植范围,为西洋参的引种率先提供了科学的气候生态依据。1986年7月,西洋参在烟台引种成功,填补了国内西洋参种植生产的空白。

张世昌在主持全省农业气候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的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他根据多年从事气象工作的实践,主持编写了《农业气候讲义》、《农业气候区划方法大纲》和《山东省级农业气候区划成果应用经济效益事例汇编》,撰写了《气候与农业生态系统》、《农业气候资源综合评价及其生产潜力》、《烟台市农业气候资源战略探讨》、《黄淮海平原气候资源的利用与灾害防避》等论文。他主持完成的课题《山东农业气候区划》获1985年山东省政府农业区划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黄淮海平原气候资源评价》获1987年中国科学院科技特等奖(他是该项系统课题的参加人之一,参加了该专著编写工作);《烟台市农业气候区划》获1987年省政府农业区划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沂源县农作物优化种植决策研究》获1989年国家气象局气象科技扶贫工

作奖。

1994年为农业气象事业奉献了四十二个春秋的张世昌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然而他却退而不休,继续关心我省气象事业的发展,经常往返于省内各市地指导业务,参与农业气象工作的技术培训。他还为济南外国语学校牵线搭桥聘请外国专家在该校举办俄、德、法、英、意、日等国语言培训班,被聘为该校高级顾问,满腔热忱地为社会贡献余热。

游子魂系乡土风

苏 智

故乡，高唐，这方热土，时时盈盈于心，永难忘却。足迹南疆北国，路经域外海内，行踪碌碌，岁月累累，而今年近古稀，半个世纪已过，却仍是改不了的乡音，忘不掉的乡情。

登上埃菲尔塔顶东望，想起她；立在三八线的丁字山回首，想起她；吃着南国的荔枝菠萝，想起老家的梨枣；穿上高档的精棉衣料，想起优质的高唐棉花；曼谷金佛殿里，想到家乡的庙堂钟楼；漫游黄山桂林，也会联想到家乡那无名沙丘河滩池塘……家乡对我的影响，给我的滋养，实在是良益多多。

我 1934 年 10 月 16 日出生在高唐城南姜店乡一个富庶而又人杰地灵的村庄——张井。村东粘性土质盛产粮食，村西沙性土质最宜植棉。村民勤朴且重文化，殷实人家供子弟上学，无不倾力以付，出村进城进省进京的都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出了两位留学生，一位留日，叫刘本森；另一位留美的水利博士叫苏兰生，是我的叔祖父，他曾亲自打造了高唐县第一口大型机井。我的祖父是个植棉能手，因“看着书本种田”而小有名气。可他的后代却都离开了农田，我的父亲、大哥、妹妹、弟弟都进了教育界，唯独我，虽毕业于师范而进入剧团，学的是“一二

三”，改念“刀来咪”。好在搞创作写文章，学业未全荒废，有时还到外地讲学或大学代课，也算扮演过几回为人师的角色。因我是国家一级作曲，正高职称，学界常戏以“教授”、“学者”相称，我也就默认了。

我与艺术的缘分，除个人志趣外，家乡的耳濡目染是很深的。年节的高跷秧歌，平日的卖艺人进村，说大鼓唱坠子，变戏法玩把戏，肘葫芦头的傀儡戏。还有祈雨祭神红白喜事，请和尚道士吹鼓手，对棚奏乐；建房打夯及油坊打油的号子，田头炕头上，天天可以听到的民歌小调，都是我音乐创作的源泉之一。农村最大的娱乐，莫过于唱戏。高唐有一种叫“四根弦”的小戏。传到鲁西南和豫东，叫“两夹弦”。在鲁北叫“一勾勾”。据说源头可能就在高唐（“两夹弦”中有一个曲牌“北词”就是高唐艺人传授的），就连我们吕剧也吸收过它的曲调。

在家乡常听的戏，还有“横笛梆子”——即“河北梆子”。《秋胡戏妻》、《三娘教子》、《辕门斩子》等剧目，唱腔高亢激越，推车的锄地的都会唱几句，至今还有印象。评剧在高唐也很流行，当年都称之为“蹦蹦”或“落子”。言情戏很多，老人们斥之为“粉戏”，禁止儿女观赏。但禁而不止，年轻人偷着也要学段唱腔。

要看大戏，还是京剧。有些名角身价很贵，“上台不上台，一天几百块”，穷乡贱年是绝对接不起的，戏台搭的也特别壮观，草台子不收票，学生不上晚自习，都去看戏。回到学校，比比划划，咿咿哑哑，半边拉块的摹仿。音乐老师见我嗓音好，就拉着胡琴，按照戏考乐谱教我。以后

凡有场合,就带我去亮亮嗓子,混一堂掌声。

1948年报考县立师范,我是第二名。第一名李春元学兄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的侄子。当时学校里名师云集,他们有的曾教过我的父辈,有的兼有举人秀才功名或北大浙美等名校的学历。有傅锡三、李和轩、林萼青、郭汉涛、王惠民、董之祯、庄雨田等,都是我得益终生的恩师。在班里我年龄小,不太用功,但学业并不偏科。语文数学课有时还得到老师称赞,文娱方面我是当然的骨干,宣传联欢中很多节目都少不了我。记得王惠民老师排演《捉放曹》,我饰陈宫,傅登寅扮曹操,李兴诗演吕伯奢。迁校至旧城后,我还演过《打渔杀家》中的吕子秋,说过山东快书。最难忘的是我和鞠立楷、焦金甲等学兄演出的活报剧《扫除文盲》,每逢演出都是人山人海,个个捧腹,掌声不迭,好不快活。

1951年毕业分配时,我发愁了,个子没长高,夜里还尿床,如何去当孩子王?! 恰逢聊城文工团招人,真是天赐良机。我因粗通乐器又自学识谱,幸被首选录用。入团后就成了业务骨干,负责教歌,兼演戏伴奏打腰鼓。到平原省音干班进修,我被破格选人高级班,专修作曲、指挥。1952年文工团整编为平原省艺校四队,排演评剧,我负责记谱兼编曲。《小女婿》、《柳树井》、《救济包》等剧,曾在高唐县梁村、辛店等地演出。

1953年平原省撤销,艺校四队调归山东。正好山东省在筹建一个吕剧团,其成员要从各地文工团中挑选,我又幸被选中,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最初学三弦,研习过

大三弦、小三弦、木板三弦、羊皮三弦、钢弦、丝弦、单拨、双拨、斧头拨，学习了西河大鼓、单弦、京韵大鼓的弹奏技巧。勤学苦练反复实验，探索三弦演奏的吕剧风格。但在实践中对三弦表现力的单一，又深感不满。为此在巡回演出中，南下向名家程午加先生学习了琵琶，北上拜古筝大师赵玉斋先生学习古筝。以琵琶之清丽，表现《庵堂认母》中幽静孤寂；以古筝之凄美，烘托《蔡文姬》的儒雅忧怨和《李二嫂》的悲苦愁绪，更增添无穷韵味。由于我首先在吕剧乐队中使用了古筝、琵琶、柳琴等乐器，大大丰富了吕剧音乐的色彩和表现力。

从事戏曲艺术工作的高标准，讲究的是“六场通速”。吹、拉、打、弹、唱、武，要都能合得起来，起码要“一专多能”。因为我学作曲，当然就会更加留意。在专攻弹拨乐的同时，对乐队的整体功能，舞台艺术的综合体现，细心观察体悟，力争通熟。在乐队我还拉过二胡、板胡、坠琴及低音提琴等，吹过笛子唢呐，也摸过打击乐。伴奏中对各种唱腔唱词熟诵强记，熟悉舞台上剧情动作舞蹈武打与音乐的配合。平时还要听唱片、听录音，看戏听曲艺，采访艺人老师，记谱摹唱，广采博取，触类旁通。1954年我即开始了吕剧作曲。

作曲，曾是我儿时梦想。上学时经常信口哼唱一些奇怪的调调，自信自己也能写歌编曲，后来学了歌曲作法。可是写戏比写歌要难得多，不只是把唱词配上曲谱，而且要顾及到剧种风格、人物性格、感情气氛及板式行当的规范等。许多优秀的著名唱段，甚至要经历几代艺人

的反复锤炼,方能成熟。何况我们接手的吕剧是一个初级状态的年轻剧种,不但唱腔不固定,就连每个角色的唱词,也是靠艺人台上即兴发挥,一遍一个样。应该说,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定腔定谱”,才开始健全行当,增补板式。在当时既无师从的范本,又无现成的教材,无异于再造一个新剧种。而这个新剧种要独领风骚,要不同凡响,就不得不在戏曲规范、音乐审美及文学格调上,给予高屋建瓴的文化关照。能不能产生吕剧的优秀剧目和优秀演员,作曲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面对双重的困难,必须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努力。为了充实内虚而厚积薄发,要学习研究大量的音响曲谱及理论资料,要遍访名师,多方观摩,集百家之长于己身。为了创新的成功而勇于探索,不惜“徒劳”的尝试,不惜通宵不寐,百改不辍。1956年我的成名作吕剧《燕燕》一剧音乐问世,当即得到专家称赞和观众的首肯。在这出关汉卿遗作名著改编中,我成功地创作了吕剧的青衣慢板,动情地写出了几个人物新颖别致丰润隽永的精彩唱腔,成为流行一时的保留剧目,在胶东的演出尤为红火。

此后每写一个戏的曲子,都坚持创新,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力求优美动听,深刻动人;力求写出个性,写出意境;力求每戏都有所创建,有所发展。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常常把自己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磨炼了意志,也磨炼出了智慧和成品。不少有影响的曲子形成了自己诗化脱俗、醇厚凝重的个人风格。我也因小有成就而忝列为“吕剧四大作曲”之一。

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开创,一个濒临衰亡的小戏,由复苏而中兴,一跃而成为省剧之冠。新花初绽,异香四溢,戏剧界为之刮目,全国各地学吕剧者,趋之若鹜,纷至沓来。吕剧由一而十,仅专业剧团曾逾半百。记得1958年高唐县也曾建吕剧团,有我的同学田中水、王曰群任领导,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可惜后来划归禹城县了,只有文化馆的郭英超仍在坚持高唐县的业余吕剧活动。吕剧与高唐有缘未遂,实在是我平生一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吕剧盛行是颇有声势的。

我身受吕剧之惠,曾荣幸地见到过许多位伟人圣哲,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罗瑞卿、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罗荣恒、陆定一、彭真、胡耀邦、杨尚昆、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郭沫若等。特别是刘少奇主席1958年来山东,在省委小礼堂看戏,休息时他只身步入后台,还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后王光美同志和省委领导也跟进来。刘主席在后台和大家亲切地交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我们剧团还以刘委员长视察高唐为素材,编演了《天安门前银花开》一剧,我是该剧的编剧之一兼作曲。当然,处于浮夸时代的局限之作,现已无足论析,但在舞台上直接表现领袖,确是近乎超前了。陈毅老总几次看过我们的演出,他说山东是他的第二故乡,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彭真同志看吕剧后说:“我也是山东人,老家在桓台”。郭沫若先生看了吕剧后,很高兴地命笔赠诗,当即将他的新作《蔡文姬》推荐给了我们剧团。我也有幸参与了该剧的

作曲。

剧团生活，有苦有乐。最苦的是创作，最乐的还是创作。

数十年的创新实践，几乎都在求新求变力达精优的努力之中。虽然是困惑多于灵感，弃稿多于成品，但从未降低格调。纵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有所得，有所获，也是如添家珍般地满足庆幸，哪怕是无名无利，也心甘情愿，这种快乐，可以忘掉所有的痛苦。

——电台转来安徽省听众来信，索要我写的吕剧唱段《运河滚滚通长江》。吕剧辐射到黄梅戏的辖区之内了。

——剧场里“叫好”的掌声，令台上惊喜而又觉意外。喜的是为演出“叫好”，而出人意料的是，为“唱腔”叫好。因为吕剧唱腔的先天不足，就是过于平稳柔婉，缺乏激昂挺拔且落音低松，注定是叫不起“好”来的。观众总嫌“不过瘾”、“不来劲”，对于吕剧能否像京剧、梆子唱腔那样，也能来个“满堂彩”、“炸窝子”，早已无此奢望。谁来闯此难关，大任降于“作曲”，成败就看我们了。吕剧唱腔真的能叫出“好”吗？多年来犹疑期盼，今日终成现实，这掌声就是对作曲创新的肯定。一是《三关排宴》中佘太君痛斥叛徒逆子的唱腔，开辟了老旦行为的唱腔。我根据剧情人物的需要，进行了旋律起伏，布词踩句，放音施腔的强化加工，突出了人物悲壮和怒不可遏的激情，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一是《箭杆河边》中老庆奎的“反四平”唱腔。我重新写词并作曲，由追忆家史深情缅怀痛诉深仇，

层层递进严词扣问愤怒斥责，从苍劲的正板、深沉的吟板，到句句追逼字字铿锵怒火如喷的快板转散，义愤填膺，荡气回肠，台上台下激情共振，一段唱腔三次叫好，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在吕剧唱腔中无此先例。再就是《红灯记》中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一段唱腔。在京剧中，借鉴了小生“娃娃调”，别出匠心非常精彩。吕剧怎么办？没有那么多的遗产可参照，唯一出路只有新创，走前人未经之路。我采用了变节奏以改四平八稳，提声调以抒悲愤激情，加力度以壮奋斗声势，仿男声增加阳刚气质。这段创新板式，是吕剧音乐中从来没有过的。新腔定名[上反调]，其板头、定调、定弦及花旦行为，皆属首创，丰富发展了剧种音乐，每唱必爆以热烈掌声。在气势情韵艺术审美上，不失为上品。

——锦绣川杯吕剧大奖赛十佳演员中，有两位唱的是我写的曲子。特别是《鹤鹑县令》一剧中，由我改词作曲的大段紧板，速度之快难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录音时，乐队都惊奇地站起来，看演员的嘴皮子功夫，叹服曲子的精到。

——全军文艺汇演，吕剧《梆声阵阵》获全票一等奖。总政评委打听曲作者，评价功力非凡。战士对我说：“你写的曲子，快成了我们部队的流行歌了”。

——吕剧《泪血樱花》一剧，日本友人观后，对音乐大加赞赏。该剧唱腔被选入《中国戏曲优秀唱腔选》一书。在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 1983 年年会的现场，得到一致好评。

——吕剧《挡马》由我作曲，我爱人周丽斌首演，开创了吕剧“刀马旦”行当的唱腔。

——电影莱芜梆子《三定庄》的音乐，是我跨剧种作曲，曾以风格浓郁个性鲜明得到音乐界权威的好评。在这个戏中我创的新腔，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仍在沿用。

——电视艺术片吕剧《玩会跳船》的编导作曲，是由我们夫妻搭档共同完成的。我爱人周丽斌是京剧尚派亲传弟子，为了创建吕剧的武功戏，由省京剧团调来省吕剧院。她是由演员转导演，我是由伴奏转作曲。在文化上她兼修编剧和剧评，我兼顾理论研究，生活上美满结合，艺术上默契配合，使我们的合作成功率很高，多年来，立志要搞出个像样的精品。这出吕剧版的《玩会跳船》，就是我们全方位创新、大步幅超越的精品工程。通过一系列的精雕细刻深加工，在音乐美、诗意美、造形美及舞蹈化的开拓上，剧评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演出中掌声多达五六次。这个戏曾四进北京，三进中央电视台，并作为国家级精品剧目被收入央视精品库。赴港台及重要外事演出任务中，这个戏是首选的保留剧目。韩国友人看戏后，兴奋得夜不成寐，连夜急电索要该戏的脚本及音像资料。五十四国的文化参赞观后，认为这个戏“是晚会上最好最美最出色”的节目。1996年旅法，法国朋友看了录像后，争相复录，赞不绝口。在浪漫的国度，在艺术之都巴黎，我们的作品竟会如此热烈地被接纳……。

作为吕剧第一代作曲之一，我的名字现已被收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四十多年为吕剧谱曲八十余出，对剧

种的发展和优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如代表作品《燕燕》、《三关排宴》、《箭杆河边》、《红灯记》、《驰马镇》、《桃花扇》、《泪血樱花》、《审椅子》、《芙奴传》、《花好月圆》、《玩会跳船》等。参赛获奖作品有:《梆声阵阵》、《鹤鹑县令》、《微湖蛇形》、《路口》、《军嫂你好》、《神圣的事业》、《托起夕阳》等。

理论研究方面,1983年我参加了首届吕剧音乐学术座谈会,同年在郑州参加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1986年我去扬州参加了中国古筝艺术研讨会;1990年我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中国戏曲音乐国际研讨会;1996年在邹平参加了振兴吕剧理论研讨会;1997年在青岛参加了吕剧人才学习班讲座等。曾发表文章十余篇,如:《立足于新落脚于亲》、《现代戏推动了吕剧事业的发展》、《开拓与开掘》、《话说吕剧》、《吕剧的创新之路》、《一代曲魁》、《梅开菊绽报春来》、《引宫商人戏令睚眦生魂》、《戏曲音乐创新杂议》、《振兴吕剧断想》、《山东戏曲一览》——专栏连载二十五篇等。编辑作品有:《吕剧音乐资料》(三卷)、《现代戏优秀唱腔选》、《演唱材料》(两集)、《首届吕剧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建国35周年吕剧优秀唱腔选》等。

1985年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东卷》副主编,在这个国家级艺术学科巨大工程里,我参与了山东二十多个剧种音乐的编纂,上下连接,左右平衡,曲文声像,事必恭亲,任务繁忙,也丰富了学识。就在此时,我还发现了与我们老家高唐有关的一个珍贵资料——高唐县有可能是

吕剧的源头之一。据载,吕剧创始人时殿元,曾在高唐学习过一种曲艺,叫“四平调”。为了区别于全国十几种同名不同质的“四平调”,我们称其谓“高唐四平调”。我考证了高唐艺人郭汝河唱的“四平调”,对比吕剧“四平腔”的曲调,极其相似,只是板路和过门稍有出入。而最早“上妆洋琴”的原板,叫“凤阳歌”,蜕变为吕剧之后,才更名为“四平腔”。可见吕剧和琴书在分野时,“高唐四平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作为高唐籍的吕剧人,我坦然地理直气壮地把这一成果写进我的专著。

心想着故乡,如面对家人,禀诉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顾忌。其实文艺创作,本质上无异于种田做工,都是平凡人以平常心做平常事。我深知高唐人是重实轻名的,能敢为人先,能勤奋敬业,但从不沽名钓誉。我在此罗列些声色趣闻,旨在文化沟通,无意也不值得炫耀。而今年迈,退而不休,做评委、搞辅导、坚持写作,仍是那割不断的艺术情缘。我唱着歌走出家乡,再把歌唱给故里。人生何必苦求那“人过留名”,能落个“雁过留声”,已是难能可贵,心满意足了。

2002年金秋书于泉城济南

林业专家宋玉和

文史科整理

宋玉和,山东省高唐县固河镇后辛村人,生于1934年11月。他于1952年毕业于高唐县一中,同年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平原农学院林业中技班。1954年初平原省撤销,他被调整到河南省洛阳林业学校继续学习,1955年林校毕业后,到河南省林业调查设计队工作。经过不断学习并结合工作实践,1963年他又拿到北京林学院林学系本科函授毕业证书。

1977年,在北方飞播造林技术协作会上,他首次提出了“飞播造林、封山育林、人工辅造、抚育管理相结合,建设飞播林基地”的新观点,在同行专家中震动很大,受到林业部有关领导好评和肯定。通过五年建设,河南省完成了130万亩飞播林基地建设,有林地普遍达80%以上。

1979年以后,他主持河南省飞播造林试验与推广工作,获得成功。截止1990年,在全省推广面积达450万亩,成林面积200余万亩,是北方省区飞播造林成效较好的省份。他在工作中有不少革新和改进。例如,1981年首先将数理统计理论运用于飞播和调查中,使其有了精度保证,改进了播区调查规划方法,提高了设计质量,节约用种10—20%,降低造林成本15%。

由于成绩突出,1986年他获得林业部、民航总局、空

军司令部联合颁发的全国飞播造林荣誉奖。他还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两次(课题主持人),地(市)级二等奖三次。1984年他主持工作的单位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于“科技推广先进单位”。

从事林业工作四十年,完成多个国营林场设计,多次参加森林资源清查、幼林核查、伊洛河流域清查,治沙治碱规划,黄土丘陵防护林、平原防护林等规划设计,工作熟练,技术全面。

他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著 20 篇。如《河南飞播造林成就与展望》等。他主持制定了《河南省飞播造林工作细则》、《河南省人工直播造林工作细则》等五个指导全省林业工作的技术规范细则办法。

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贡献突出,1992年,他被国家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4年退休,现住郑州市。

机会与动力

彭玉奎

我1935年2月2日出生于山东高唐县姜店乡彭寺村,儿时家中很贫穷,父母靠耕种八分田地和出卖劳动力维持全家生计。又由于父亲是外村傅桥人,从小被送给了彭寺姓彭的人家,在村上被有的人家看不起,经常受气挨骂,低人一等。当我懂事感受到父母的伤痛时,心灵上就刻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就梦想着如何走出贫穷的村庄,混出个人样来,给父母争光。解放后我总算有机会上学了,在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只要有了文化才能摆脱贫困,摆脱落后。1949年,经刘子忠老师(后任高唐县教育局局长)引荐,考上了姜店乡大董庄完全小学。在高级小学学习期间,我是走读生,中午带饭,为了抓紧学习,经常在路上边走边学,不管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由于刻苦发奋地学习,头学期考试中,我就进入了前三名,在后来的学期考试中,也保持全班第一名,有“铁第一”之称。有一次,于汝强老师出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张榜贴出让大家抢算,算对的第一名,奖品是一支铅笔,结果我拿到了奖品。在两年的学习中全县会考两次,第一次我得了全县第七名,奖品是一部学生字典,第二次会考我考了全县第一名,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1951年春季我毕业,同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了高唐一中初中。当时我有一亲戚去看榜,他是从后边往前看,看到了一半仍没有彭玉奎的名字,就有些担心,耐着性子继续往前看,当他看见我的名字居然排在第一名时,真是欣喜若狂,跑到家来给我们报喜。在两年半的学习期间,各科都保持了优秀的成绩,由于品学兼优,1952年11月25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教导主任赵宗泉老师和唐同岭老师,1953年5月25日转为正式党员,入党后我更加努力刻苦学习,当年暑期我考入了聊城三中(当时称为新高中)。三年的学习时间里,我除了奋发刻苦地学习外,还积极地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期间担任了两年半的学生会主席,组织过全校的体育运动会、电影晚会,通过这些活动对我以后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起了很大作用。我还当选为聊城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体会了当家作主人的滋味。

1956年暑期我考入北京理工大学(当时为北京工业学院)雷达线路设计专业,学制五年。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全村都沸腾了,我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没有辜负父母多年的辛苦教养。当我乘火车去北京上大学时,才第一次见到了两个道轨的铁路。进了大学门好像换了另一个世界,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什么都是新鲜的。我们的专业是国防新型专业,在学校也是最好最热门的专业,毕业后工作安排去向都比较满意,其他专业的很多同学都羡慕我们。我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丰富的知识财富,学习生活特别紧张,中学的学习方法和方式都要改变了,死记硬背是不行了,促使我多加思考多动脑筋,

每时每刻都充实自己。靠聪明的大脑很快适应了大学的生活。由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再加上我具有山东人诚实、忠厚的性格,在四年级时,学校将我提前调出留任做教师。

在学习期间,1959年暑期我回家探亲,家乡群众对社会刮五风、一平二调、农村干部作风意见很大,当时我听了也非常气愤。作为一名党员,做为当代的大学生,应当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帮助党的干部改进作风,返校后我把所见所闻整理成材料,通过党组织,寄给了党中央。1960年反右倾开始,我作为新调出来的青年教师也没有逃过这一厄运,大会批了小会批,每次批判会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我坚信我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所以头几次批判会主要是纠正我的态度,来势非常猛,在形势的逼迫下,在“好心人”劝说下我违心地检讨了自己的问题。大会批判我看问题偏面,以点带面,犯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最后定为犯有右倾错误。而全校教师中犯有同类错误的有二十五人,我是其中之一。由于犯有政治错误,我和其他有问题的“各种人”一块被下放到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期间,劳动量大,生活又不好,吃尽了各种苦头,经受了各种难以忍受的磨难,对我冲击很大。我总是在想在考虑,却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说老实话,如实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却遭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劳动改造结束后,学校派人到我村调查核实,我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1962年又在原来批判我的范围内进行了平反甄别,当时领导人在大会上对我的评语是,彭玉奎同志

如实反映歪风邪气和党的不良作风,这是对党对政府负责的表现,应当发扬光大。经过这次政治上的风波后,我在政治上有些压抑,总有些问题想不明白,后来我把这些苦恼和压抑情绪,转化到勤奋钻研业务、刻苦学习技术上,很少过问所谓的政治问题。恢复工作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从此站稳了大学的讲台。

初任教师时,主要是搞教学工作,主讲课程有自动控制器件、电子学、计算机原理及汇编语言。学校专业调整后,我负责计算机教研室的工作,对学校计算机应用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1976年,我领导和组织了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中心的建立工作,引进了国产DJS—320大型计算机,没有现成的机房,就对现有的房子进行改造,供电系统、空调系统都需要重新改造,技术性高且工作量非常大,克服了种种困难,达到了安装大型机的要求。这是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有十多个大型机柜,每个机柜上有上百块插件,每块插件有上千个的元零件,逻辑线路的设计和工艺技术都存在很多问题。学校配备四十多人维护这台机器,但在我负责计算机中心期间,经过培训人员和严密的组织,这台计算机正常运行五六年之久,解决了学校各类专业疑难计算任务,使许多专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如弹道计算、光学计算、微波计算等都是由于使用该计算机才完成了国家下达的重点科研任务,同时为社会其他科研机构提供了很多服务。维护计算机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由

于当时制造工艺水平落后,排除故障的诊断程序不健全,出现故障时,就靠分析逻辑线路和实践经验,压力很大,有时在机房待好几天。曾经有一个故障点我找了两天才找到,原来是由于虚焊造成的,重新焊接一下,故障排除,整个计算机又可计算了。有一次外国专家 IBM 公司工程师到理工大学参观,看到我们能维护好这样的庞然大物赞为奇迹,表扬我们中国人分析能力强,有耐心。当时美国计算机已经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比我们先进了三代。

1982年,我做为教育部计算机代表团成员之一,考察了美国联邦政府计算机应用和管理,如巴尔的摩卫生系统计算机中心、加州银行计算机中心、国际图书馆信息系统,并受到美国国务院的接待,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组织下,参观美国国会山、双子星大厦、IBM 公司、硅谷等,学习和见识了美国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精尖产品。1983年我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再赴美国进行技术考察,进行计算机选型和技术谈判的工作,并引进了计算机设备。我通过对美国的考察,深深认识到计算机是各专业有利的计算、设计、管理和数据处理的工具,它的应用应深入到各个学科,建议学校优先发展计算机专业,这样可以带动各学科的发展。1985年我被借调到北京海淀区做科技顾问,参加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组织与开发工作,期间被海淀区政府派往美国进行合资合作考察。一年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回到学校。

1986年,北京理工大学引进美国 IBM 公司生产的 3031 大型计算机,学校重新建了一栋计算机中心大楼,建

筑面积 4000 平方米,机房为 560 平方米,分四个各自独立的区间,即中心机区、磁盘存贮区、打印绘图设备区及中心操作区,我负责计算机房的设计和计算机的安装工作,一直到计算机正常运行。在机房设计中,我采用 75 千瓦不间断 UPS 电源,整个机房采用防静电地板、自动防火系统,通向各机柜的电源线和信号线都采用防电磁干扰的蛇皮管,通往各个机柜的电源相序不能错位,否则机器就要倒转,造成极大的损失。机房的电源都要由 UPS 电源供到电源配电柜上,然后再分成几路通到计算机机柜上去,配电柜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由我设计的,再就是整个机房冷却系统,由五个大空调送冷气保证整个机房温度在 $22^{\circ}\text{C} \pm 2^{\circ}\text{C}$ 。外国专家来安装计算机时,非常顺利,很快安装成功,他们对我们的准备工作非常满意,评价我们的工作非常到位,这台大型 IBM3031 计算机四十几个终端很快投入运行。为工作需要,又引进美国 PRIME 超级小型计算机,大大推动了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学校各学科的飞速发展,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对整个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年我被评为学校的模范。

我对各项工作敢于承担责任,对待各种事情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会阿谀奉承,但是总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有些事情也要一分为二,在借调到海淀区科委当科技顾问期间,接触了社会上各层次的人士,也看清了新技术发展的方向,认识到中关村的优势就是有高度密集的数量大的专业人才优势,再

加上自己理论上和实际工作的长处,有愿望融入这个大潮中做些事情。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于1990年与他人合伙成立了北京赛特科技研究中心,主要普及计算机的应用,先后为中国农业银行十八个省市进行微机培训,为河南省建设银行、山东淄博市农行等单位举行多次 XENIX 多用户培训班,并提供了大量的微机设备,提高了他们计算机应用水平,后来自己出资组建了北京朋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顺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要销售计算机多用户产品、网络产品和高档外围设备,还承担了一些办公自动化网络的布线、系统安装调试的工程,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根据从事计算机工作实践,1982年在《计算机世界》连续发表了六篇计算机网络和拓扑结构的文章,1983年发表《IBM公司计算机工艺与技术》的文章。与同事合编的《德汉电子计算机词汇》198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这一生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即小胜在谋,中胜在智,大胜在德。为人做事讲诚信,“人”字缺一划不成“人”,之所以这样,就是互相支持的意思。不管是对客户,还是同行,都要讲信用、讲道德。有德才能大富,才能成就伟业。

国防工业一兵

白若景

1960年12月,我们北京工业学院十七位师生来到了十三朝古都西安。西安地处祖国的中心,大西北的前沿,战略的大后方,这里国防工厂云集,是国防工业基地。这年的前些日子,苏联突然宣布终止对中国各项军事工程的援助建设,并撤回所有专家。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从当时所属的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六所高等院校中选派近百名应届毕业生,由教师带队前往各军工厂、科研院所协助工作。我们被分配到国营七八六厂,主要任务是翻译资料、协助完成投产的准备工作,我从这里开始走向工作岗位。半年之后老师和部分同学返校,我和其他四位校友作为毕业分配留在了七八六厂,至今我已在这里工作生活四十二个年头了。

我1935年生于高唐县姜店乡张井村,1953年高唐一中初中二级毕业,1956年聊城一中高中四级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五系雷达专业。由于我爱好跑步,在北工一直担任学生会军体部长,这对我以后的工作有一定帮助。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学到大学,一是不习惯,二是胆怯,很多城市的学生看不起农村的学生,但对我却有些例外,不论上海、南京来的,还是北京、

天津来的,都与我相处甚好。尤其是通过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同学们对我的忠厚、诚实、助人为乐、吃苦耐劳给了很高的评价。就在应届毕业生分赴各工厂和科研所的前夕,北工五系56级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正式接受我加入中国共产党。56级二百多同学列席了会议,会上大家表示为了党的事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定量只有三十斤,油四两,菜也很少。我由学校运动员五十七斤半的定量突然减到三十斤,实在受不了,全身浮肿,但仍坚持承担很重的工作任务,早上起得很早,念外语,看原文资料,进行翻译,校核图纸。做为党员,不但自己要完成任务,而且还要做周围同志的思想工作,坚持渡过生活难关。由于学校学的知识与实际工作相差甚远,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还要在实践中摸索,熟悉各种标准,经过一年多锻炼,已基本能独立工作。我们当时研制生产的产品保密性很强,设计师之间也是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每个人的工作范围很窄。开始安排我搞天线设计,后来搞雷达总体结构设计时我才知道我们研制生产的产品是被命名为红旗一号地对空导弹制导雷达。整个制导站系统有十多辆车组成,七八六厂负责抓总,生产主车及其它辅助车共计六辆,所用图纸九千多张,零部件五万余件,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当时分工负责国营七八四厂生产的指令发射车。经过三年的研制生产,整个武器系统于1963年通过检飞、打靶试验,产品进

行了定型,并开始了批量生产。随后供应部队,在城市和海岸线布防,形成中国的防空力量。

虽然苏联卖给我们的图纸是他们已经落后的第一代产品,但在当时国防工业很落后的中国还是比较先进的。尽管红旗一号地对空导弹制导雷达在多处布防,但美机多次侵犯我领空,均未击落。电子工业部及空军要求七八六厂改进红旗一号产品,增加抗干扰措施。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了几套方案,经过半年多的技术攻关,研制成了红旗2号地对空导弹制导雷达。这一产品装备部队后,大显威风,于1963年11月1日在江西上饶上空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架。1964年7月7日又在福建漳州地区上空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架,使美国大为震惊。对此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通令嘉奖七八六厂。1967年9月8日在江苏启东上空再一次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我作为红旗2号的总体结构设计师也感到非常光荣。

1964年底我厂接受新的任务,研制150—II靶场测量雷达,我被任命为总体结构主管设计师。从总体设计师到总体主管设计师是一个较大的台阶,我的任务第一是产品研制的方案论证;其二是下达各系统的研制任务书,包括结构形成、各种参数、外形尺寸、贯彻标准、元器件统一性要求,这是研制阶段的开始。研制过程中,负责各设计师及工艺、车间各方面的技术协调。最后参加总装总调及靶场试验。经过一年半的时间,雷达研制成功,1966年6月开始在西靶场进行测量试验。那是骄阳似火的夏

天,沙漠里的温度高达 45°C ,在测试场上住着近百名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吃水要从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总部运来,饭后洗碗盆的水洗到最后就成了一盆粥。用来洗衣服的一口井,只有一米来深,洗了衣服,一个小时就干了,一抖一层白碱落下来,我们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进行测量试验。每天从下午七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结束,调整雷达和高分辨率的望远镜,使其在八十公里以外的目标(飞机)显示是吻合的。尽管试验在晚上进行,白天做准备工作,但晚上大地散发的热量使温度也在 40°C 以上,一直到凌晨两点多才降下来。参加试验的工程技术人员一心要完成试验,对当时“文革”中的两派斗争并不关心,尽管大家对“文革”的观点不一致,但对试验是齐心合力的。经过三个多月日夜奋战,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试验任务。

巧得很,担任150—Ⅱ靶场测量雷达总体线路主管设计师的刘爱清同志也是高唐人,他1937年生于清平镇,解放前随父母去了吉林省,196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们两位高唐人共同主持完成了这一雷达的研制,他平常和我谈起来,对家乡高唐挺有感情,解放后也多次回过高唐,可惜的是刘爱清同志五年前因病去世了。我经常回忆起我们共同战斗的这段历史,并为此感到自豪。

1967年后我先后担任了160—Ⅱ靶场测量雷达、红旗4号地对空导弹制导雷达的总体结构主管设计师,但由于“文革”中科研机构的变更,这些产品都未能在七八六厂进行下去。其后,我一直负责红旗系列产品的小型化工

作。在这中间完成了 S 波段大功率机械转换开关的研制,并写了论文,参加了 1978 年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性微波学术交流会。

1979 年冬,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计划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决定从英国引进地炮雷达,派人去英国考察。考察团由四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三人,电子工业部一人。为了引进后的研制任务的落实,电子工业部将这一名额给了承担这一任务的七八六厂,工厂决定我参加考察团,并负责今后研制中的天线攻关,厂领导找我谈话时,只说有一项重要任务,要我等通知,随时准备去北京集训。就在这时我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尽管悲痛万分,但却不能回高唐奔丧,几天后我就去北京炮兵总部报到了。春节前夕,我们一行四人乘飞机去巴黎,转机到伦敦,1980 年春节我们是在英国过的,我们在伦敦和麦丁堡对伊美公司、马可尼公司的多家工厂进行了考察、参观,并对我国购买的地炮雷达进行全面的验收,包括各项技术参数的测试及打靶试验。当时伊美公司部经理以五千万英镑的价格卖给我们图纸资料,我们没有接受,他明确地说我们是制造不出这种雷达来的,因为其中天线的钻蜂窝锥制造的难度太大了,这也激起了我们建立强大国防的斗志。

三部雷达运回国,在南京靶场进行了操作培训,其中一部雷达运到中越边境,参加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战绩显赫,这使炮兵对研制这一雷达更加积极。七八六厂能否研制出这种雷达呢?其中的关键是天线的锥体能否做

出来,炮兵及电子工业部决定先做模拟天线锥。如果模拟天线锥能做出来,就下达生产该雷达的计划,否则这一研制任务就取消了。对于我来说,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设计了三种模拟锥,长 1.2 米至 1.5 米,锥体大端 200 至 300 毫米,小端直径 100 至 200 毫米,锥体厚度 10 毫米,是铝皮蜂窝状的,很轻,约 1 至 2 千克。要做模拟锥,先要做模胎,我咨询了几个飞机制造公司和研究所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只有自己摸索,在北京某研究所协助下,用真空试验加温、加压、涂胶,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做出了三十七个锥体,有三个可以做动平衡试验。电子工业部及炮兵的有关领导都去现场看了成品,还比较满意。回到西安,又到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去做动平衡试验,闷热的夏天,工程技术人员汗流浹背,一干又是两个月。旋转、配重、找平衡点,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了。这样,炮兵及电子工业部下達了研制地炮雷达的任务书,我被任命为研究所总体室副主任,接着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正处级),负责组织领导这一产品的研制与生产。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标准的制定、图纸的审核、批准及研制中的技术协调。电子工业部于 1983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了方案论证会,并将该产品的研制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重点保证资金。由于雷达所需的几十种元器件国内无生产厂家,现有的元器件有的性能可满足要求,但体积过大,有的连性能也不能满足要求,只能重新研制。为保证雷达研制进度,电子工业部曾多次召开协调会,督促落实,在其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跑遍了各协作厂和研究

所,了解情况,督促按期供货。

经过三年多的日夜奋战,地炮雷达装调完毕,我带领四十人组成的靶场试验队前往靶场试验。1987年的农历腊月廿九,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在黄河滩的靶场上,中国制造的地炮雷达架设完毕,静态测试,各项准备工作就序,开始射击试验,三发炮弹发射之后,雷达测量的精度完全合格,工程技术人员和参加试验的战士无不喜笑颜开,按时收兵,春节后继续再试。为了检查我们研制雷达的质量,炮兵要求同时架设一台英制地炮雷达一起试验,进行比较。试验共发射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榴弹一百三十九发,测试结果各项战术技术指标均满足任务书的要求,有些指标还优于英制雷达,随后进行了高温、低温、潮湿、震动等试验,于3月底结束,接着在山东半岛一靶场做实战试验。1987年7月电子工业部主持了雷达定型会,其结论是这一雷达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军在地炮雷达中的空白,并获得电子工业部的科技进步奖。1988年我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该地炮雷达定型后,我负责组织整理图纸,进行批量生产,组织研制第二代。期间写了论文《无线电产品各种材料及其选用》、《地炮雷达军工史》、《地面雷达总装技术条件》等,我曾连任陕西省电子机械工程学会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1993年被聘为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1995年退休后,我负责高唐在陕人员同乡会、聊城一中校友会、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等社会工作,愿为家乡经济发展尽力。

我的艺术之路

窦希贵

我 1935 年 4 月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祖籍山东省高唐县固河镇窦集村。我父母 1924 年逃荒要饭到东北（也叫闯关东），没有正式职业，从我记事起，我们就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冬天墙上都是冰霜，水缸的水全冻成冰。我们兄妹五人，我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我七周岁时上学，学校离家很远，别的同学中午带饭，我饿着，因为我家每天总喝包米面糊涂粥，没有饭可带。我所用的笔和纸也都是从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的垃圾堆里捡的。四年级时，哈尔滨解放了，一时间，家庭生活仍然困难。记得五年级时，我已能阅读《大八义》、《小八义》、《七侠五义》、《三侠剑》、《三国演义》等小说，读后都能记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书中的故事讲给两个同学听，不知怎么把他们都吸引住了，而且听的人逐渐增多。同学们知道我家困难，他们带中午饭时就多带点给我吃。由于听的人越来越多，给我带的东西也就多了，我把多的拿回家给父母和妹妹们吃，他们就像过年一样吃得那么香甜、那么高兴。

1947 年我已小学毕业，家中无钱供我读中学，只好把我送到哈尔滨市军属麻袋厂当徒工。当时，国民党正围困长春，也正是人们常说的吃粮非常困难时期，一麻袋钱

也买不了一麻袋米。军属麻袋厂是专门制作麻袋的厂家,产品用来装军粮、军鞋等运往前线,支援解放军打国民党。1949年全国解放后,军属麻袋厂不幸失火,工人全部重新分配了,因我太小,政府动员我父母让我继续读书,并享受国家一等助学金。我们全家高兴极了,就这样我进入了哈尔滨市第二中学。入学后,由于我早慧,常受到老师表扬。当时我能自编、自导、自演小话剧,因此被学校任命为文艺部部长。十六岁初中毕业时,学校本可以保送我入重点高中,可是由于家庭困难,我犹豫了。正在这时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来哈尔滨市招生,学校领导及同学都劝我去试一试,我动心了。

报名者上千人,考了七天试,最后只录取了包括我在内的三人,我是话剧团,另外两人是音舞团和少儿艺术团。1953年6月的一天,我们的破大院突然来了一辆黑轿车,惊动了院子里所有的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来接我的,他们把我送到车站,我坐上硬席卧铺,来到了沈阳东北人民艺术剧团,从此开始了我的舞台生涯,并和戏剧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是同台演员。东北人民艺术剧团共有四团一场,即话剧团、音舞团、歌剧团、少儿艺术团及艺术剧场,八百余人。有一次文化培训,分大学班、高中班、初中班、小学班,我竟一鸣惊人,和其他十三人考入了大学班,不但没高兴,反而后悔了。因为大学班没有老师教课,全是自修。在剧院,我曾扮演过《海滨激战》中的俘虏、《锦绣花巾》中的阿芒等。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后改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1956年，辽宁省支援重工业城市，我被分到本溪市话剧团任演员，除了话剧专业之外，我还酷爱曲艺，所以相声、快板、山东快书、东北二人转、小品等三十多种表演艺术我都创作过，部分节目我还演出过。1958年，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来到本溪时曾指导过我相声表演。

1959年，我们团和东北其他二十几个艺术团体代表东北三省人民赴福建慰问三军将士，走遍了大小军营及海岛，共慰问一百多天。我们团是大戏小节日一起演，当时我创作的相声《向亲人致敬》、《万紫千红绕营房》等节目倍受广大官兵的欢迎，演出三百多场，轰动全国，并拍了大型纪录影片《春节大联欢》，我是主线人物之一。慰问后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话剧《红心虎胆》，演出之后，朱德委员长和我们合影留念。次日又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举办的招待宴会，我代表本溪市话剧团向周总理敬酒，总理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窦，总理开玩笑地说：“那就叫你小豆豆吧。”没想到第二年我团再次参加全国群英会演出，在周总理举办的大型招待宴会上，当我又一次给周总理敬酒时，总理竟然喊出我的姓来，“你是小豆豆吧？”

在本溪市话剧团期间，我曾扮演过《雷雨》中的周萍、《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陈喜、《特别代号》中的杨汗光等三十余个主要角色。

“文革”后，我参加了北大人文函授群文系的学习，毕业后调到了本溪市群众艺术馆工作，先后任文艺部、编辑部、调研部主任。曾在国际、国内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

电视剧、话剧、诗歌、散文、小品、曲艺作品等共二百多篇(部)。其中八十余篇(部)获奖。论文《本溪文化现象初探》获省、市征文一等奖,于1993年9月参加了文化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社区文化理论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做了宣讲,获最高荣誉证书,并发表在《论社区文化》上。论文《神补的功能》被编入《世界学术文库》,并获征文金奖。1989年我编辑出版的《辽宁群众文化选集》(本溪专辑)一书,畅销全国。电视剧《女所长的世界》于1993年在省、市电视台播出。对口快板《找厂长》获文化部1994年全国群星杯优秀奖。小品《夫妻对审》被全国喜剧小品征文录选,并发表在辽宁《电视与戏剧》1992年第5期上。二人转《反拜年》获辽宁省1983年二人转调演优秀演出奖(最高奖),同时获省、市征文一等奖。1993年组织辅导二十二名小朋友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少儿首届‘唐老鸭’杯泡泡糖编讲故事大赛”,全部获一、二、三等奖和纪念奖,获全国最佳成绩,我获优秀组织奖。

五十多年来,我举办了八百多次戏剧、曲艺创作、表演学习班,听课者数万人次,培养出几十支文艺队伍。曾任中国民主同盟本溪市文化委员会主委,系中国群文学会会员、辽宁省群文学会理事、省群众文化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市群文学会秘书长,现为中国曲协会员、辽宁省曲协理事、本溪市曲协秘书长。

我的作品及业绩已被《世界学术文库》、《世界艺术家人才纪录大全》、《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国际名人录》等二十余部书收录。如今我虽已六十八岁,还在做一些社会工作,愿为社会贡献余热。

常庆之传略

文史科整理

常庆之,1935年11月26日生于高唐县固河镇前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喜爱读书,1948年在本村小学毕业,1949年至1950年在固河王庄完小读书,1950年至1953年在高唐一中读初中,1953年至1956年在聊城一中读高中,1956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军用光学仪器系读本科,1960年毕业分配在北京航空学院任教,1961年入伍在国防科委某基地研究所工作,1970年复员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五研究室工作,1996年退休后被返聘继续工作。

在职期间,常庆之先后任助教、技术员、讲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等职,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1958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华的技术专家,国防工业院校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培养急需人才,纷纷抽调一些优秀学生充实教师队伍。1960年常庆之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航空学院参加航空光电导航专业建设与教学工作。1961年,在中央把我国“两弹一星”尽快搞上去的号召下,根据国防建设需要,当年8月常庆之入伍参军,报到后穿上军装立即乘火车几天几夜到达新疆,乘汽车长途跋涉直奔位于戈壁大沙漠的某兵团遗弃的农场临时驻地扎营。他和战友们

住在半地下窖的草房中,睡在通铺草炕上,电灯用电是自己柴油机发电供给的,吃的粮菜喝的水都是部队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在这里常庆之接受了入伍教育和正规军事训练,为解决生活取暖和食堂做饭的燃料问题,他和战友们还要去戈壁打柴。基地和研究所的领导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司令员、政委常去看望他们,给他们讲形势的紧迫性,讲核武器研制任务的艰巨性。常庆之知道,他们是我国原子弹制造和试验的第一代人,尽管无专家无资料,也决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发愤图强,打破核大国的垄断,以实际行动为祖国争光。他们这些年轻军人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测量任务的准备中,他们大力协同,分工负责,勤奋学习,战胜了当时国内外天灾人祸、生活困难的影响,“文革”期间还要冒着“派性十足”、武斗严峻的风险,与中科院物理所、光机所等单位配合,白手起家,集思广义,敢想敢干,夜以继日地研制出我国自己的光学测量仪器,这些仪器在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测量中,都发挥了作用,取得了好的结果,并为我国各行各业的核防护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在茫茫戈壁沙滩寸草不生的核爆炸试验场,气候变化异常,早晚寒气袭人,中午烈日灼人,经常风沙弥漫,住的帐篷常被大风拔地吹倒。常庆之和战友们还清楚地知道核爆炸后的放射污染对人体严重有害,但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现场测试任务,他们在爆炸后马上穿

着封闭的防护衣、乘坐颠簸的大卡车,迅速到离爆心不远的各测点取回记录结果。那几年原子弹、氢弹试验任务一个接一个,不知不觉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他们这批年轻人大多三十多岁了,除几个年龄大的技术骨干结婚成家外,大多数人还是单身汉。常庆之和战友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加之又在西北边陲这样的环境,远离父母和朋友,与社会外界联系甚少,没时间也没条件去谈恋爱、找对象。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防事业,他们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核试验测试工作。常庆之是在1968年33岁时才结婚的,而成家则是在他1970年复员到北航后的事。军中的十年他参加了我国初期的原子弹、氢弹、地下核试验的多次光辐射现场测试工作,担任过光辐射测试课题大组长、外场测试队长,多次受到部队嘉奖,中央军委曾授予他所在的研究室“勇攀科技高峰研究室”的荣誉称号,他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到军队,常庆之因爱人家庭出身不好和身体原因,组织上让他转业到北航这所高等学校。到校后立即被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下,他参加了自控系材料整理组,进行外查内调。几年后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开始重视科研和教学,常庆之又重新从事光电制导及光电仪器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和研究小组的成员负责研制天文导航系统的核心——星体跟踪器。在多方协作下,于1978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TW—1型星体跟踪器,经鉴定验收,其性能达到美国六十年代的水平,1981

年获第三机械工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之后,在航空航天部的资助下,利用现代新型光电传感器和信息图像处理技术又研制出白昼星体跟踪器、微光星体跟踪器、弹用星体跟踪器等,这几种跟踪仪器在1992年由航天部主办的国内四大研制单位进行统一室内测试、室外现场跟踪的评比中性能优先,1989年和1993年两次获航空航天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94年他应坦克部队的要求,研制出坦克火炮瞄准角光电测角仪,可替代国内现今仍沿用手工绘图的繁杂测量方法,实现了微机自动化,靶场试验效果良好。1995年他应海军舰队的要求,研制出尾流测量仪,大大增强了舰船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1996年他应航天部卫星制造厂的要求,研制出大型太阳能帆板平面度测量仪,使我国生产的卫星用帆板性能完全达到国外水平,解决了急需,替代了那种既笨重又不准确的老测量方法,并于1999年获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常庆之参加了北京中国科技馆科技项目的开发,如陀螺演示仪、失重模拟机等,经过一年多的运转后通过验收,受到了专家的好评,几年来引起广大操作者的极大兴趣。1998年后常庆之主要是和青年教师一起参加国家“863”、“十五”规划和民用航天方面的预研课题,如卫星用的新型控制力矩陀螺、航天组合导航系统等,其发展潜力大,现已取得初步成果。

他在全国天文导航专业会议和全国光电专业会议以及《航空学报》(1981年)、《测控技术》(1993年)、《仪器仪表学报》(1997年)、《宇航学报》(2001年)等期刊上发表多

篇报告和论文,并培养和指导了多名本科生、硕士生等。

常庆之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经历了日本侵华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能统治、八路军解放家乡、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及解放后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和重大变革,他受到了深刻教育和极大的锻炼。参加工作四十多年来,他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求名利,听从党的召唤和祖国的安排,兢兢业业工作,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他的才能和智慧,他没有虚度年华。他的业绩已载入《聊城人物大辞典》,入编《2000 中国杰出人物特集》(光明日报博览群书杂志社)。2001年8月,国防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第一卷中登载了他的事迹。如今他已步入老年,面对我们国家的巨大变革,他更加欢欣鼓舞,决心发挥余热,继续在国防科技领域攀登高峰,培养更多的人才,把一生献给祖国。

激流勇进改革者

——记“十三大”代表、原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郑焕明

王 琴 整理

很少有人把高唐人与北京汽车联系起来，但确实有一位高唐人，他曾经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为了实现“有路必有北京车”的愿望，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带领全厂 9000 余职工在改革中二次创业，经过四年拼搏，终于把与中美合营的北京汽车有限公司分立的“北汽”老厂从困境中振兴，并建设成为北京轻型汽车生产基地。北京市民没有忘记他的功绩，并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被选为北京市优秀厂长（经理）、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共“十三”大代表、中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在他任职期间，《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金融时报》、《中国机械报》、《中国人才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东方企业家》、《中国商报》等各大报刊及中央和北京电台、电视台多次报道介绍他的事迹，他还获得由中国人才资源开发基金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新华社、《经济参考》、《环球》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中央电视台经济部、《中国企业家》杂志等发起并组织的我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银杯奖及中华教育艺术铸魂金杯奖。他就是从张大屯村一个普通农家走出去的高唐骄子——郑焕明。

一 临危受命

1936年1月,郑焕明出生于高唐县张大屯乡张大屯村(今属杨屯乡),小学毕业后去茌平县中学读初中,毕业后回乡投入农业生产,1955年8月当选为张大屯乡初级农业合作社副社长,之后又被选为高级农业合作社技术股长。1956年9月至1962年8月他先后在济南机器制造学校、山东机械工业学院就读,1962年10月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历任见习技术员、技术员、技术组长、技术科长、分厂长、总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截止1984年元月他任北汽厂长时,他已在该厂脚踏实地地奉献了二十多个春秋。

1984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工业企业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北京汽车厂做为首都主要企业之一,改革是必然的。当年元月15日北汽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的北京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它作为独立经济实体在生产、经营和人、财、物等方面与北汽分立。合作经营的北京汽车有限公司分占了北汽十个主力分厂、主导汽车产品和3800多名精干职工,留给老厂的只有22%的生产性固定资产、18%的工业总产值、12%的利润,此外就是9100多人,多是老弱职工、离退休人员、职工待业子女及合资企业编余人员。北汽老厂一片沉寂,几座仅能生产附、配件的旧厂房孤零零地立着,名义上仍叫北京汽车制造厂,实际上却失去了生产汽车的能力。

就在这样的厂况和这个非常时期,郑焕明作为新任

厂长,正式走马上任了。

二 走出低谷

北汽将向何处去?这个迫切的问题摆在了临危受命的郑焕明面前。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北汽已为合资企业竭尽全力,完全可以享受国家财政优惠政策。上级领导也明确表示:保证职工的工资不低于合资分立以前的水平。然而郑焕明不是平庸无为之辈,他思考的是北汽的二次创业和振兴,他追求的是脚踏实地地干一番事业。

进了厂门,忧心忡忡的职工们把郑焕明围住了,向他诉说、发泄心中的愤懑、疑虑和委屈,还有一些职工,正仨一堆俩一伙地在车间闲聊,办公楼的粉墙剥落、蛛网倒挂,走廊里被各种资料、文件柜堵得水泄不通,车间缺电、缺气、缺料,生产难以进行,厂汽研所等单位四十多名富有经验的技工和工程师认为北汽大势已去,纷纷向厂里递上了请调报告……郑焕明一连十几天吃不下、睡不安,难道自己真的成了北汽的“末代皇帝”?难道二十六年朱德总司令亲手题写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厂牌要从自己手上被摘掉?怎样度过眼下的困难……为此他深入车间和干部、工人谈心,征询意见、建议和要求,在诚挚的交谈中搜寻合理的意见,发掘蕴藏在职工中的智慧和力量。他在困境中看到了北汽潜在的活力和积极因素,明确提出了北汽发展的途径和方向,详细阐述了北汽二次创业的九个有利条件,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改革设想,并倾注全部精力付诸实践:

——对外引进。坚持拿来主义,博采众长,为我所

用；

——对内联合。走出小厂院，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横向经济联合；

——高起点。产品要先进，摆脱多年一贯制，生产批量要大；

——专业化。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小生产封闭方式，实行专业分工的集团化生产；

——高效率。以最少的投资，高速度、高质量地把北汽建成现代化轻型汽车生产基地。

……

当时，许多人将郑焕明的设想看作为“天方夜谭”、“痴人说梦”，而郑焕明却如此作了回答：“这是北汽全局的需要，是振兴祖国汽车工业的需要”。他对那些要求调离北汽的技术人员说：“给我三个月期限，三个月之内北汽生产不出汽车，去留自便”。职工在厂长郑焕明身上看到了希望。

郑焕明和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在一次创业中付出心血的北汽职工，又拉开了二次创业的战幕，展开了建设总装车间的大会战，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盯在工地上指挥，和参加建设的职工一同放弃了休息，连大年三十晚上都在工地上挑灯夜战。

在厂里财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解决了一批知识分子住房等困难，并集中全厂 100 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专门班子，从事工厂技术改革和轻型车基地建设，赢得了广大职工的心，使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北汽二次创业中。

使蕴藏在他们身上的能量,象奇异的核裂变一样,不可遏止地释放出来。

奇迹终于出现了:在两厂分立后的第47天,总装线、焊装线、内饰线全部建成,并生产出了第一批BJ121轻型卡车。全厂群情振奋,一鼓作气,当月生产310辆,不久又实现了日均衡生产,当年生产出4060辆,实现利润3018万元,北汽人的头抬起来了。这一年,北汽企业五项整顿和文明工厂建设一次验收合格;紧接着新产品BJ122车通过鉴定,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处领先地位,填补了我国一吨半车的空白,全厂实行了以经济责任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郑焕明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出了北汽在国内市场角逐中处在南北夹击、东西合围的地位,他将这比为“垓下之围”。为了使企业保持后劲,不断开拓市场,郑焕明和总工程师吕惠庆共同提出了产品开发的“四个一代”方针,即:生产一代,试制一代,预研一代,构思一代。短短三年时间,汽车产量从四千多辆上升到一万八千辆,上缴的利税接近分立前整个北汽的水平,京城企业界称之为“北汽速度”,郑焕明作为北京市优秀企业家,受到北京市各界人士的称颂。北京市副市长张健民在一次会议上高兴地说:“我们的事业需要开拓型人才,郑焕明就是这样的人才。”

三 锐意改革

也许是郑焕明不安于现状的性格使然,当一辆辆崭新的轻型车驶向祖国的大江南北,郑焕明又端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横向联合方案，北汽率先走出城区与怀柔县联合成立了“北京京环汽车工业联合公司”。这是首都第一家大型城乡联营汽车工业公司。在郑焕明锐意改革志在创新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北汽从1985年起相继与全国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132个厂家建立了产品开发和技术的横向联营企业，形成了一个以北汽产品为龙头的跨省市、跨行业的汽车生产经营联合体，开发出四十多个新车型，使北汽的产品结构趋于合理，扩大了市场的覆盖面。

1985年，企业体制改革的序幕也在北汽正式拉开，以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为主导，各项配套改革相继出台：

——干部制度改革。以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实现干部“四化”为目标，实现了中层以上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全员干部聘任制。

——分配制度改革。对各单位实行经济承包，对职工个人推行浮动工资和岗位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

——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把整个管理体制分为决策、管理和执行三个层次，改变了过去条块分割、职责不分的状况。

在郑焕明锐意改革的征途中，也横亘着种种阻力和障碍，有人不理解，称他是蛮干；有人嫉妒，说他有野心；有人甚至怕他功高盖主，给他拆台，罗织罪名。对此，郑焕明抱定的宗旨是：“只要是我认准的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管闲言碎语，飞流长短。”三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给北汽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改革使北汽更自由地

振起腾飞的翅膀。北汽汽车生产三年突破万辆关,产值、利润年平均以 67% 和 60% 的速度增长,产值、产量、利润翻了一番,化油器、转向机、水箱等五种主要附配件创市优和部优。BJ121 轻型卡车和 BJ122 型轻型汽车,经国家鉴定,其主要性能指标先进,部分指标达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际水平。同时,BJ122A 型客货两用双排座汽车、BJ620 旅行客车、BJ222 四轮驱动载货车等新产品也相继问世,被中外专家称为奇迹。1986 年秋,北汽参加了全国由十辆国产轻型车组成的“长城古道行”考察活动,北汽新开发的红色四轮驱动车一马当先,在百里沙场,一展我们民族汽车工业日趋成熟的风貌。

1985 年北汽在二次创业中,一连创造了北汽历史上的十个“最”,跨入全国 500 强的第 48 位。因此,1986 年春节前,受到了以姚依林同志为首的中央慰问团的亲切慰问,这在首都是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单位。

四 “北汽精神”

1987 年 9 月 14 日,郑焕明作为北京市先进人物汇报团 16 名成员之一,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七千多干部职工汇报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北汽锐意改革、奋发进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他说:“北汽之所以能有今天,其根本原因是依靠改革、依靠北汽精神拼搏过来的”。

郑焕明恪守着这样一个信念:“干事业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尤其是在困难时刻,更应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样才能产生一股向心力和凝聚力”。他知道,人心的稳定和振奋对北汽多么至关重要,针对北汽职工们的思想

实际,他坚定地提出了“勇于创新、艰苦奋斗、质量第一、团结协作、刻苦学习、实事求是”的北汽精神。随后又概括为“创新、为公、求实、奋进”。当时,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郑焕明冷静地回答道:“北汽精神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共产主义精神、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在北汽的具体化,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充满时代气息的主人翁精神,是北汽发展壮大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多次登台演讲,并亲自在厂报撰文,积极倡导全厂职工树立和发扬这种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有人说只要有钱,向心力、凝聚力都好办,郑焕明却认为:凝聚力来自心与心撞击产生的能量,来自理解和信任的情感,来自共有的对事业的忠诚。

1986年盛夏,厂里二十多名职工到海南岛试车,他们水土不服,每天都得冒着四十度左右的高温,在蚊虫叮咬、剧烈颠簸的恶劣条件下日夜拼搏。对此,郑焕明时刻挂在心上,除了时常派人前去了解情况、解决困难之外,在试车最艰苦阶段,他和书记亲率慰问团,用电视录相把职工家属的温暖、全厂职工的敬意,带给试车队员,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原计划半年的试车任务,仅用74天就凯旋了。

1984年底,厂里决定给全厂1%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志晋级,厂职工医院根据郑焕明爱人鹿淑珍的工作态度和成绩,将其列入晋级名单。但报请他审批时,鹿淑珍的名字被删掉了。有人问为什么?他笑着说,她在家里家外干得都不错,可我们是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还是把名额让给其他同志吧!1985年起厂里搞职务津贴,

可他分文未取过,就连他应得的承包奖,他也认为这是职工们的血汗钱,交给厂工会作了合理化建议奖励基金。

厂干部杨荣梅的儿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急需输血,可医院的血浆用完了,杨荣梅没办法只好拨通了厂长家里的电话,半小时后,郑焕明带着十几个棒小伙冒着大雪来到了医院,及时给孩子输了血。

八十多岁的退休工人崔永福无儿无女,住在离厂较远的一间年久失修的平房里,郑厂长为了照顾好老人,将老两口接到厂里的新居。

厂长关心理解职工,职工们拼着命增加生产,为工厂建设积累资金,主动为厂长分忧,使北汽精神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1986年北汽被中宣部、国家经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同年9月薄一波同志为北汽亲笔题写了:“创新、为公、求实、奋进”八个大字。郑焕明当选为北京市优秀厂长、劳动模范。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他作为北京市唯一一位工业企业界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年当选为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五 再挑重担

1987年7月,郑焕明被任命为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上任后,很快制定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现行公司机制的方案,他转变公司职能、因事选人、精简机构,把为企业服务作为立足之本。公司内实行联合发展的措施,搞优化组合,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名优产品为龙头,形成多个专业联合体,确定投资重点,使生产资源合理配

置,避免了重复投资,同时,也使产品发生内在联系,调动各个企业积极性,扶优抑劣,按总体布局使生产逐步合理化。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他再次施展了企业家的才能,他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把北京汽车工业推上全国汽车三足鼎立的“宝座”,郑焕明为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1年3月,他因工作需要调入北京市政府任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北京市对全国各地的经济技术协作,各地驻北京办事机构的管理、服务及联络,同时负责与西藏拉萨、内蒙古、三峡库区巴东县以及河北张家口市对口支援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他领导的经协办成绩突出,被评为国家先进集体,他代表单位参加全国表彰大会,并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合影。

1998年10月,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从经协办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退而不休,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发挥余热。现任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会长、中国雷锋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北京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优秀的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位理论研究者。他根据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对我国的企业改革进行理论研究,并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主要文章有:《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家素质初探》、《论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发展首都经济要坚持两个开放》、《全球

企业并购浪潮对我们的启迪》、《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北京汽车》、《关于民营企业自身建设的几个问题》、《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是北京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等,他还担任《当代北京汽车工业》主编。

他还是一位诗人兼书法爱好者,有诗集《情缕神州》、《余暇散吟》。他的《工作日志》扉页上有这样四行小诗:“我愿做一只雄鹰/在九天之际飞旋/瞄准追踪的目标/迎接暴风雨的挑战!”长期以来他以毛笔处理公务,学习借鉴、融汇首都书法界名家书法艺术,使自己的书法技艺步步登高。《高唐文史资料》(书画专辑)收录了他的书法作品,他为《高唐文史资料》(民营企业专辑)题写的书名,受到家乡广大书法爱好者好评。

他是高唐的游子,时刻铭记家乡。几十年来他努力工作,用卓越的成就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一直与家乡人民和政府保持联系,尽全力为家乡办实事。在购车困难的年代,只要有高唐去北京购车的,他都提供方便;他为争取在高唐的棉锭布点,在北京各有关部门之间奔走联络;他为高唐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及相关工作积极服务。2001年11月高唐县委、县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县域经济战略研讨会,他以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的名义,协助县政府向社会推介高唐,积极联络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联合国工发组织驻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周臻等人到会并讲话,使研讨会产生较好效果。

郑焕明是高唐人民的忠诚儿子,他无愧于国家,无愧于高唐。

在攀登航天科技高峰的路上

孙泰仁

—

我1937年11月出生在高唐琉璃寺镇孙庄村,这是一个位于茌平、禹城、齐河、高唐四县交界处的、在县域地图上也不易找到的小村庄。我的父亲和叔、伯都是长工出身,我没有高贵的血统,也没有家学渊源,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偏远的农村,自然条件又差,家里的生活相当艰苦,除了靠十几亩薄地之外,一到冬天父母和姐姐就纺线织布,以此换钱维持生计。那时父亲只有四十几岁,这样一个堂堂男子汉竟被迫坐在炕上手摇纺车,可见当时生活的艰难,也在我幼年的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农村缺乏教师,我断断续续地在村上念过几年小学,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割草、拾柴以及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由于受到本村一位在外村教书的小学老师的启迪,我产生了知识可以改变贫穷命运的强烈愿望。为此,1952年春节过后,我考入了离家十余里的望鲁店完小,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呵护,开始了漫长的独立生涯,背着玉米面、提着咸菜罐,点着小煤油灯,住校学习,用一年半的时间结束了完小阶段的学习。

1953年完小毕业时,家乡发生水灾,水深得使高粱稞

只露出个穗穗，庄稼是颗粒无收。趟着没过脖颈的水，父亲把我送到公路上（公路上水浅些），去在平县城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本村一位同学住在一间破庙里，铺着一块破席子，枕着一块破砖头，复习功课，完成了备考应试。这一年，学校只招收三个初中班，我在近千名考生中成绩排在第十六名。怀着极其骄傲自豪的心情和给父母家人惊喜的念头，我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在村口，正好见到父母在场院上翻晒从水里捞出来的发霉的玉米，父亲的第一句话是：“考上了吗？”我回答：“考上了！”这三个字包含着成功的骄傲与自豪。母亲也开口了：“我知道你得考上，我们是受穷的命，你看看寸草不收，拿什么供你上学呀！”母亲这句话，如同寒冬腊月里的一盆冷水浇在我身上，把我浇得浑身凉了个透。父亲又说：“考上总比考不上好，方圆几十里才考上几个？能上不能上再说。”

初中上还是不上，父母亲不知为此事愁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向在外村教书的那位老师去讨教，他被公认为是村上最有文化的“明白人”。讨教的结果是：开学时，先去报到，学费先由他借给，上几个月，上不起了就退学，这样可算是初中肄业，找工作比小学毕业好找。就这样，我终于跨进了中学的大门。那年水灾琉寺是重灾区，开学后一个礼拜学校就开始评定助学金，我毫无争议地被评为一等，对于这样一个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意外好事，真是令我惊喜不已，礼拜天跑了三十多里路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哪里会想到竟然有自己的孩子上学，国家还给钱的这种好事，他们对政府无限感

激,纯朴的农民不会用过多的言辞表白,只是对我简单地说了- -句:“要好好念。”

初中三年,我学习十分刻苦,除了伙食费之外,我很少花零钱,一个洗脸用的泥瓦盆,一身母亲用家织布做的衣服,一双布鞋,一床被褥,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用品了。与城里人没法比,用现代人常说的话来讲是“土得掉渣”,我不怕别人讥笑这种“土”,一直“土”到大学毕业。我觉得父母在踏着艰苦,一步步地往前熬,他们希望我能成才,摆脱贫穷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摆脱贫穷,报孝父母的强烈欲望对我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三年中我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

1956年初中毕业时,我的人生旅程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即初中毕业后怎么办?我一直向往毕业后报考中等师范,两年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三十几元工资,可以像本村那位小学教师那样,帮助家庭摆脱困境。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我在校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被评为三好学生,按学校规定,是可以保送升入高中的,但却不能保送进师范。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我的父母是纯朴的农民,他们虽然贫穷,但从来没有打消过让孩子上学的念头,这一年,我的妹妹孙桂香、孙桂珍也都到了上学年龄,如果我继续读高中,无疑家中更困难了,照理父母应该让我考师范,但是,他们毅然支持我上高中,并且对我和两个妹妹说:“只要你们有本事上,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们。”就这样,1956年暑假过后,我被保送到聊城三中,这是我人生中一次关键的转折。

在求学路上我感觉最困难的时期就是高中阶段，离家更远了，回家取伙食费都是步行，来回一百八十里，脚上不知磨起多少血泡。1958年大跃进，家里除了几间住房之外，全都入了高级社，每年只能等到年终“分红”才领到一点微薄的分配，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其它经济来源。我所在班上贫困同学多，助学金只有一点点，生活费成了严重问题。记得上高二时，父亲狠心把家里的西房拆了，将木材卖掉，解决我的学费。另外，父亲除了在生产队正常出工干活之外，每天早起晚归割青草，晒干后换几个钱攒起来供我上学之用。我深知家中的困难，高二下半学期由于交不上菜金我宁可只吃主食不吃菜。那时饭前先排队唱歌，值班老师训话，然后几个同学分成一组在一起吃饭。由于我交不上菜金，只能拿着自己定量的主食回到教室自己的座位上干吃。这件事，不敢让父母知道，以免他们心里难过，直到今天，我才敞开了在心中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为此，我心中没有怨恨，没有感到羞辱，反而更加激励我发奋学习，我觉得这是贫穷的命运给我造成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让知识来改变这种命运。然而，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学习的自由是受限制的，谁埋头学习就会被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在那种形势下，每个人只能顺应潮流而走，我除了在允许的时间里努力学习之外，还得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给社员理发、拉砖、深翻地、炼土化肥等，高三时有一部分课程就是在深翻上地的现场上的，因此高考时全班只有少数人考上本科，绝大多数都是专科。

1959年高中毕业时我又走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十字路口,那就是毕业后干什么?鉴于家庭困难的压力,我的高考第一志愿填的是山东师范学院。其理由是师范学院伙食全包,而普通学校还是助学金,家里实在无力再提供我这五年的学习费用,而且师范学院的学制是四年,可以提早一年工作来解决家里的困难。由于我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班主任动员我放弃我报的第一志愿,改为其它理工科大学。就在这时,我父亲来到了学校,他来催我考试完马上回家的,因为家里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了,我如果回家可以带回一个暑假的粮票,卖成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当我把班主任动员改填志愿的事告诉他时,他竟然同意了,就这样,我考入了山东大学无线电专业,这使得我有幸毕业后成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大学里我享受全额助学金,但是一个大学生的花费比中学生要大得多,已经供我上了六年中学的贫困家庭,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其所面临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减轻家里的负担,寒暑假我大都留校,五年大学共有十个寒暑假,我只回过四次家。我告诉家里是留校复习功课,实际上是打工。我为系里打过零工,为学校出版科刻过腊版,也到学校附近割过青草送到山大牛奶场去卖。但是,我的学习一直是非常努力的。

十几年的求学生活中有过欢乐,也有过坎坷,但在党的关怀与家人的支持下我都坚定地走过来了,这些艰苦的生活对我来讲何尝不是一笔财富,这是一笔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拥有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笔财富激励着我在以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的路上全身心投入工作,不断取得成就。

二

1964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微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我这个地道的农民儿子能在我们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我的父母都感到骄傲与自豪,因为他们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的儿子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对我今后的希望是好好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家里的事不用多管,只要我在外工作好,生活好,他们就满足了,对我并没有提出半点其它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任何时候父母对子女都是无私的奉献,不图回报。

为了适应我国战略武器发展的需要,1965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156工程处,开展弹上计算机的研究,我调入156工程处,开始从事我国第一代战略武器空间计算机的研究工作,这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并不是谁都能参加这项工作的。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我,父母与家人的希望激励着我,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在大学里我学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但所承担的研究课题却是工艺性很强的微电子技术,面对国外对我国这项高新技术的封锁,只有靠自己刻苦钻研,才能完成任务。我充分利用科学院图书馆的有利条件,查阅资料、综合分析、设计出各种可能的实验方案,经过两年的努力,较好地完成了所承担的研究任务,用这种微电子

技术研制出的微电路,成功地用在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空间计算机上。从此,我在航天科研领域更加勤奋钻研尖端科学,并付出了一生心血,为推动我国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多次获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表彰奖励。多年来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混合集成电路和半导体模拟集成电路的研究

弹上计算机是战略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种计算机的要求是重量轻、体积小、高可靠。自1965年起我开始从事弹上计算机所需要的混合集成电路和半导体模拟集成电路的研究,在国内首先用PN结隔离工艺研制出运算放大器、模拟开关、数/模转换器等十几种模拟集成电路,其中的单片式8位数/模转换器填补了国内空白,折段译码式数/模转换器和动态校零运算放大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所研制出的混合集成电路成功地用于我国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计算机上。由于在发展航天事业中贡献突出,1984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99年由于在航天计算机研制工作中成绩突出,荣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计算机百次参试连续成功突出贡献奖。

二、大规模混合集成电路研究

惯性平台是惯性导航和制导的核心部件,对运载工具来讲它是一种嵌入式设备,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对它的体积、重量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围绕惯性平台电子系统小型化,自1980年我开始从事惯性平台电子系统所用

大规模混合集成电路的设计与制造技术研究,任技术总指挥,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研制成功几十种大规模混合集成电路,成功地用于 XX 战略型号的惯性平台中,1985 年该项成果获航天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军用 DC/DC 电源变换器模块研究

电源是航空、航天等军事电子系统的动力源和生命线。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战略武器电子系统供电的需要,电子系统的供电方式开始由集中式供电向分散式供电发展。DC/DC 电源变换器模块是实现分散式供电的核心元件,自 1994 年起我着手军用 DC/DC 电源变换器模块的研究,经过几年的探索,突破了 DC/DC 电源变换器模块的设计技术、组装及散热技术等一一系列关键技术,成功地研制出混合集成军用 DC/DC 电源变换器模(LHB1900 系列),1995 年我参加了国防科工委组织的军用 DC/DC 电源模块考评,被评为国内工艺先进,1997 年获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高密度组装技术研究

随着集成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混合集成电路发展到了它的高级阶段,由集成单个器件发展到集成一个部件、子系统或者系统。这种技术就是多芯片组件(multichip module),它被世界公认为是当今最先进的微组装技术,其技术含量很高,涉及到电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多门学科。自 1996 年起,我开始战略导弹惯性平台高速高精度测角电路微组装研究,经过五年的努力,突破了多芯片组件的六大关键技术,成功地研制出测角电路多芯片组件,其体

积和重量都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此,2001年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评为1996—2000年度在武器装备预先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者,受到了表彰与奖励。

为了摆脱敌对国家在军用电子元器件方面禁止向我国出口的被动局面,目前我正在从事重点型号电子元器件国产化问题的研究及系统集成技术的研究。

为了培养人才,我曾在职工大学任兼职教师。自1987年起,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培养研究生,是所内历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被聘请为: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九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专业技术发展顾问;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一研究院 CZ—ZF 独立审查组专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电子元器件可靠性专家组成员。

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一直立足服务于航天,跟踪本学科的技术前沿,是所内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课题组组长、多种型号任务中的电路主管设计师、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总工艺师、历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第二届标准化委员会集成电路专业标准化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曾发表科技论文多篇,参与了《大规模集成电路与微计算机》和《弹(箭)载计算机》两本书的编写,获得国防科委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四等奖一项,获航天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三等奖四项,“九五”预先研究成果正在申报科技进步奖。鉴于我对航天科技事业的突出贡献和成就,1988年我被编入《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

三

如果说我在航天科研事业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话,首先归功于党和国家的培养,再有就是支持我的亲人们。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说实话父母对我有些偏爱,但我的姐姐、妹妹都以无怨无悔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力支持我求学上进,至今我对她们心存感激之情。我自从参加工作后一直远离家乡和亲人们,照顾父母的任务就落在了姐姐和两个妹妹身上,她们默默地支持着我的科研事业,承担了本来应由我承担的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也同样不希望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工作,父母上了年纪,特别是患了重病时,哪有不希望儿子在身边照顾的呢!1986年,父亲得了脑血栓,我回家照顾了十几天,可他却催我早日回去,怕耽误我的科研工作,并且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这就是我纯朴农民出身的父母的思想境界。

对我事业支持奉献最多的还要数我的爱人赵佩玲。1969年,在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下,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研究所为了适应战备需要,整建制的从北京搬到陕西临潼三线,而我的爱人赵佩玲却分在西安的一个研究所里从事科研工作,临潼离西安三十多公里。平时我住在单身宿舍,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回西安与家人团聚,星期天一早就得赶回临潼上班、

爱人一个人照顾家庭、孩子，还肩负着繁重的科研任务，这对一个女同志来讲，其负担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她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毫无怨言，始终坚定地支持着我，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完成我的研究课题。就这样，我们两地分居生活了二十八年，一直到1998年初我办了退休手续，才从临潼搬回西安，之后我又被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返聘，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她再一次支持了我。

在这些亲人的无私支持下，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发奋工作，是他们支持我在航天科研道路上不断攀登高峰，并取得一些成就，我所获得的荣誉，一大半应该属于我的亲人们。

我的成长道路和点滴体会

陈洪德

我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尹集镇后业官屯村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亲都不识字。正是他们出于对没有文化的苦恼和体会，才省吃俭用供我上学。说来我也算争气，每天天刚亮，我总是第一个背着书包到校。如果校门未开，我就找个台阶坐下，认真复习老师教过的课程。小学老师是非常严厉和严格的，每次总是带着教科书和教鞭来上课，不少同学对老师都有些怕，但也从内心里佩服老师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因我在家中排行老大，平时自然要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但在初小三年多的学习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因此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回想这一段学习时光，我深感启蒙老师的可敬，也总认为老师的严格要求是应该的。

1949年10月，我考入了当时全县八大完小之一的王庄高等完全小学。一走进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排的教室和宽大的操场。老师个个精神抖擞，神态威严。学生也来自四面八方，谁也不示弱。当时都是自带玉米面和咸菜，如果能吃上一顿炒白菜，那就算得上是美味佳肴了。学生吃饭没有餐厅，冬天下着大雪也仍然在院子里吃饭，有时饭盆里的汤汤水水都结成了冰茬。条件虽差，但从没有人叫过苦也没有人因此而退学，相反则是更

加发奋地读书。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夜以继日,努力拼搏。也许我可能有一点天资,但我的同班一位同学,不时向我提出挑战,每次考试的大红榜上不是我就是他名列榜首。论年龄,我比他小两岁,但我决不示弱。今天才明白,这就是竞争。由于我年龄小,肯用功,也比较懂礼貌,深受校领导和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孙伯玉老师的喜爱。

1951年9月,我又顺利考入全县的最高学府——高唐中学。当时我虽然不知道校园内那古色古香的文庙是画坛大师李苦禅少年读书的地方,但对它的宏伟气度和文化蕴涵总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能够进入这样一所具有四十多年历史,并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的学校,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自豪。在党团组织的影响下,我更积极要求进步,很快成了一名青年团员。那时,学校的教职员个个都是那样认真执着,甚至连传达室的老工人张子余打钟、摇铃也都一丝不苟。同学们曾称赞他有三件宝:“铃铛、锤子、马蹄表”。老师更是认真,特别是郭汉涛老师的讲课给我印象最深,只要钟声一响,他肯定准时踏上讲台,讲课中毫无废话,从不翻书,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大都能融会贯通。这时我特别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是何等重要。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我的学习也更加认真刻苦,成绩也总是比较优秀,还兼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我还在课余时间阅读了不少名著,使我更加懂得了学习知识的重要,深感学习就象海绵吸水一样,有取之不尽的营养。所有这些都教育着我如何去成长和做人,我决心既不辜负父辈的期望,更不愧

对国家和学校对自己的培养。

由于划分地区的缘故,我于1954年考入山东临清一中读高中。这里的基本情况和初中差不多,只是学校规模略大一些,师资力量更强。加之临清是鲁西抗日根据地之一,学校历史悠久,和高唐一样,也是出人才的地方。我仍然刻苦学习,学校有时停电,我总是事先买好蜡烛备用。因为家境贫寒,每次放假,我顶多买点临清小吃或臭豆腐带回家,请父母或家人尝尝。从临清到高唐我家足有一百四十华里,放假时我和同学步行回家,一路下来,脚上打满水泡,两腿也发僵了。有一次放寒假走到村口,突然眼前发黑,什么都看不清了,加之雪后路滑,也不敢走了。这时,听到不远的水井旁有打水声,我就喊了起来,是位姓韩的爷爷闻声后把我送回家。这是因为我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据说牛肝治夜盲症最好,但在那样的困难时期,那里会有牛肝。不过正好赶上过春节,村里有不少人家宰鸡,父母向邻里要了一些鸡肝给我吃,十几天后我的眼睛果然好了。这也说明我身上缺乏营养到了何种程度,乡亲邻里对我何等关心。这时家中的经济非常拮据,有时父母不得不借债供我上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的学业。

1958年暑期,我考入山东医学院医学系,实现了我多年来学医的夙愿,同学和同乡都向我表示祝贺。虽然山医位于黄河之滨,但考入该校的学生,南方人仍占了很大比例,穿着和风度也大不一样。相比之下,我则土气多了。但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卑,决心努力学习,发展自

己。五年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门功课,力争各门功课都取得好成绩。课余时间我还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如写广播稿、黑板报,协助办好学生食堂,还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补习功课。因而我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

宁静和有趣的学习生活似乎刚刚开始,1958年的大跃进风潮不期而至,学校的西南角也建起了几座炼钢炉。当时的口号是:“炉内炼钢,炉外练人”。我虽未直接炼钢,但几乎昼夜在拉矿石和原料,累得筋疲力尽。1958年年底的一天,突然右下腹疼痛难忍,经医生检查,诊断为疝嵌顿,紧急作了手术,刚拆线就投入了生产中。又经过人民公社化,反右倾运动,再加上苏联卡脖子,国家陷入极度困难时期,我的家乡更是重灾区,许多人因为饥饿得了浮肿病,我也未能幸免。1960年,我五十八岁的父亲和一个弟弟、妹妹也竟被饿死了。顷刻间乌云密布、苍天欲坠。此时,家中只有我母亲、我爱人、我弟弟拖着两个还不懂事的妹妹和我刚年满三岁的儿子艰苦度日。我真想休学。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又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我母亲和我爱人以及我的弟弟坚决反对我休学。当时我所在的党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很重视,书记帮助我分析形势,鼓励我要看到光明。同时根据我的实际情况,组织决定给我一等助学金(每月十元)。后来又每月发给我四元的学习补助费。据我所知,在当时这种补助是相当特殊的。我内心十分感动,更加珍惜每一分钱,更加珍惜可贵的学习时间。假期我还参加学校

组织的勤工俭学,如种中药材、帮图书馆整理书籍等,每天可得到七角钱的劳动报酬,这样我的学习和生活便可以维持了。这时家中又传来遭水灾的消息,我的家人跟着逃荒的人流迁移到相对丰收的滕县谋生,生活虽然仍很艰苦,但不至于挨饿。我当时连自己盖的背面都卖了,换了点粮食补贴家中。即使这样,我对前途仍充满信心,更加感激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同学们给予我的真诚帮助。我严于律己,学习上成了佼佼者,政治上也更成熟起来,还成了学生干部和校广播站编辑。

1963年大学毕业时,毫无疑问,我当然是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组织决定分配我到北京医学院工作。在当时四百八十名毕业生中有五名学生分配到了首都。我激动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连家都没有回就登上了开往首都的列车。在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直到毕业来北京前我才在别人劝说下做了一件中山装,我记得当时衣兜还是用手绢拼起来的。回顾过去,深感当时出台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家政策对于整个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是何等的重要。那时同学之间的感情特别深,个人虽然有困难,却于我困难时周济我,这些同学真是太高尚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初到首都北京,感到格外的自豪和高兴,好象到了人间天堂。到北京医学院第一周就是参加教育培训和参观首都名胜古迹、高校等。之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从事内科临床和教学工作,这也正是我的第

一志愿和梦寐以求的工作。这里人才济济,许多专家教授蜚声海内外,令人感到这里是培养人才的沃土。我当时正赶上“三基三严”和住院医师二十四小时住院负责制,住院病人的大病历和血、尿、便三大常规化验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一切都要亲自动手。病历书写不过关还要返工,有时不止一次。住院医师均住在院内单身宿舍,所管病人只要有事,随叫随到。能将一个病人从头到尾管下来,确实很有收获,也很系统。我每天住在医院里,从病房到图书馆,再到教研室,三点一线,紧紧围着病人转,一层对一层,层层负责。每两周才能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在轮流值班的情况下才能出去买点零用品。很少有住院医师在夜里十二点之前离开病房。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人要逼,马要骑”这句话颇有道理。而当时更有一种自觉性和责任感牵动着自己,那时我认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就应该又红又专,对病人要认真负责,技术要精益求精。上级对下级就应严格要求,下级对上级应负起责任,对病人不能有半点马虎。这种时光过了不足三年,但给我的印象却终生难忘,也给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我们这一批人培养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对从医者来说,刻苦、客观和严密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且不可不懂装懂,更不能有半点违背科学。由于我的勤奋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于196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充实和极具吸引力的生活一闪而过,党内的极左思想又愈演愈烈起来。1965年我即被选定参加京郊的四清

活动。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被当时的宣传队派往“五七干校”下放劳动近一年半。爱不释手的专业书籍被束之高阁,一天到晚都在背诵“老三篇”、学报纸和参加劳动,似乎进入迷雾之中。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回到我心爱的事业上来。十年过去了,那正是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十年!只可惜已无可追回。

改革开放以来,完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从1976年底我带学生去开门办学,我才一步步回到我应有之归宿。尽管自1982年起组织安排我担任副院长等党政工作,但我从没有丢开业务,总是积极参加查房,定时出门诊,挤时间看书和到病房看病人。北京图书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特别是在周末。老伴和家里人也对我格外支持,宁肯自己受累,节省出时间让我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为国家效力。勤奋努力的结果,使我取得了应有的成绩。1986年,我被晋升为副研究员、副教授,1991年被晋升为正研究员,同时被聘为北京医科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兼职教授。过去,我曾从事近两年传染病的治疗工作,后从事内科,特别是呼吸内科专业和临床药理工作多年,因而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和专业知 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教学水平,对病人更是耐心细致,深受病人和学生的好评。有些病人给我送来了镜匾和表扬信乃至我诊病时的素描。我初来北医的导师和老师对我的认真和敬业精神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负责医院行政工作期间,我精心钻研医院管理,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曾发表论文十三篇,专著一部。代表作品有:《全国卫生系统医疗

器械仪器设备(商品物资)分类与代码》、《引进高档仪器设备的管理使用和效益探讨》、《国产丁胺卡那霉素治疗感染性疾病 30 例临床总结》等。在和他人一起编纂上述《分类与代码》的工作和在卫生部直属院校机电仪器普查工作中,均获卫生部计划财务司的表彰,并获得颁发的证书和奖金。1996 年获北京医科大学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先后两次应邀赴日本并到香港、新加坡和欧洲八国进行考察学习和交流,进一步开阔了眼界。

我身在北京,心系家乡,帮助很多的家乡人解除了疾病带来的痛苦,有时甚至抱病为他们服务。我也很关心家乡人才的培养,为学校出资助学,为县医院购买参考书籍。为提高家乡医院的医疗水平,使有条件的医生来北京进修学习,时刻关心着他们的成长并尽力从多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我始终认为是家乡人民养育了我,我也应该为家乡人民多做贡献。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虽有一定的天资,但是勤奋、毅力和机遇才使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又不能不和客观条件及国内外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当前,国内形势很好,科技强国和对人才的需求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各方面会提供良好的环境,也会有更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去充实和发展祖国的各条战线。辉煌和灿烂一定会属于坚持科学、不懈追求的人。我虽已年届六十五岁,但定会倍加努力,让夕阳更加绚丽多彩。

边陲往事

李遵林

我对边陲新疆、西藏独有眷恋之情，更忘不了曾经在那里留下的美好回忆。

1964年，我在河北省第三地质大队工作，3月在天津参加完省局的普查工作会议，正准备开展冀东的磷矿普查工作时，接到了上级要我去新疆工作的通知。

原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民经济急待恢复发展，矿产资源便显得尤为重要，铬铁矿是我国当时急需的矿种。铬，金属元素，符号Cr，是制造某些特种钢的重要原料，五十年代起就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求，为此成立了由地矿部副部长李轩主持，地矿部、有关研究所（局）领导、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铬矿会战指挥部，并从内蒙、河北、湖南、山西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奔赴新疆参加会战。我深知新疆气候恶劣、条件艰苦，要早做准备，为解除去新疆工作的后顾之忧，我去北京医院做了阑尾手术，手术后一星期即动身了，从接到通知的那天算起，前后只有半月。同我一起去的还有我的爱人张桂英和另外三个同志，我们五人作为队里最优秀的技术骨干抽调去新疆的。

当时调动很简单，领导开会动员或个别通知，定下来后及时报到，真正做到“把青春献给祖国”、“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跨上了高高的山岗,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这首《勘探队员之歌》伴随着我走过了那段艰苦难忘的历程。

一

1964年“五一”劳动节之前,我们到达新疆北部乌苏县境内的唐巴勒工地,这里是距县城还有二百公里的戈壁滩,工作范围地处准葛尔盆地西缘,北至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当时全国上下正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我们学习铁人王进喜战天斗地精神,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研究学习国内外的资料及经验,对有关岩体进行了评估,采用地质、物理操作钻探等方法,找到了“鲸鱼”矿。我们有时住“地窝子”(地下挖一半,地面搭一半的房子),有时住帐篷,夏天在戈壁滩上很热,白天温度近 40°C ,晒得头晕脑胀,晚上蚊虫叮咬,滋味真不好受,而冬天又很冷。1965年,为了盖房子,我们到和布克赛尔拉木料,途中遇到下大雪,温度降到零下 41°C ,这样极冷的气候经常有。1966年,铬矿指挥部地质组在西藏发现了铬矿,第二年我们进行了大转移,参加会战的大部分骨干和身体素质好的同志再次服从祖国需要,调到了更加艰苦的西藏,我和爱人一起又随着一千多人的找矿队伍走进藏北高原。

二

从事地质工作是艰苦的,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缺少

蔬菜瓜果和水,还有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独,除此之外,在西藏我们又经历了高山反应的困难。青藏高原上的空气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二,开水只有86℃半,做饭要用高压锅,海拔一般都在四千米以上,一般人到三千米左右就有高山反应,这是进藏的第一关。由于缺氧,我们呼吸困难,头痛,脚下象踏在棉花上,吃不下饭,心慌,易患感冒、肺炎、肺气肿,睡觉易憋醒,不能做重体力活,一个月后才基本适应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四千六百至四千九百米左右,最高到过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地方工作。有一年春天,我带车队进藏运送帐棚、汽油(每车二十多桶),由于长途运输,道路颠簸,到风火山附近的五道梁时,有的汽油桶漏了,当时我和司机高山反应很厉害,头痛、呼吸困难,但为了将这些汽油完好无损地送到工地,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卸下了所有的油桶,找出漏桶,再使漏桶底面朝天,抽出其中的小部分油加到汽车里,当装完油桶,我们累得躺倒在地上,很久才上车赶路。

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风雨交加,一会儿雪花飞扬,晴天是蓝天白云,阴天是云雾缭绕,真是人在云中走,车在雾里行,更多的时候是在雪里泥里行走。在藏北,九、十月份开始下雪,第二年四月份才融化。有一年春天进藏,途中夜宿温泉兵站,谁知半夜下了大雪,第二天早晨冰天雪地,我们怕困住,抓紧赶路,山越走越高,路越走越难,快到唐古拉山口时,山上山下一片白茫茫,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我们只好停下来。两个小时后,道班的工人及兵站的解放军开着两台拖拉机在一公里左右的

路上推出一个雪胡同,指挥着汽车通过了这段险路。

还有一年初冬,在从西藏去敦煌的昆仑山口附近,由于雨雪天气,道路泥泞,一天之内近百辆汽车被困,我们在山上没吃没喝等了二十四个多小时,到了晚上更冷,虽穿着皮大衣,也是受不了的,等拖拉机一辆辆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我们的司机熟悉路况,技术又好,他建议走老路,虽不好走,但路基坚硬不会陷进去。他紧张灵活地驾驶着车,冒险冲过了已是一片泥潭的老路。

我们从甘肃敦煌去西藏工地,要经过阿尔金山(当金山口)、柴达木盆地、昆仑山、可可西里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雅鲁藏布江,行程一千余公里,从北到南穿过大半个中国,我基本上踏遍了西藏中部,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藏南山多且落差大,一般都是几百米,在山顶上看雅鲁藏布江,就象一条细带子绕山而过,但爬起来很费力气。1978年在香山工地,因急需打井支护的木料,当时没有公路,汽车运不来,用牦牛或马驮,需到山下找老乡联系,来回要几天的时间。我和分队上几个同志就徒步下山走到另一工地,每人背一块或两人抬一块木料,几乎是几步一休息,我们爬了三座山,来回用了一天时间就解决了困难。

我们在工作中,经常是徒步行走,在工地附近方圆几公里,每天上山山下,收集资料,观察现象,每当发现地面或地下有新的矿产资源都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心情,去更远的地方则骑马。有一年我们在拉萨至日喀则地区进行航磁异常检查工作时,每天都要骑马走很远的路,遇到夜

深辨不清道路时,就松开马,让它带我们回工地,应验了那句成语:“老马识途”。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瓜果蔬菜少得可怜,我们地质工作者生活上则更难保证,一年到头很少吃上新鲜蔬菜,有时在山上采点蘑菇煮汤喝就算解馋了,我们经常吃的菜是海带、黄花菜、粉条、土豆。在拉萨附近工作期间,和有关单位联系支援部分蔬菜,使我们缓解了吃菜的困难。有时单位在内地采购部分压缩白菜、菠菜、罐头、块状酱油等运到工地。由于我们流动频繁和驻藏部队接触较多,军民关系搞得很好,有时部队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生活困难。

1978年,电影新闻纪录片《祖国新貌》介绍了我单位艰苦创业、辛勤工作的情况,记录了我所在的地质分队骑马、爬山、野外工作的镜头,我参加了纪录片的拍摄,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工作性质和环境条件的限制,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自己在银幕中的形象。

三

古语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在边疆从事地质工作期间,别说尽到做儿子的孝心,就是为人父也没有尽到责任。我和爱人没有时间带孩子,两个孩子都是在生下不到半岁,就送回济南由老人抚养,两位老人为我们的事业付出了很多,而我对他们对家庭却照顾很少,回家的时间也是有数的,在新疆工作三年,没回过一次家。我每次从西藏回到家,总感到住的时间太短,与家人离别时总是难舍难分,当踏上万里征途时,泪总是偷偷地流在心里。

在机关,特别是在内地工作生活的人,是感受不到在野外我们地质队员收到信件时的愉快心情的。边疆不是戈壁就是高原,人烟稀少,我们地质队员的野外生活更是单调枯燥,人多时还好些,平时我们的业余活动只有下棋、打扑克、羽毛球、排球,再就是写信,来往信件都是不定时地去县城驻地寄取,一封信往往要需很长时间。那时我们最高兴的事是电影队的到来,有时一晚上放两个片子。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自编自演小节目,有乐器合奏、合唱、独唱等。1965年春节在新疆休整期间我们排演了话剧《红岩》,并到县城演出几场,受到当地群众好评。

1980年,我离开了工作生活十七年的边疆,期间我由一个地质技术员成长为一名地质工程师,并负责地质分队技术工作,获得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和中國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其实,我和在边疆工作的千千万万个地质工作者一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了我应该做的。在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为祖国地质事业付出了汗水,贡献了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找到了急需的铬铁矿,解决了国家建设的急需,我们用心血汗水换取的铬铁矿已被开采利用,其资源优势已转化为经济优势。1986——1991年,西藏铬铁矿产值2.67亿元,1993——1994两年的产值达7200万元,我们的工作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做了前期准备,我真诚地祝福新疆西藏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不断繁荣,祝愿那里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二〇〇二年八月于济南

幸运人生

田兰身

我 1938 年出生在高唐县高唐镇小田楼村一个教师家庭,全家人仍以农为生。父亲田乃明在外从教无暇顾及家务,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虽精明强干,但主持一切家务仍是力不从心。我们姐弟五人我排行老大,又是女孩,自然就成了母亲的主要帮手,再加上重男轻女封建传统的影响,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上学服从于家务,我在祁寨小学读书时经常请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寒暑假时有学生来家看望父亲,烧水端茶是我的天职,师生快乐交谈的样子使我内心非常羡慕,萌发出非要上学的念头。1952 年在母亲的同情和支持下,我高兴地参加了祁寨小学和城关高小的考试,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祁寨小学的校长亲自找我父亲要我留在祁寨小学,我就就近在祁寨小学继续读高小。从此母亲也尽量不再让我请假,但我看到母亲起早贪黑硬挺的样子,心里非常不忍,仍利用星期天和晚上的时间尽可能多做一些家里和田间的活。我自知上学机会难得,学习非常用功,成绩总是排在最前边,这时我也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1954 年我考入高唐中学,第二年我妹妹也考入这所学校,我们俩住在一个宿舍,睡在一张床上。为减轻家庭负担,每周回两次家背干粮咸菜在学校食堂热着吃。当

时学校要求很严,晚自习以后才能回家,第二天早上要赶到学校上早操。生活是艰苦一些,学习上却非常刻苦,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在团委还担任了大队辅导员。1957年我考入夏津一中,一入校就让我担任学生会副主席。三年学生干部生活培养了我关心爱护集体的品德,锻炼了组织活动能力,也是激励自己学习上进的一种动力。每次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班里的三个女生都能为班集体争到名次。高中阶段我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数理化年年都是满分,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因家庭比较困难,学校每月发给我一半伙食费的助学金,每逢假期我都做临时工。记得当时正在建设高唐县棉花加工厂,通过一个熟人我到那里卸车搬砖,挣得的工钱不仅解决了我上学的书本费和另一半伙食费,有时还能帮助家里一点。我早就想毕业后报考医科,可报名前夕学校领导非动员我考工科,争取几次都没结果,就听了学校领导的意见。

1960年我考入山东煤矿学院电机系无线电专业。该校是为重工业培养人才,学生的生活费和学习用品全都由学校供给,大大减轻了自己的思想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这就使我能一门心思的学习,成绩自然较好,还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1961年因师资问题解决不了,学校把我们五年制无线电专业改为四年制机电专业。1962年国家遇到困难,学校压缩人员,国家又急需专业人员,第二年就让我们提前毕业了。我是国家和人民培养的大学生,服从组织分配天经地义,我们无线电专业五个班有七个同学被分配到首都北京矿务局,我是其中之一,听到这

个消息又激动又惊讶。

到北京矿务局报到后,我被分到木城涧矿机电科。木城涧矿座落在京西大山沟里,是个老矿,设备陈旧且种类繁多,这给设备维修带来极大的困难,有的设备坏了根本无法找到配件,只能靠技术人员实地测绘后再加工制造。我分管矿山的压风机、抽风机、水泵和绞车四大机械的维修以及设备迁移位置时的设计安装等技术工作。对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来说,面对那些奇形怪状的设备 and 工人师傅对技术人员那种信赖和期待的眼神,我内心着实增加了很大压力,促使自己下决心作好这项工作。任务明确后,我每天下现场、爬大山、钻山洞,了解每台设备的性能、常出现的故障和处理的方法等问题并一一记录在案。机电科领导和老工人师傅也倍加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记得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测绘抽风机主轴,测绘后再由外协加工制造。面对这个三米长、二十厘米直径的“庞然大物”,用机电科那几件简易的测绘工具来完成任任务感到很是头疼,可这关系到井下几千工人尽早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大问题,我围着它整整转了一个多星期,翻来覆去地测量各个尺寸,测完后自己心里也没底,又请七级车工老师傅给我复测后,这才壮起胆子相信自己,真是万事开头难。随后我设计安装了三台卧式 100 马力压风机和一台井下斜坡 50 马力绞车。机电科从外地招来一批小青年,工作很卖劲,但学习基础太差,一张图纸老师傅讲几遍也不懂。看到这种情况我也为他们着急,想助他们一臂之力。我住的单身宿舍离机电科很近,就

利用业余时间教他们提高识图能力和常用到的数学知识。后来很多小青年都来找,我只好每天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集中给他们讲课,甚至有的老工人也来听。由于我和工人师傅关系处得融洽,也给我的维修工作带来很多方便。我的努力得到组织的认可,196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6年我被调到政治处组织科,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归队负责机修厂的技术管理和全矿中小型设备维修工作。这时我除完成正常工作外,和几个车工、钳工技术能手搞起了技术革新,先后为解决井下水沟排水问题仿制了浅水泵;为提高煤仓火车装煤效率,改善工人工作环境把人工操作的闸门改为机动操作;为方便大型设备维修设计制造了简易小吊车;还为食堂制造了馒头机;1975年我承担五吨卸式箕斗的设计制造任务,用于矿山矸石山矸石的排除。维修是一个应急的差事,又大多是利用工人休息的节假日检修平时不能停的设备,为此我在矿上十三年没有休息过节假日。这给托儿所的阿姨们增添了许多麻烦,她们倒是对我的孩子特别关爱和照顾。当我调离本城涧矿时,机电科领导亲自把我送到家,同志间友情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本城涧矿说是在北京,但到我爱人那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火车,需三个小时。1976年因我爱人做了手术,孩子又小,家庭生活确有许多实际困难,矿上这才同意我调到我爱人的单位冶金部自动化所电气传动室。到这里我的专业不对口,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弱电方面的新知识,诸如电子技术、可控硅电路、电力拖动自动化以及

调试工作所用的各种仪器仪表,先后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 1150 初轧机励磁和压下、上海第一钢铁厂 1200 板轧机压下工程的部分结构图设计和印刷线路板放大图的绘制。1977 年我参加由五十年代高级工程师丁蕴石主持设计的长城钢厂 825 初轧机和攀枝花钢铁厂 1150 初轧机可控硅供电装置的研制工作。这个项目是冶金部投资几百万元的攻关项目,也是国内初轧机主电机容量最大的两套可控硅供电设备。丁老工带我一个兵和其他外协人员开始了研制工作。我在矿山搞了多年机械对强电也有些了解,丁老工就分配我负责水冷系统的研制任务。水冷系统是大容量可控硅供电装置能否安全运转的一个重要技术问题,当时国内只有上海第五钢厂有一套从国外进口的水冷供电设备,但还没有投产。经对这套进口设备的水冷系统考察后认为不够理想,于是决定自行设计和制造。1978 年底我按要求如期完成了设计制造和组装任务,设备运到四川长城钢厂进行现场试运行,效果达到了设计要求。这套水冷系统以后也没再修改,后来被其他工程多次选用。这套供电设备曾经由于容量太大,在现场试运行的过程中电气系统多次出现问题而失败,参加人员受到的打击无以言表,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丁老工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大家继续前进。每当失败后,大家重新振作起精神,认真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改进设备的结构,在重新制作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筛选外购电气元器件和确保所有外加工件质量等措施,随着工作的进展也增加了人员。

几经波折,历时九年这套设备终于在1986年11月底投产运行,运行一年后通过了部级鉴定,并获自动化院一等奖、1988年冶金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胜利来之不易,这中间大家不知遇到过多少大大小小的问题和困难,付出了多少心血,我都没有灰心和服输,但当站到领奖台上时,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流出了热泪。领导对我们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也由工程师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按照国家规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参加人员的前三名退休时,给予提高10%退休金的待遇,当我退休时也享受到了这一待遇。失败是成功之母。在我们研制的设备反复试运行失败的那些日子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电气方面的设计研究人员前来学习取经,这为后来的人在研制大容量电气设备时少走或不走弯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如高压电气的现象、低压电气元器件的耐压、低压信号抗干扰、现场布线等等,使我这个电气传动方面的新手以后也能承接项目了。

我所在的单位主要从事技术应用,把自己研制的电气设备应用于冶金工业,技术人员出差到一些钢铁企业参加设备的安装调度是家常便饭。而像我这样在四川长城钢厂连续奋战九年,在自动化院也是无先例的。这期间我每年出差时间累计都在七个月以上,这对一个有小孩的女同志说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家庭也要做出很大牺

牲。在漫长的九年里,我爱人也频繁出差,还到边远地区支教一年,两个孩子难以得到应有的关爱和照顾,他俩人从上小学起就学会了做饭、洗衣服和其他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想到这些,内心深感歉疚。在我和我爱人都出差的日子里,单位领导、班主任老师经常进行家访,邻居和我们在京的同学也经常到我家帮助照顾他们的生活。为彼此心里有所寄托,我出差前都是给他们在信封上写好通讯地址,贴好邮票,他们把想要说的话和每天的活动记下来定期寄给我。说句心里话,我那时非常担心两个年龄相差不足两岁的男孩子单独在家会发生不测之事,使我欣慰的是他们都很乖,顺利度过了小学和中学阶段,后来还都受到高等教育,所有这一切至今我都难以忘怀。1990年院领导考虑我对机电两方面都懂一些,把我从传动室调到工艺室,工艺室主要是为自动化院多年来自行研制的电气传动设备做定型方面的工作,以利于批量生产。我在新的岗位上设计了大量产品定型图纸和资料,直到1995年退休。退休后又被返聘工作了三年。

回顾往事,我体会到一名技术人员要想在事业上作出点成绩,回报国家和人民的培养,执着、信心、勤奋是必不可少的,对一名女技术人员说更是如此,也许付出的会更多些。

二〇〇二年十月于北京

烤鸭圣手李兴禄

张春亭

这篇文章记述的是一位著名厨师的事迹。

他叫李兴禄,是被艺术美食家称为“饮饌圣地”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第五代烤鸭技术正宗传人。1938年5月5日,李兴禄出生在高唐县固河镇前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谋生,1950年元月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他走出高唐去北京投奔表姐,当了一名童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能进全聚德烤鸭店,并且成为名震首都饮食圈的特一级烹饪技师。他曾名扬洪都南昌和苏北盐城,还曾在日本东京为国增光。1998年他在全聚德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劲松烤鸭店副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休。

回顾在北京五十余年的历程,他觉得如在梦中。

—

李兴禄到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50年元旦,但这个日子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喜庆,从这一天起,不满十二岁的他便成了门框胡同新昌冷食店(私营)童工。他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年,几乎晚上十二点以前没睡过觉。因为天天站着干过重的体力活,使他双脚脚弓塌陷,患了平足病,走路干活都非常困难。

1954年春天,正在失业的他,经过在前门区劳动局提

高文化就业学习班的短期学习,被介绍到公私合营后的、已有九十年历史的全聚德烤鸭店当了一名学徒工。

全聚德的学徒生活依然十分艰苦,除帐房先生和厨房掌灶在店里各有一个铺位外,其他人都得在晚上歇业后,把前厅的凳子搭起来睡觉,酷暑严寒,天天如此。早上六点钟,值班的人一声“起床了!”大家便机器人一般站起来,卷好铺盖,集中放在一个破房子的柜子里,然后扎上围裙作工作服,一天的紧张劳动就开始了。

所谓当学徒工,实际上就是打杂:剥葱、剥蒜、砸毛姜,烧锅、打水、上高汤;蹭勺、擦案、倒泔水,劈柴、抬煤、掏炉灰;宰鸭、择毛、跑外卖,洗碗、刷盘、又洗菜……脏活累活,全都由学徒工来干。

李兴禄长得精神,又很机灵,虽然只读过三年书,但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了,尽管身子骨比较瘦弱,但手脚十分勤快,又特别能吃苦,所以很受师傅喜爱。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十五岁就入了团,十八岁又入了党,很快就成了学徒工的领班。从此,他干起活来就更不要命了。原来在新昌冷食店当童工时落下的平足病,如今更加严重,走路一步一挪。党组织与烤鸭店私方代表给予了李兴禄很大的关心。就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全聚德烤鸭店将李兴禄送进了积水潭医院治疗,使他恢复了正常的劳动能力,这使他对党、对政府更加感激不尽。

那些年,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大家常把李兴禄称作“傻李”,那是对他不怕脏、不怕累、不要命的精神的一种赞誉。但人们并不详细知道他为工作、为顾客默默地忍

受了多少痛苦,做出了多少奉献和牺牲。妻子常年生病,病情时好时坏,有时还得住院治疗,李兴禄不得不三天两头骑车子去医院,店里的的工作也不能耽误,他只能在中午忙过顾客用餐高峰后,到医院帮助妻子料理一些事务,又急忙赶回店里,常常来不及吃饭,只好边骑车、边啃几口馒头。有时还要跑遍许多药店去抓药。然而,他在全聚德工作四十多年,家中有再大的困难,也从未耽误过工作,更很少休过节假日。掐指算来,只有一个春节是在家中过的,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店里停业闹革命,他才得以有那次清闲。两个儿子长到七、八岁,他和孩子几乎没说几句话,因为他每天早晨五点离家进店,孩子还没有醒来;晚上十点多回家,孩子又已进入梦乡。他是一门心思扑到工作上去了。奖状倒是得了不少,个人的,班组的,店里、区里、市里奖给的,年年都拿回来好几张,也只是随便往家里一放。妻子身体好时给他收拾一下,如今也都在那里压箱底儿,而他从来也不以此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

二

李兴禄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干。他身体构造特异,面对高温很少出汗,所以他烤制的烤鸭特别均匀好吃。你若问他四十多年来曾为我国和外国多少党政军要人做过烤鸭?他记不清;问他哪年哪月为哪位国家领导人做过烤鸭?他还是记不起来。

有一个日子他是记得的,但具体时间却是从《全聚德史话》里查到的。

那是1957年3月27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全聚德,出席彭真市长为欢迎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而举行的宴会,李兴禄当时已是学徒工的小领班。那次,他作为入党刚半年的新党员,还肩负着党组织交给的保卫首长的任务。宴会结束后,周总理送走了外宾,特意到厨房来问候职工,向大家一一握手,他握过李兴禄的手后对大家说:“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干呀!要把老师傅的手艺学到手,一代一代传下来。”当周总理走到二道门时,又回头看了看“全聚德”匾额,特意对经理说:“你们要好好爱护这块金字招牌,把生意做得更好,为国家多做贡献。”听了周总理的教诲,李兴禄激动不已,从此,他更加刻苦学习技术。

为练习制作鸭胚的特殊技艺,用一个手指头伸入鸭胸腔掏取内脏,李兴禄手指都被磨破了,后来练得手指长出了老茧,一分钟就可掏净一只鸭子的内脏。然后再灌水洗净。最后是从鸭脖子的皮肉之间往里打气,使整只鸭子通体饱满滚圆。

以后他又拜名厨张文藻为师,刻苦学习了一整套挂炉烤鸭技术和工艺。

说也奇怪,李兴禄的身体似乎有一种特殊构造。他站在挂炉前制作烤鸭,炉内熊熊燃烧的枣木火焰温度高达近二百度,他手持一把一米多长的鸭杆,将已经涂了饴糖水的鸭胚挂在炉火上方的铁梁上,以后便是不断地操纵鸭杆,转动鸭身,待快要烧熟时,还要特别注意“燎裆”(即烧烤两个鸭大腿沟)。就是这样炉内烤鸭,炉外烤人,

尤其是在酷暑炎夏,别的师傅热得似落汤鸡,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而李兴禄顶多也不过是脊梁沟有些湿润,他可真是堪称“耐温将军”了。由于他特别抗高温,所以他烤制的鸭子也特别均匀酥脆,清香可口。

后来,周总理多次在全聚德宴请外宾,都是李兴禄烧制烤鸭,他亲手将整只烤鸭呈送到周总理和外宾面前,当场熟练地将烤鸭削成一百多块肉片,而且做到片片带皮带肉,片片状如杏叶(圆状),受到宾主的一致称赞。

李兴禄已记不得在哪一年,周总理在全聚德宴请西哈努克亲王,这次依然是李兴禄为宾主呈上整只烤鸭,并当场表演削肉。席间,周总理发现贵宾用圆形的薄饼包卷杏叶状的鸭肉不大方便,便把服务员叫到身边,建议厨师将烤鸭削成长条形,同时把薄饼改为椭圆形,这样客人卷着吃会更方便。以后,李兴禄大都采纳周总理的建议,将烤鸭肉削为桃木形(即长条形)的方法,很受中外宾客欢迎。

大概是1965年的一天,全聚德党组织负责人派李兴禄去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献艺做烤鸭。为了拿出他的全部本领,他从冰库里选了最上等的鸭胚,带了店里特制的甜面酱,连烤鸭子用的枣木劈柴也是从店里运到人民大会堂去的。但离要求用餐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而通常烤好一只鸭子从烧炉到烤熟都要一个半小时。这可如何是好!只见李兴禄不慌不忙,待生好火不久,即将鸭子腹腔内已被烤化的冰水倒出来,重新灌入滚开的沸水再挂于炉内精心烤制,终于按要求的时间,将香脆可口的

烤鸭肉一片片削好，由工作人员呈上了毛主席的餐桌，毛主席吃了非常满意。这次，李兴禄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但他打心眼儿里感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和自豪。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李兴禄便经常骑自行车跑外卖，客户中既有平民百姓，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今仍记得曾到无量大人胡同、东总布胡同为陈毅、李济深等送过烤鸭。以后，不定期曾到叶剑英家中呈送鸭子。叶帅品尝完美馐，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在这里看场电影吧。”于是，李兴禄他们就这样受到了一次特殊的待遇，离开叶帅官邸时，叶帅和秘书还特意派车把他们送回前门。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外宾，差不多都由全聚德名厨张文藻和李兴禄前去制作烤鸭。李兴禄从来都把这些看得很平淡，认为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

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刘少奇主席在国宾馆招待某个国家元首，也是李兴禄前去烤的鸭子。宴会结束后，刘少奇在天桥剧场招待外宾看芭蕾舞《白毛女》，李兴禄等几位厨师也被邀去看了，而且就坐在刘主席后面。他心中激动万分：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厨子，在今天竟受到这么高的待遇！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命工作？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他受命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和全聚德其他厨师一起为铁托总统烹制世界闻名的全鸭席。宴会前，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招呼包括全体厨师在

内的工作人员一起，与铁托总统合影，李兴禄催促厨房的所有人员到大厅去合影，唯独自己一人守在厨房内。同志们喊他、拉他，他却执意不去，他说：“合影完了接着就举行宴会，我必须提前做好烤鸭的准备，合影少我一人没关系，是小事；如果该上烤鸭时上不去，冷了场，耽误宾主宝贵的时间，那可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声誉的大事了！”

李兴禄不仅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更把国家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1982年至1984年，他受全聚德委派，到日本东京留园饭店增设的北京烤鸭店任二级厨师（在当时已是最高层次的厨师）。那时，国家为了保持北京全聚德烤鸭的传统特色，不仅该店六名炊事人员都是全聚德派出的，甚至连鸭子、甜面酱等原料及烤鸭子用的果木劈柴等等，全都是从北京运去的。李兴禄在日本两年，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从未出过半点差错。1982年9月29日，是中日正式建交十周年，日本各界知名人士三百多人在留园饭店举行纪念大会，会后品尝中国名饌北京烤鸭。李兴禄在地下厨房一只接一只地烤制出体态丰盈、外焦内嫩、气味芳香的烤鸭，源源不断地用食梯打到二层大餐厅，宾客们吃得兴高采烈，啧啧称赞。宴会结束，三百多位客人又鱼贯而下，到地下室的挂炉前参观。当我礼宾人员将烤鸭名厨李兴禄和杨世勤介绍给大家时，日本客人纷纷伸出大拇指表示称赞，并一一深深鞠躬表示感谢。此时，李兴禄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为中日友好尽了一份力量。他的心头充满了

一种在国内不常体验到的自豪：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能够创造出如此独特的饮食文化，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多么的智慧和勤劳。从此，他也就更加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了。

三

李兴禄几次创造性劳动，曾在首都饮食行业引起轰动效应。

他在全聚德干了大半辈子，经他辛勤制作的烤鸭不计其数，你若问他有过哪些创造性的劳动，他自己仍说不出。“都是一些很平常的活儿，哪谈得上什么创造性？”他仍然非常平淡地这样说着。

其实，前面已经讲过的，李兴禄在给毛主席做烤鸭时采取的那种加快制作速度的做法，应该说就是他对烤鸭技术的一种改进和创造。他谈到了，但他并没意识到这是什么创造。

在全聚德，厨师们为宴会烹饪珍馐佳肴，什么时候该上什么菜，犹如一个戏班子唱戏，哪个角色该什么时间上台，就得什么时候上台，早了晚了都不行。特别是要上烤鸭了，该你出去，你还没有烤好，以致使整个宴会冷场，这可不行；不该你上台，你把鸭子早早烤熟了，甚至给烤糊了，以致作为主角的烤鸭出不了台，这当然更不行。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采取某种方法加快制作速度，是一种改进和创造。李兴禄早在1959年发明的将冻鸭腹腔内已被烤化的冰水倒出来，重新灌入沸水的办法，使原来需要一个半小时的制作过程缩短了三十来分钟，这对提高

烤鸭技术也是一种贡献。

1990年亚运会期间,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曾在北京展览馆办了一个迎亚运旅游购物中心,全国许多老字号云集北京,其中包括饮食服务行业。李兴禄首创烤鸭快餐,参加迎亚运服务活动,就曾在同行业名噪一时。

顾客在全聚德品尝烤鸭,一般都讲究现烤现吃,这样才能品出烤鸭的酥脆醇香。过去有警车开道从全聚德往国宾馆送烤鸭的说法,其实那并非夸大其词,而是确有此事,为的就是让贵宾品尝到刚出炉的北京烤鸭。以后,在李兴禄的指导下,钓鱼台国宾馆也盘了一个烤鸭炉,才不采用警车开道送烤鸭的方式了。然而,李兴禄心想,顾客吃刚出炉的烤鸭固然是一种享受,但吃到后来烤鸭也会凉的。其实吃凉鸭肉也未必就不是一种享受。所以,在亚运会期间,他大胆地创造了全聚德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烤鸭快餐:一个塑料盘儿,内装片好的鸭肉、甜面酱、葱条、薄饼,外加一杯猕猴桃果汁儿,总共10元钱。尽管展览馆给的摊位很小,而且是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旮旯里,却十分招揽顾客。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天都前来争相抢购,然后就找座位坐下来品尝,连其它摊位前的座位也都给占了。有位香港客人要吃鸭肝鸭胗,李兴禄特意应诺次日给他带来。那人很感动,执意要付小费,却被李兴禄婉言谢绝了。他的这一创造,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北京旅游服务行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92年是北京市的旅游黄金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让北京亮起来”的口号,要求各大中企业和服务行业展

现自己的活力,走出玻璃墙,为老百姓服务。北京市旅游局搞了一个长亮广场,汇集了几十家饭店名吃。李兴禄又带了几个人进入长亮广场,建了一个垂花门,摆上几张桌子、几把椅子,打出了全聚德的牌子。游客们一见“全聚德”三个字,立即排起了长队。这次,李兴禄又有创新,即在上次烤鸭快餐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碗鸭汤龙须面。七、八、九三个月,他们每天晚七点进入,凌晨一两点返回,一个十平方米的摊位,平均每天盈利五六千元,再次在北京和饮食服务行业名列榜首,并又一次引起了轰动。

四

身怀绝技,李兴禄自己却意识不到。外地的烤鸭店都把他的技艺视为一宝,纷纷请他去作技术指导。

全聚德的烤鸭早已被誉为“国际名菜”、“世界珍味”,凡到全聚德品尝过北京烤鸭的外国人,无不赞美和感谢创造了这一精美食品的厨师们。作为制作烤鸭的专家,李兴禄和其他特级烤鸭技师一样,堪称身怀绝技的人,但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店党支部书记马文斌慧眼识珠。他说,李师傅的几个绝招大家都是非常佩服的。比如说,随便拿来一只白条(杀后去毛的鸭子),李师傅一过目便知:这鸭子是什么时候杀的,是不是过夜的鸭子,宰前有没有超量填食,宰后有没有泡过水。只要经他提一下,便知道这鸭胚(除去内脏,充完气,准备上炉的鸭子)能烤多少斤。烤出的鸭子,他一眼便能分出是过火了,还是不熟,他认为不熟一刀下去准会见血。他对鸭子的成长周期、鸭源的淡季旺季了如指掌。春节前后是全

聚德生意的旺季,但又是生产鸭子的淡季,鸭源常常断档。每年八、九月份,李兴禄都要到鸭场摸底,制订计划,组织货源,保证鸭源淡季不淡,源源供应春节烤鸭市场。

1990年,电影故事片《老店》开拍时,让烤鸭店做技术指导,影片中饰演烤鸭技师的演员的一招一式,都是经他指点的。

此后,李兴禄为全聚德集团多次到外地烤鸭店作技术指导,扩展烤鸭业务,传授烤鸭技术。1990年初冬的一天,江苏省盐城市瓢城饭店突然挂出了“新添北京全聚德烤鸭”的大招牌,尤其那个“特聘北京全聚德特级技师李兴禄掌厨”的牌子,更是引人注目。

原来,盐城市瓢城饭店生意萧条,正面临着关闭的危险。总经理邱振国进京考察,发现全聚德烤鸭店生意红火,特向前门全聚德求援,获准由高级技师李兴禄前往盐城开展烤鸭业务,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邱振国还特意包了电影故事片《老店》,招待盐城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体户代表等,并在放映现场向观众介绍了作为该片技术指导的李兴禄师傅。一时间,这条不大不小的新闻轰动了盐城,连该市所辖几个县的大批顾客也都前来光顾,品尝北京烤鸭的独特风味。此前,瓢城饭店门庭冷落,几可罗雀。由于李兴禄的到来,该饭店的日流水账竟高达七八千元。

1991年春节前夕,李兴禄原定腊月二十七日返京。无奈,这天飞机的航班已被取消,他只得提前于腊月二十四日返京。然而,此时已有一千多只烤鸭预订出去,李兴

禄提前走了怎么办？

为了满足盐城市民过春节食用烤鸭的需求，年过半百的李兴禄连续五天从早上七点到深夜十二点不停地制作烤鸭，徒弟陈健康都顶不住了。李兴禄说：“小陈，看来你的功夫还得好好练练。你实在累了，就只把鸭子挂进炉膛，剩下的活就全由我包了。”每炉烤二十只鸭子，每只鸭子要翻来覆去烤五六次，一千多只鸭子，就这样全部保质保量赶制出来了。

改革开放后，李兴禄北到沈阳、大连，南到昆明、贵阳、南宁、南昌、郑州，东到天津，西到太原、榆次、长治等地，拓展烤鸭业务，传授烤鸭技艺。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他都严守操作规程，确保全聚德的正宗风味，并要求他的徒弟们保持全聚德这块金招牌，只能给这块金招牌增光，决不要给它抹黑。

五

1993年5月，具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全聚德老店，在和平门、前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基础上，组成了大型集团企业——中国北京全聚德烤鸭集团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十分重视科研，研制出分体电力烤鸭炉，李兴禄任技术鉴定。在研制过程中，李兴禄提出的技术要求仍然是一定要保持全聚德的传统风味，最后他给予这一科研成果以充分肯定。

二十年来，经李兴禄培养的徒弟已有二三十名，其中最高的已成为特三级厨师，有的成了部门经理，有十几名先后被派出国，到英、美、日、泰、朝、挪威等国担任中国餐

馆的特级烤鸭厨师。家乡高唐县也先后有十几个青年，直接或通过熟人介绍找到李兴禄拜师学习烤鸭技术，李兴禄都热情接待，提供各种方便，精心传授技术。这些人学成之后有的留在北京，有的去天津、苏州等地干餐饮或在宾馆餐厅当烤鸭厨师。固河前坡村的李振华现在已经成为天津一家饭店的烤鸭名厨，还有的回高唐创业，使高唐的父老乡亲不出县城也能品尝到北京烤鸭了。

李兴禄在劲松全聚德烤鸭店任副总经理期间，带领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使该店经济效益逐年上升。1992年，该店流水收入仅为二三百万元。到1995年，已增至五六百万元，并获得1995年度北京“定点餐馆最佳团队餐奖”，是该年度北京市获得此奖的仅有的两个定点餐馆之一（另一个是颐和园听鹂馆）。

同北京全聚德集团其他主要成员企业一样，前往劲松烤鸭店品尝烤鸭的中外宾客可谓络绎不绝，甚至有些北京顾客远自海淀区或大红门等地乘车前来购买刚出炉的烤鸭，拿回家去分享，为的就是品尝这里名厨料理的正宗风味。许多外国来华旅游团成员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的心情，前来品尝“天下第一美味”，也是因为这里有特一级烤鸭技师。李兴禄不愧为烤鸭圣手，1987年在“首都旅游紫禁杯”活动中被评为最佳个人，获得奖章一枚，同年获北京烹饪协会授予的“优秀厨师”荣誉证书；1988年他又在全国旅游优质服务竞赛中荣获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并获得到新加坡观光旅游的机会……他的事迹被登载在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1997第一期以及《北京日报》等其它报刊杂志上。

情系学海半生缘

——记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

曹志娟 吴亮

父亲引导他走上读书向学的路，鲁迅及其文章则赋予他终生的理想和追求。书籍，是他青少年时代的唯一伴侣。王富仁说：“中学时代奠定了我的文学功底”。

1941年7月1日，王富仁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琉寺镇前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前屯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小村，读书识字是村民敢想却不敢求的奢望。王富仁上有个长他10岁的姐姐，下有小他11岁的妹妹，三人中只有王富仁一人走上了治学的路。王先生深情地说：“父亲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家里穷，父亲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但是，他不放弃读书识字的任何机会，即使下地割草，怀里也要揣上一本书，休息的时候就用草棍在地上练习写字，遇有不认识的字，他就记下来，逢人便问。后来，村里有一个在茌平县邮电所工作的人，好心地资助父亲读师范讲习所。于是，勤学不辍的父亲在近30岁的年龄才有机会离开家乡。”

父亲的经历在乡里传为佳话，年幼的王富仁就在这种佳话的濡染下开始了他的人生。他6岁入学，到1954年高小毕业，一直生活在故乡。后来，随父亲来到聊城，1957年他在聊城三中读初二，就在这一年，他的学习生涯

有了转机，一生的机缘似乎在此时确定了。这年《鲁迅全集》开始出版，在聊城干部疗养院工作的父亲订了一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出版界不如现在红火，《鲁迅全集》的出版对年轻好学的王富仁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浩瀚博大的鲁迅作品让他如醉如痴，他一卷一卷地读，除了上课，业余时间全用来阅读《鲁迅全集》。一年下来，他读完了《鲁迅全集》的创作部分——《鲁迅全集》前7卷，包括小说、散文、杂文。“那时虽不能完全理解，但感受很深。”多年后的今天，王先生忆起旧日情景仍充满了感情。高中时代的王富仁对鲁迅著作倾心不改，他要求自己每学期至少读完两卷鲁迅作品，然后再读其它书籍。同时，鲁迅的影响已在不经意间渗透了这个少年的心灵，他或许不清楚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但是此时，他却有意识地按照鲁迅先生的要求而做了。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说：“多读外国书。”因此，王富仁除了认真地阅读鲁迅本人的作品外，还有意识地阅读他通过各种渠道借到的鲁迅在作品中提及的外国书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门类，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欧洲文学史》、《俄罗斯文学史》等，以及尼采、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马克·吐温等名家的作品。“后来上了大学我才发现，大学外文系开列的外国文学课程，我几乎全在中学时代读完了，甚至大学没开设的，我也读了，中学时代奠定了我的文学功底。”

但是，读书的日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静，在那个知识不为人尊重的时代，好读书，而且好读外国书（被

认为会产生资产阶级的不良影响)的王富仁一时成了班干部的批评对象。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当时莘县有两个中学生在—棵杏树下成立了“杏林文学社”,他们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事情发生后,各校就开始清查“杏林文学社”的运动,文学爱好者就成了怀疑对象——王富仁首当其冲,他的日记被搜去了,日记中的有些文字情绪稍有低沉,审查者就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你还有悲伤的情绪?”今天看来这近似荒唐的事情在那时可不是玩笑,因为它涉及的是政治问题。王富仁一次一次地写检查,但检查就是通不过,结果1961年高考,他以外语98分、总分平均84.5分的好成绩竟然名落孙山。

鲁迅对俄罗斯文学的钟爱促成了王富仁学习俄语的抉择,毕业后,他却去中学教语文。是阴差阳错,还是天意使然?王富仁说:“中学教师的经历锻炼了我对具体作品的欣赏能力。”

目送同学们的背影走进大学校门,在苦恼中度过一年的王富仁终于于1962年考进山东大学外语系俄语班。王富仁之所以选择俄语是和鲁迅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鲁迅钟情于俄罗斯文学,其小说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王富仁尤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进了大学后,他开始系统地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搜集有关契诃夫的资料,光资料卡片就做了好几盒子。显然,王富仁开始试着选择自己今后的路了。

但是,196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山东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没有走上学术研究的路,却被分配到山东即墨县金口解放军劳动农场参加围海造田的劳动。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是当时的社会潮流,是党的号

召。“在那里,最脏、最累的活我都干过。”王富仁说。1969年年底,在接受了一年半的劳动教育后,王富仁被调到聊城四中任中学教员,因当时四中未开设外语课,王富仁改教语文,他一肚子俄罗斯文学只能通过母语娓娓向学生道来。幸好中学时代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因此,所教虽非所学,学生们却非常喜欢这位年轻博学的语文老师。人的价值就在于他的所作所为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尊重和接受。当自己讲的课使那几十双晶莹明澈的眼睛鲜活明亮起来时,王富仁感到教学的生涯虽苦也有乐。

“这段日子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锻炼了我对具体作品的欣赏能力。文学欣赏是研究文学的基础,是文学研究者的基本能力。对一部文学作品,只有感受了它的灵魂、它的美,才能解读它的价值。”王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最大问题,是往往不把文学作为欣赏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实用工具来评判,以外国标准衡量中国文学、以固有的理论框框套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上,至今还是文学研究界有很大影响的一种时尚和潮流。”

人至中年方与学术结缘。每一步总比别人慢半拍的王富仁先生终于有一次超前行动: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治学的路几经曲折后终于柳暗花明,王富仁说:“坎坷的经历使我更多地认识人生,也更深刻地理解鲁迅。”

1978年,国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新的曙光洞开了王富仁的心扉,37岁的王富仁在做了10年的中学教师后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单演义先生研究鲁迅。1982年他又投到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李何林先生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84年提前一年毕业,因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社科类博士生。王先生幽默地说:“我这个人总比别人慢半拍,上小学,我因小学停办误了一年;读中学,我因病休学,又耽误了一年;考大学,我因‘杏林’风波迟了一年;读硕士晚了10年,只这博士学位比别人早拿了一年,可惜,年龄又大了。”

王先生的幽默让人细细品出许多心酸以及尝尽心酸后的通脱和平淡。无论坎坷和平坦,经历都是人生的一种财富,人至中年才和学术结缘的王富仁先生珍视他的每一段经历,并在这些经历中体味人生,进行学术思考。“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种奇特的社会条件下,对那时的大气候以及个人的生存环境,我不抱怨。坎坷的经历使我更多地认识人生,更深刻地理解鲁迅及其作品。我相信,这种理解不是纯粹的书斋生活所能获得的,这种理解来自人生、来自心灵,来自个体生命置身于群体社会的独特体验。”

王富仁先生在其学术思考中,注入了这种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所以他的学术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甚高,在学术研究领域可谓横刀立马,卷风带雨。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个学期,他就完成了《果戈理与鲁迅前期小说》、《契诃夫与鲁迅前期小说》等一系列论文,在《鲁迅研究年刊》和《文学评论辑刊》等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后辑成《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于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1990年获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协会

颁发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一等奖。1984年他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此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文化与文艺》、《灵魂的挣扎》、《历史的沉思》,此外即将出版的还有《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几种,发表论文近200篇。

多年的胸臆积蓄、多年的学识积累,使王富仁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一发而不可收。

他举起鲁迅先生倡导的思想革命的大旗,其博士论文引起学术界近一年的争论,他由鲁迅研究拓展到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思考。谈及鲁迅对自己的影响,王富仁说:“以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为己任,追求学术的独立与创新。”

王富仁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其标志性成就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以其分析“完全符合鲁迅前期思想的实际和小说创作的实际”,肯定他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分析《呐喊》、《彷徨》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但该文摘要在1985年《文学评论》第3、4两期发表后,引起学术界近一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思想革命”这一提法,因为,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分析《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

王富仁客观地总结了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研究鲁迅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更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研究系统的不足,因为“它与鲁迅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彷徨》的思想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

到的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王富仁先生认为,政治革命打击的对象是敌人,思想革命的改造对象是自我;而鲁迅的独特意义,便在于“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用现代的观念,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适应现代中国自立自强的需要的角度,亦即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角度,最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特点和不足的一个中国现代思想家”,那么,思想是什么?王富仁说:“思想不仅仅是一种著书立说的学理,而是一种解读各种文化现象的方式,这种方式体现着社会上部分人的社会的或文化的理想,在这种理想的促动下,他思考一切必须思考的事物和文化现象,并且以自己的形式作出解答。”(《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王富仁先生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研究鲁迅,解读其作品,无疑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摒弃了“政治革命”这一角度的简单化、形而上学化,同时,他又赋予“思想”以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以此进一步拓展到对鲁迅以外的作家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思考。他认为沈从文未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例,是因为“他缺少一个为现代伟大作家所不能不具有的更深刻的思想,他远未脱出世俗现实生活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无形束缚”。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把握作家作品、把握本世纪文学文化的发展脉络,这一思路渐为学术界首肯和接受。王富仁先生之所以能拨开传统研究的迷雾而看到“思想文化”——鲁迅作品中的这一内涵特质,这和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使命分不开,也和他独立

创新的学术态度有密切关系,这两方面,他都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

王富仁先生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发现,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缺乏民族的独立性。中国近现代文化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基础上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果产生了三种文化心态:或为复古主义,或为全盘西化,或为折衷主义。实际上这三种思想都存在着虚幻性,都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应该立足于近现代中国人的创造,离开中国人的现实环境、生存状况、心理基础侈谈文化显然是不真实的。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于应有为自己文化命名的勇气和胆量,而不仅仅跟在西方人后面捡别人丢弃的理论,或拾老祖宗的牙慧,中国知识分子要说自己要说的话,“因为我我说的是自己要说的话,所以,我要努力说几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即使不能全是,至少也有一句、两句。”

谈及鲁迅对自己的影响,王富仁说:“只有理解才能共鸣、才能接受、才能同情。先生把整个民族发展当作文化来思考,我理解先生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改造国民性、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求得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和发展。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以及追求独立自主的文化性格对我影响很大,因此,加强彼此间的理解,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为己任,这是我最根本的人生追求,也是我进行学术研究时注人的思考。”

本着这种责任感,王先生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

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指出了影响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化发展的几个现实因素,他认为这些现实因素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将有一个大发展。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王先生还担任着教学工作,他从1992年开始带博士生,是我国“文革”后毕业的文科研究生中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目前他的学生有十几个,其中一半是国外的。三尺讲台上,王先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尽情地倾吐给这些年轻学子,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新的中国知识分子。

(选自1997年《大众日报》周末版)

白霜冷月凝秋菊

——略述我的创作历程

韩英珊

去年,岁至花甲,写了一首《题花甲小照》的诗,旨在对半个世纪的生活做个自我评析。全诗曰:“六十只白鸽子,以心房作巢,/羽光凝成白太阳。/他们不系鸽哨,/飞翔时没有声音。/六十朵白雪莲,在心房里扎根,/花瓣是簇簇圣洁。/它们盛开在雪线上,清高中有寂寞荒寒。/一颗心其实是粒种子,/在东方的泥土里酷恋,/任行者的脚印结成坚硬的地壳。/心在封埋中抽芽忏悔体味,/顶开大地又迎一度花甲。”应邀写这篇杂忆,仍在花甲岁上,回首文学创作历程,“甘苦寸心知”,其苦涩暗暗,其欢乐融融,其忧患深深。天赋所限,业绩平平,性格使然,不会随波逐流,媚上媚俗,坚持自己的声音,坚守自己的阵地,无缘大红大紫,活脱一簇白霜冷月凝化的秋菊。此乃2002年深秋,恰是赏菊时,就拟了这样一个题目。

我1941年冬生于高唐城北韩庄(原韩寨乡)。孩提时代就喜欢以筷子作鼓槌敲敲打打。上学前就迷恋乡镇“赶会”时的二黄、梆子和评剧,热于同小朋友“结社搭班”学唱戏,黑灰抹脸,花瓣贴额,秫秸作枪,学着舞台步尽兴打斗。我父亲识些字,能写对联画花鸟。母亲目不识丁,却剪一手好窗花。我的幼年与艺术结缘,受父母潜移默

化的影响。父亲年轻时学徒经商，大灾年曾在高唐钟楼西四棱子碑处卖饼子，解放初又在高唐康市街开“义昶茶庄”。我也去城里小住过，是高唐的钟楼市声激发了我萌动的文学意识，这是我近年体会反思领略出来的。十岁上下，便精熟了高跷艺道，一位老爷爷为我特意打制了一副“拐子”。我是高跷队年龄最小的，却能舞姿新颖、劈叉腾翻。我还是村里公认的鼓手，而且无师自通，只要我打起鼓来，锣鼓相随，长长一列高跷便龙腾虎跃。上小学时，村公所给置办了军乐器和腰鼓，我自然是鼓手兼号手。还自己摸索学会了京胡，我还参加了小学的文艺演出，排演过《春花改嫁》、《柳树井》、《罗汉钱》。

1953年，我考入谷官屯完小，三个月后转到范庄完小上学。当年我偶得古版节本《金瓶梅》一套两册，我表兄在清平师范校门口也巧购到手抄本《金瓶梅》（洁本）一部。两部书由表兄严加深藏，因是禁书，表兄与我说定，对外均不言藏有这古董宝贝。我村有一位写新诗的文学才子叫韩英廉，以一首《大黑骡》成名。当时他在德州所辖桑园镇教小学，后来调回高唐任教，继而做《高唐县报》和县广播站的编辑。他的气质、学问，最先给了我文学的熏陶。我从《青枝绿叶》而知神童作家刘绍棠；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知女作家丁玲；从《唱一唱农村》而知少年民歌手何理……。我临摹齐白石的画贴满自家屋壁，我用九宫格放大绘画毛泽东、朱德伟人像挂于正堂。我很得益于文学的滋养，1954年春节编写张贴一副春联在院门上，上联是“火纸烧尽华盛顿”，下联是“鞭炮召来宇宙

春”。少年得意，时运的确顺当，很快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和校军乐队队长，还学会了弹月琴、画报头。以日记形式写了一首诗，得到班主任刘良老师的重视，选抄壁报，我成为他的爱徒。我创作激情高涨，就在课余时间写长篇小说（实际是中篇小说的规模），虚构抗日英雄故事。写完后誊抄装订成“书”，书名叫《什么是光荣》，自己用蜡笔作插图，设计了水彩封面。这部“书”于当年“六一”儿童节，寄给了正与我互通书信的志愿军钢字信箱的蒋维岐、伍文举叔叔了。两位志愿军军官回信赞扬说，我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学校开大会，校长表扬我，一时名声在外。“七一”党的生日，我加入了青年团。由于我酷爱文学，竟把学业荒废了，直接的惩罚便是1955年考初级中学名落孙山。

这次受挫，对我这个得意少年的精神创伤之大可想而知。现在回顾思量，实是一件好事。挫折对我心理素质的养成，对我文学信念的促成，都是最有益的。1955年平生第一次离开高唐地面，与几个同学一起到济南应试。我们都报考了第十中学，考场设在白鸟山车站旁的一所小学里，火车鸣叫，思想难集中，迷茫如在梦中，没有考好，倒买了一摞《水浒》连环画抱回家来。步行八十华里，从禹城火车站走回高唐家中，双脚磨出了血泡。没有录取，就暗中发奋。在农业社里当统计员，在村里当民校教员，还要参加田间劳动，锄草灭虫、担水抗旱……，非常辛苦，老是盼着下雨阴天，好赢得时间复习功课，第二年再考。我不放松在思想和文学上的进取，当年订了《青年

报》(上海)、《北京文艺》、《少年文艺》、《文艺学习》、《河北文艺》、《辽宁文艺》这些报刊。在田里流汗做农活,在夜里躲在煤油灯下读书写诗写散文。我写成了游记散文集《愉快的七天》,记述去济南应考的见闻。我创作了民歌集《朝霞》和《鲁西北平原歌》。那一年在梁村镇的小书铺里,买到了刘绍棠的小长篇《运河的桨声》,心神全陶醉在这部小说的清新甜蜜中。1956年春天,我被派往聊城农校学习使用新式农具,面对校外护城河青翠的芦苇,我的心思只有文学,只有刘绍棠笔下的运河景象,加之在聊城书店又刚买到刘绍棠的一部新长篇《夏天》,白天黑夜读赏,致使领队干部批评我不安心“农业”。刘绍棠的小说使我对文学爱到了近似疯狂的状态。

1956年夏天,我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了高唐南镇中学,步行六十华里报到入学,我被选为班主席。班主任张月如也爱文学,我们是师生,也是好朋友。教文学课的李芳辰老师同时戴两副花镜,他对我的作文评价很高,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里说,“你很有前途”。自此,我从没忘记这位老慈翁的形象,没忘记那句由衷的赞语。但我从小不是生在书香门第,小学读得也不扎实,对汉语文字读音和书写没打下坚实的基础,害得我大半辈子也离不开字典。作文时常出现错别字,五记分制,文章虽一片叫好,却是很少得五分,都让错白字给扣了。后来,到了读高中时,竟然还在全班师生面前出丑,将“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的“罢”字,读成“摆”字。哄堂大笑,把老师笑得差点笑歪了鼻子,扭断了腰。初中

阶段我一直任班主席，全盘领导班里的工作，策划集体活动，有声有色，颇有权威。自己的功课以文学、汉语付出的精力最多，全部功课连续几个学期都是全五分。可是我也有虚荣心发作的时候，有一次抽查测验中，我曾斜眼扫了一下同桌的答案，可以说没得丝毫实惠，即被老师捉住了。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一次作弊。我这班主席当天在全班师生面前做检讨。学校的军乐队我要管理；乐器组的训练我要组织；班里的汇演节目我要策划；演出的布景我要绘制。1958年我的《姐姐为啥笑》等数首新诗在《高唐县报》发表，自己便有些骄傲气盛。有一次我接到了报社一封很长的信，批评我不正确的创作态度，指出成名成家思想和骄傲自满如何危害青年等。这封信使我猛醒，是副苦口良药，只是不清楚写信的编辑是谁。后来，我的儿歌在《大众日报》发表。1958年大跃进，我组织同学们写新民歌，并用一个不眠之夜编刻油印了《跃进新民歌》，全班同学人手一册。我还主办主编了油印校报《南中周报》。接着是深翻土地、炼钢、修水库，顾不得文学了。1959年，我被保送到高唐中学高中部。

读高中时，我任学生会秘书兼文娱部部长，一度住宿学生会办公室。那时我坚持每天一篇日记，一首诗，一幅铅笔画，来磨练自己的毅力。我认识到作文与人品的关系，把参加社会活动和自身行为修养也看成是一种文学修养，是创作准备。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我能独身跑到校外东西公路的桥下，去疏通堵塞的水流，冻得浑身抖索，无人知晓；灾荒年粒米如金，伙房的工人老大哥精心多找

给我窝窝票，我多次如数退还；学校生产自救，我带领一个运输队运地瓜，拉着地排车往返高唐至禹城的公路上，瘦得皮包骨头、两眼鼓突，形影如鬼；为上二级高中毕业班总复习，我几夜不眠在钢板上赶刻蜡纸，油印复习提纲；周末放学，我从来是日落以后独身走二十五里夜路，不怕鬼怪恶人；我一个人领校文工团几十人，前往聊城参加中学生文艺汇演，承担全部组织工作；在农村劳动，到自留地锄草，左邻右舍、寡妇病夫的地，我都帮着锄完。类似这些事情，通常说的是“做无名英雄”，在读高中那两年，我确实做了很多。我心中清楚：我是训练自己做人，是为了将来写作的质地，立志搞文学的人要有好人品。要说读书，高中两年我只死啃一部《红楼梦》，《林海雪原》之类走红小说我并没入眼。要说创作，我曾与郑宽亭老师合作过一部诗剧，可惜没能排演。那时社会活动很多，功课荒废是全校性的，我应征入伍后，我的同学又补读了一年，实际是念了四年高中。

在我 1961 年秋季当兵离开故乡高唐之前，一直启用“韩英山”的名字。以后发表作品的量大起来，使用了数十个笔名，如桑森、萩棠、红歌、寒剑、老晗、子陶、夏川桑、木兰舟、高唐人、寒剑之、菡翁、英珊、赤皇吟等，也以此律己，淡薄名利。1991 年中国作家协会为会员重新换证时，才正式以“赤皇吟·菡翁英珊”为固定笔名，此笔名是我文学理想的全部意象。我当兵是在济南市东郊七里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独立通信团，在军营里，我被誉为这批学生兵的“八才子”之一。我依旧保留着在学校养成的勤

奋勤劳的好作风好习惯,严己利人,很快成为战友们的知音。我们是架线兵,每日出去爬山越野,一次作业下来,汗珠如雨,全身湿个净透。我出席了部队共青团代表大会,选人主席团。我创作了《架线兵之歌》,发表在《大众日报》上。部队首长见我有文才,便调我到团电影组。在这期间,我读遍了团俱乐部图书馆里的全部文学书籍,尤其是鲁迅先生的单行本作品,都一一细读。我为团演出队写过说唱快板,创作过诗与画《放映图》在济南军区俱乐部的画廊展出。根据战友在大明湖抢救落水儿童的事迹,创作了长诗《杨锦之歌》。那时,我表兄在济南重型机械厂黄台工地医务室当医生,他偏爱《金瓶梅》,便将那两件宝贝带在身边暗中赏读。表嫂来时,我必去他那里看望,也一览自己所得那套古版《金瓶梅》的丰采。不幸一次失火,医务室烧了个净光,只表兄幸免于难。我们的《金瓶梅》皆命归黄泉,变作灰烬。为此,我们俩绞心剜肉般痛苦叹息。1964年我调入济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我不能上大学,想通过自修达到大学水平。于是请高唐中学的郑宽亭老师,将他学完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材,全部转给我捧读。郑老师提着一大捆书并十四大本我的日记,亲自送到济南。这套教材我精心学过,至今保留着。我并不聪明,只有一点点文学的灵气,又不愿放弃,所以就笨鸟先飞,靠勤奋来弥补。对于我面临的生活,接受的各项任务,我都认真对待,有一种责任感、崇高感。这些生活的足迹如服装的针脚,都与我追求的文学创作有联系,不管我是否创作了作品,我总觉得自己是生活在文学

里。几十年来,文学如同我的爱侣,任何风浪挫折都不曾使我产生过告别文学的念头。我一直默念着一句话“为了文学,时刻准备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加入了共产党,在表决大会上,有的党员批评我拥有一大厚本精装《汉语诗律学》。我知批评者之含义,我说:“我从1957年就开始学《毛泽东选集》,汉语诗律是学问,党员就不能有学问吗?这些年我一直很苦恼,自己是真心照党员的标准锻炼的。本来是农民子弟,一腔农民感情,爹生娘养,只是眉眼长得像知识分子,就老觉得我小资尾巴割不完。”在入党会上这么说话,我也不怕表决时有人投反对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成了军官,以李文忠的事迹创作了大型组诗《赣江滔滔》,当时出版社已砸烂,出书是不可能了,但所在单位,还是鼓噪一时。

1968年,我随新组建的陆军五师开赴新疆,先驻昌吉市,在《昌吉报》发表评论和诗歌。后驻天山深处,民族风情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学传统,对我影响很大。翌年调入自治区革委,任包尔汉专案组副组长。包尔汉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通过自修精通了汉语、俄语、德语,是位社会贤达、维吾尔族的代表人物。他高龄坐牢,“文革”期间一直被关押在暗室里。我审理他的案子百感交集,对他很同情,随着审理的进展,我与这位“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曾给我讲《红楼梦》、《金瓶梅》的优长。

1973年,未待包尔汉专案结案,我便调回天山深处的军营工作。为连队演唱组编写整台节目,创作了古诗与民歌风味的长诗《七月红霞天》,送《天山文艺》杂志,未待

发表便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人中传抄。在野营拉练中的天山雪路、山洞、宿营地，我在烛光下坐着背包写田园牧歌式的诗句。在营房里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用在写诗上，一束束短诗陆续在《昌吉报》发表。几年中我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再三精选，编成一部抒情诗集《热瓦甫琴歌》。《天山文艺》编辑部将这部集子推荐给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我调离新疆前夕已决定出版发行。这是“文革”结束后新疆诗人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这部诗集扭转了我的命运，我唱着“热瓦甫琴歌”进了北京，迈进专业军旅作家的行列。《热瓦甫琴歌》是我的一个界碑，是对我二十余年业余创作生涯的总体肯定。

“文革”结束后，包尔汉在北京复出，我发表散文庆贺。他邀我代其撰写了长篇纪实《新疆五十年》，由文史出版社出版。我与这位民族老人结成忘年交，1989年他在京仙逝，我正在海南岛策划创办《海南旅游报》，未赶上他的追悼会。他的遗体用飞机护送回新疆阿克苏故乡厚葬。

1977年我调入国防科委（后改为“国防科工委”，今又更为“解放军总装备部”）文艺创作室。这个系统是搞国防尖端武器的，航天核爆基地、国防工业战线，是我们讴歌的对象。我走遍了有关省区的穷山恶水之地和富丽繁华之乡，频频结识战士与科学家。我与他人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火箭从这里起飞》，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开拍在即，忽因他人干涉而中途下马夭折。此后，我陆续在全国近百家报刊发表散文和诗作，部分作品选进《青年诗选》

和《当代短诗选》并获诗奖。我有机会结识了追慕已久的作家刘绍棠，且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他签名赠我的作品基本上能汇成《刘绍棠全集》。我的诗集《打阳伞的天使》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时，刘绍棠别开生面地写了一篇诗序。这本国内第一部反映国防科技题材的诗集当年被诗论家张同吾做了评述。我还结识了诗坛泰斗艾青，多次促膝谈诗论文，成为艾家常客。他赠我一幅墨宝：“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艾青逝世的追悼会上，我在诗圣的遗体前和左右，共行九个深鞠躬大礼。刘绍棠和艾青介绍我于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艾青说我是他第一个介绍入会的诗人。

1980年，在我写完《新疆五十年》后，有幸读到盼望多年的全本《金瓶梅词话》，便想完成一个圣洁的夙愿——将《金瓶梅词话》缩写成《金瓶梅故事》，作为第三种版本在中华大地传播，想使其成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那样的传世名著。精短、洁净、流畅、自成一格的《金瓶梅故事》经我的辛苦经营，终在1983年完成，在艺术特色上明显有我自己的追求。我以为自己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为弘扬国粹做了一件开缩写《金瓶梅》先河的事，也是值得褒奖的事。我觉得自己在《金瓶梅》传播史上，创作了一部有开拓意义的独立的文学版本，是一部可望流传的作品。先是陕西《剑魂》杂志全文发表，发行十万册；1988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金瓶梅故事》的增订本，发行三十万册。但是，两次出版发行，《金瓶梅故事》遍及大江南北之后，却遭到查禁，自居卫道者不顾及事实，把一

部洁白如玉、透明似水的《金瓶梅故事》视为洪水猛兽，我个人当然也遭受了很大的不幸。一边是文人百姓的喝采；一边是文官书阁的迫害。然而《金瓶梅故事》自两次出版发行四十万册之后，全国轰动，盗版蜂起，至今最少有五种版本在民间传播，发行量之大，无法统计。我曾写过一部十五万字的纪实文学《苍凉梅园——我与“金瓶梅”》，详细记载了金瓶梅文案的全过程，及我几十年间围绕《金瓶梅》发生的传奇故事。

1983年成立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我被选为文学部部长，被命为《神剑》文艺杂志副主编。编务之余，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潘金莲故事》（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时更名“野史”），五十万字的长篇重新塑造多元性格的潘金莲及众多女子的人生大悲剧。小说出版后，在山东发现了两种盗版本，这说明雅俗共赏的小说读者很多。在遭遇盗版中，我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中国枪炮大师传奇——紫丹烟野史》（又名《雪心》），发表在《太行山》杂志上。马不停蹄，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狼荒》。出版后读者称其为“诗史般的英雄传奇”、“雅的俗文学，俗的雅文学。”经我增订，又在民族出版社再版。一鼓作气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共计百余万言，这是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欣慰的事。我写的短篇小说、短诗、随笔、文论等，分别结集为《孟子采古》、《沂蒙故事》、《太阳女郎》、《西黄寺牧歌》、《空谷兰》、《放逐点梅人》、《月牙河彩薇》、《潜龙淬语——金瓶梅幽思录》、《情潮红豆雨》。

1991年，多年来在创作上给过我无私关照的妻子患

了癌症,住院手术,术后化疗,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我陪在她身边护理,抛家舍子也一年多。那年,儿女自理生活,儿子结了婚,女儿考进了清华大学。妻子病情好转后,我即到西安与文友创建“秦凰创编书院”,并任首届总编。还在京执教《人民文学》作家函授班,写了评析文字数十万言。我先后还到烟台、大连等地民营企业体验生活。在《齐鲁晚报》开设“萧墅小品”专栏。在广东《陶城报》开设随笔专栏。1997年,我与妻子合作,到青岛双星集团实地采访三个月,写成长篇特写《汪海与双星的故事》三十万言书稿。书尚未出版,未经我们作者同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单方使用了我们的作品达二十万言,在文艺联播节目播了两个月,不署名不付酬。我们起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青岛双星集团联合侵犯我们的著作权。官司打了近三年,三进法庭,连环诉讼打乱仗,尽管曲折复杂,我们证据有力,胜诉在望。

我从少年时代就理想着当作家,半个世纪里处理任何问题,都是围绕着文学之梦考虑的;也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多种磨砺,自己的行为、品德,都是文学创作质地的有机部分;是顺利,是曲折,是喜剧,是悲剧,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我选择了文学,为它的任何付出都不是多余的,不容追悔的。然而,我真做了专业作家后,才深深懂得,要做一个真正的作家,俯视社会万象而独发自由思考之音,那是非常寂寞痛苦的,正如白霜冷月里的菊花。有成就的作家大都是悲剧人生,所以我不轻易劝年轻人盲目地走进文学的殿堂。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一万余页日

记,数百万字,便是自己生活历程的“自赏作品”,记录了我对文学这座殿堂悲剧性和诗性的认识与感悟。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与高唐籍作家李怀仁先生的文学通信,我自信这种以纸笔代言的文学清谈,已是很少见了,我们从1975年始,近三十年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而且清一色是言论文学创作,我们将这两地飞鸿,视为良师益友。进入新世纪后,市场经济时代万象更新,世态观念变化很大,新辉煌也存在新危机。作家的光环渐渐暗了,象刘绍棠这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作家,鼎盛期的作品也清新平淡着少人喝采了。我只能写作,不会经商,写作不能糊口,又舍不得“金盆洗手”,决意用零星时间写《皋棠小诗》、《菡妆小品》、《瓶尔小草》三个系列;整块时间写也许生前难以出版的多卷长篇小说。

写到这里,已超出了编者约定的篇幅。再说几句做为结束语吧:高唐境内的志士才人多着呢,怀才不遇的人也多。我的成长,多亏了高唐乡土文明的陶冶,我的灵魂里至今结晶着乡音乡情,我永远爱我生身之地的故乡。我是一个非常平凡平淡又平常的人,才思有一点,勤奋有一些,老天给我机遇的同时,也给我许多不幸,得到了多少也失掉了多少,到头来平平淡淡,不盈不亏,无怨无悔。蓝天下的好人们都是平等的,要谈历程,谁都可以写出一篇来。

记于京师高唐梅莞斋

商海弄潮人

——记济南国际贸易大厦副总经理张廷禄

文史科整理

济南国际贸易大厦副总经理张廷禄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却依然精力充沛,办事利落,红润的脸上,一双热情的眼睛里透露着坦诚和智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全国各地乡镇企业纷纷招聘人才,从不甘寂寞的张廷禄大胆离开令人羡慕的政府机关,应聘来到了山东著名乡镇企业清河集团,在其所属的济南国际贸易大厦任职。十几年过去了,当时被聘的一百四十余人,现在坚持下来的只有他一人,他在这里如鱼得水,商业潜质最大限度地迸发出来,成为国贸大厦的智囊人物,他是商业战线优秀管理经营人才。他在国贸大厦先后担任工会主席、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等职,同时兼任农业部乡镇企业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华商时报》山东新闻专题部主任记者、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他曾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当代优秀管理成果奖、山东青年五四奖章及山东省优秀工会干部、济南市商业管理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941年12月张廷禄生于高唐县尹集镇老王寨村,

1952年随经商的父亲到济南求学,在学校他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60年他参加工作,第一站是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1962年,我国东南沿海形势紧张,同年8月征兵活动开始,已是区团委书记的他,在积极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军的同时,自己率先报名入伍。那年他已二十二岁,部队按地方干部参军的规定,直接授予他上等兵军衔,在部队他先后任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军人俱乐部主任等职,他以身作则,处处带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5年张廷禄因病复员,本应回政府工作的他为了锻炼自己,主动要求到已停产半年的济南橡胶二厂工作,经过几个月努力使橡胶二厂起死回生,产品产量逐月上升,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断提高,成为先进企业。

1966年,张廷禄调到济南半导体三厂任该厂筹建组组长,厂子建成投产后,他干过厂办主任、车间主任、销售部经理等。当时半导体厂从事军工和民用电子器件的生产经营,由于电子是新兴产业,他边干边学,不断给自己“充电”,晚上参加山工大电子系培训班,还到北京几个部属厂家实习,很快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术。

1985年,张廷禄被调回济南市槐荫区政府工作,先后任区政府北大办事处经计委主任、生产服务公司总经理、区志办编辑等职。在他的领导下,仅一年时间生产服务公司所属三十多家企业产值利润均翻了一番,职工工资福利成倍增长。1987年,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学习周刊》长篇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他还和区志办的同志们一起

完成了全区第一部三十万字的《年鉴》编纂任务。

在许多人都争着进政府机关端“铁饭碗”，寻找安定职业，追求舒适的生活环境时，张廷禄却主动下海经商，1989年应聘到正在筹建的济南国际贸易大厦担任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国贸大厦的性质是乡镇企业，总经理和另一名副总经理都是当地农民，只有小学没毕业的文化程度，张廷禄算是领导班子中学历职称最高、阅历最丰富的人。他在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着厚重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商厦的智囊人物。他为筹备国贸大厦开业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后来企业内部管理、对外宣传、与外界联系及出台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他是主要干将和参谋。他认为要使商厦有活力应抓三个关键，一是管理，二是人才，三是搞活动。

在他的建议下，商厦设一室、一部、两处、十五个商部，完善了管理机制。他亲手起草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征集了“企业徽”，他创作的“企业歌”荣获全国优秀企业歌曲奖，磁带在全国发行。在商厦管理上他抓三个方面：一是环境、二是商品、三是服务，他提出以文兴商、以情取胜、以德育人、开展魅力服务的商业文化活动，以优美的环境、名优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争取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对待员工上，他认为“人是企业取胜之本”，除平时对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开会上课外，每年举办两期培训班，他给员工授课，还聘请老师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为了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经

常组织员工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和外出旅游活动，每天组织员工做广播体操，每年全市职工广播体操比赛，商厦都荣获团体一等奖。他要求自己在员工有事时“五必到”：即员工婚、丧、病、事、生日五件事上必到场，帮助员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使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企业生机勃勃、红红火火。

他说生命在于运动，企业在于活动。为此他每年都要精心策划，开展各种宣传促销活动。使商厦每季、每月、每周活动不断。他把省电台请来，在商厦搞直播室，请报社在商厦建工作站，请消协在商厦建立监督站，还请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在此召开研讨会，省市消协连续四年在商厦举办山东省大型3·15消费咨询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商厦客源络绎不绝，营业额天天上升，使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充分发挥了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贸大厦经营十余年利税达三亿多元。1992年，国贸大厦以年营业额两亿元的成绩进入“中国百强名店”的行列，以后连续三年被国家外贸部和国家统计局列入“中国百强名店”，居全国乡镇企业之首，国贸大厦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民创办的大型商厦，被商界名流们称为“商海明珠”。江泽民总书记、李瑞环主席、田纪云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此视察指导工作，一些国家的元首、财团、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也到国贸参观。

在商业竞争激烈的今天，为了让国贸大厦在竞争激烈的省城济南取得立足之地，张廷禄审时度势，认真观察分析，他认为在大环境上济南不是以旅游为主的都市，市

场容量有限；在小环境上，国贸大厦地处济南市区北部边缘，客流较少。其次，济南其它商业企业多为老字号，口碑较好，市民购物心理存在一定的传统思维定式。如果国贸按部就班走老路，绝没有优势可言。为此，张廷禄及时向管理层提出转变经营机制，对外出租营业场地的建议。按照他的建议，国贸大厦一年一个台阶，不断发展壮大。这招人弃我取的决策，为国贸争取到了最大的生存空间，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不久，商厦投资扩建了二期工程，面对几千平方米的大厅，张廷禄经过周密细致的市场分析，建议总经理尝试着经营家具，因为当时济南还没有一处大规模的家具市场。这次，他又看准了，国贸在短短的一年内，家具市场迅速蜚声泉城。在闯出这条新路后，国贸又先后兴建了三家大市场。随着国贸大厦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现在营业面积已达三万平方米，经营了六十大类六万多个品种的商品，成为“全国商业信誉企业”、“山东省利税大户先进单位”、“山东省‘双信’先进单位”，并荣获“全国经营之光杯特等金奖”。

就这样，张廷禄靠自己的智慧和真诚，帮助国贸大厦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他的先进事迹先后被《山东工人报》、《山东工商报》、《山东经济报》、《济南日报》及《当代公仆》、《当代共产党人》等报刊报道。

几十年来，张廷禄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变化，他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愿尽最大能力为家乡人民做点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家乡春灌缺少柴油，他托人帮忙采购；

缺煤,他帮助购买;建学校需要油漆,他想法解决;老乡来济南治病缺钱他帮助筹措……改革开放后,家乡镇政府常去人找他咨询项目、销售农产品等,他都抽空去联系。有一年,北京一个科研所准备与尹集镇合作搞燃气罐项目,镇领导请他参谋,征求他的意见,他通过考察发现燃气用的甲醇有毒有害,国家禁用,建议镇领导取消该项目。还有一年,尹集镇准备上液碱项目,他建议说:“生产液碱虽然有利可图,但废液流入农田,损害耕地,使庄稼无法再生长,从长远看,后患无穷,不应搞”。家乡的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该项目。尹集镇蔬菜大棚发展起来后,他又帮着找蔬菜销路。在济南的高唐人聚会时,他提了一个建议:所有在济工作的高唐人都要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贡献力量。他关心家乡建设,盼望家乡人民富裕的心情溢于言表。

张廷禄说:在外国人面前我是中国人,在外省人面前我是山东人,在省市人面前我是高唐人,要树立高唐人的形象,为高唐人争光。

三十年飞行蓝天路

姚月福

我是1968年参军,1969年走进了空军第九航空学校,1971年毕业进入试飞队伍的。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一线从事科研试飞。在运五飞机上我搞过航测,进行过空中照相、投放飞机模型,搞过飞播,试飞过航电仪、航磁仪的科研任务,为我国物探事业填补了空白。在运七飞机系列我试飞过运七选装型、运七军用型、运七200B、运七领航轰炸教练机、运七200A和新舟60等多种型号。除祖国的台湾、西藏外,我飞遍了祖国的领空,为飞高原我去过海拔3000米的格尔木,为飞草地我去过河南的许昌,为飞高寒我去过祖国的北大门海拉尔,为飞高温我去过云南昆明,为飞高难度危险科目我去过合肥、西宁、哈尔滨,为运七200A获得“绿卡”(适航证),我飞过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试飞领域我出色地完成了WJ5E发动机的定型试飞,873航空电子综合系统样机研制试飞,国产运七军用型的性能试飞,运七200B的操稳试飞,运七领航轰炸教练机的首飞,运七200A的首飞及定型试飞和运七系列各种型号的飞机出厂试飞,进行了多次飞机的最大包线、最小包线、飞机失速和不可用燃油等危险科目的试飞。我既是试飞员又是指挥员,在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安全飞行四千多小时,七

千六百多架次,完成重大科研项目四十多项,是试飞团特级试飞员,荣立过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五次,三等功三次,历任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是试飞团第二届和第三届党委委员、试飞团纪委委员。三十年飞行蓝天路,风风雨雨,为中国航空工业和我军航空装备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和科研人员的称赞。

能有今天,我首先得感谢家乡和父老乡亲的养育,感谢部队的培养。

一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948年11月出生于高唐县赵寨子乡姜家铺村,家乡虽不富裕,但很美丽,在那里留下了我儿时的欢歌笑语,记下了我的学生生活和成长历程。十九岁那年,我穿上绿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陆军战士。1969年10月,我来到空军第九航空学校,开始迈出飞向蓝天的第一步。

1971年7月28日,我经过两年航校学习锻炼,获得放单飞的资格,被分到了试飞基地(试飞团前身)。在远离家乡的大西北,我一干就是三十二年。

试飞员与飞行员不同,每次试飞后都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在空中做了什么动作,动作的内容是什么?二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并能生动地把情况描述出来;三是你对这些现象的初步分析和改进意见。德国科学家奥托·李林格尔曾说过:“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出来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是艰难无比”。任何一架新型飞机都需要第一个人去尝试,这种尝试既是以生命为赌

注的一种冒险,又是一种无畏的最高境界,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我清楚地记得驾驶运五飞机为地质部试飞航电仪、航磁仪的科研任务时的情景。我试飞的不是一架普通的运五飞机,它的两边机翼尖上装了两个直径一米多圆型铁制探头,经过多次试飞完成了任务。在1975年底又由地面试飞改为水上试飞,在最低高度五十米的情况下,飞机载着两个大探头离水面很近,气流颠簸。稍有疏忽,连命都难保。我把握每一个动作,关注每一个数据,全神贯注地集中精力操作。

“飞机各项性能数据正常,可以恢复正常高度。”指挥塔指挥。

“明白。”我回答。拉杆、加油门,飞机一跃而起,成功了。此项航电仪、航磁仪定型试飞荣获国家科技成果三等奖,填补了我国航空探矿的空白。

任务完成了,成功的喜悦再也掩盖不住内心的痛苦。几天前我还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之中,但为了飞行,我顾不得妻子生孩子,顾不得刚刚出生的儿子得了肺炎,孩子夭折了。

如果说飞行高度五十米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飞行高度只有十米,是让每一位试飞员都望而生畏的,我想再接受一次挑战。这是一项验证歼击机导弹上的261#—265#无线电高度表的任务,是一项试飞水间噪音及波浪对无线电高度表影响的课题,它要求最低飞行高度十米。“这么低的飞行高度我们从来没有飞过,也是不允许的。”

开始团领导考虑这项任务难度大,危险大,考虑到试飞行员的安全迟迟没有接受。但由于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最后还是接受下来了。我接受了任务,与我并肩作战的还是运五飞机。这次飞行是在太湖光福机场进行的,做好一切准备后,我轻快地登上飞机,飞上了蓝天。

当得到指挥台“可以下降,按计划实施”的允许后,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一米一米地下降到了要求的高度。飞机下降到十米还算容易,但要保持住这个高度就难了,在水上飞超低空,很容易给飞行员造成海天一色的错觉,稍有偏差,飞机就会一头扎进湖水中。我终于征服了危险和困难,在保持十米的飞行高度下,获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

二

自从航校毕业后,我一直飞运五,运五向来被认为是最不起眼的小飞机,但我驾驶着她照样创造了无数奇迹和辉煌。1986年初,由于试飞的需要,要求飞行员飞多个机种,又由于淘汰一批运五,面临改装。当时改装的对象有“呼唤”和“运七”两种型号的飞机。运七是国产飞机,而呼唤是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先进,和国产运七相比机体小、灵活轻便,又可以经常出去执行任务,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就当时而言,飞行员都希望能改飞呼唤,这样问题就来了,谁来改运七?我没有想那么多,选择了运七。

“瞧你又当垫背的了不是,多好的机会。”好多战友为我抱怨。

“啥不都得要人干嘛,只要能飞,啥都行。”我说。说

改就改,然而改装也并不容易,在接受一件全新事物的同时,还要分出心来去飞运五的部分科研项目。我在这种运七和运五混飞的高强度工作下保证了运七合格改装和运五科研任务的如期完成。

1990年,随着国产运七飞机研制速度的加快,国产运输机在涡轮螺旋桨的基础上又进行了WJ5E发动机的定型试飞。为考核验证发动机的性能,根据试飞大纲要求要飞高温、高原、草地和高寒等上百个飞行科目。

1992年七八月份,阎良机场烈日当空,天热得出奇,让人喘不过气来,大气环境温度 38°C ,水泥跑道上 58.5°C ,铝合金蒙皮机翼表面为 62°C ,密封驾驶舱最高温度 65°C 。环境温度还在不断上升, 38°C 、 39°C 、 40°C ,指挥员发出可飞信号,机组人员迅速登上飞机。此时,滚滚的热浪潮我们扑来,整个驾驶舱中弥漫着呛人的橡胶味,我们试飞员迅速、利索地开车、滑行、对准跑道……。战鹰也象试飞员一挥,经受着酷暑的考验,离开地面,向上攀爬,一千米、二千米……。

夏季的天气象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我们既要避开空中走廊,还要不时改变航向,躲开一块块高大粗壮的怒积云,耳机里不断传来附近雷雨区“咔咔”的响声,我们用机上雷达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天气情况。午后对流发展得很快。我们选择了一块相对平静的空域,飞机在四千米高度上改平。这时我们每个人的心情最不平静,因为马上要进行的是本次高温考核试飞中最艰巨也是风险最大的科目,就是国产WJ5E发动机空中停车再启动。在这时,

我作为机长,心里默默地想:一定成功!并鼓励机组人员树立信心,鼓足勇气。大家仔细检查了各自的电门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那个鲜红的顺桨按钮。高度四千米,表速300公里/小时,我果断地发出命令:“右发停车”,空中机械师按下右发顺桨按钮,只听“轰”的一声桨叶懒洋洋地转动着,飞机稍微摆了下头,继续向前稳稳地飞去。万一造成风车状态产生反作用将使飞机失去控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国家上千万元的投资,多少科研人员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十几分钟后,机械师做好再启动的准备,当我发出口令:“启动右发”,机械师按下按钮,右发发出“嗡嗡”的声音,转速增加很快,“轰”的一声闷响,发动机转速正常,右发启动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是机组人员同全体科研人员抢高温、战酷暑,团结协作向祖国和人民交上的一份合格答卷。

当年十月份,我带领机组人员去格尔木飞高原,格尔木海拔三千多米。当我和机组人员及科研人员在格尔木机场落地后,突然感到心脏象是坠了一块铅,喘不上气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高原反应。因内地人刚去不适应气候变化,别说工作就是在平地走出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喘气。高原、缺氧、风大,环境又差,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我们机组人员不仅各自按时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机场还忙着帮机务人员和科研人员做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为早日完成这次高原试飞任务都忘我工作着。

这次高原试飞主要是验证 WJ5F 发动机在运七军用型飞机上高原机场起飞、降落的滑跑距离,飞机从十五米

高度着陆点到飞机停住的距离,验证飞机最大起飞重量的滑跑距离,确定飞机在高原起飞、降落的安全系数。

我们历时二十多天,克服了高原气候的不适,圆满地完成了试飞任务。这一年我荣获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运七军用型设计定型试飞二等功。

1992年12月28日,在关中阎良飞机城已是一派节日的喜庆气氛,人们正忙着采购年货迎接春节的来临。我将带队又一次外出执行任务,转场东北最冷的地方——海拉尔机场,完成WJ5E发动机高寒科目的定型试飞。这次转场飞行要对WJ5E飞机在 -38°C 以上环境进行地面、空中单发开、停车试验飞行。

此次试飞若耽误,部队装备新机就要晚一年,就象农民种庄稼一样,“你误地一时,地误你一年”。抢高寒就是抢时间。我们及时赶到了东北海拉尔机场。

没去过东北的,不知道那里冷的滋味,最低温度到零下 40°C 。提包、图囊在内地软软的,到了那里变得干巴脆,轻轻一折就断了。科研人员的领队朱总工程师从室内到室外工作,不经心地一摘眼镜鼻梁上掉了一块肉皮。我们机组人员一个个先后病倒了,要到市地方医院去看病、输液。此时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而此次试飞光空中停车就有十几次,由于事先未同有关部门协调好,加之科研人员对部队的一些规定不熟悉,飞行成了不可能。大家心里很着急,我作为带队,心里更急。为了抢三九严寒的理想天气,我们带着病,打着吊针多方联系、协调,上下奔波,总算在一个星期后飞起来了。

北国飞行,也真壮观,锦绣江山银装素裹,我们的飞机在内地飞行很少有拉烟现象,可在北国蔚蓝的天空,飞机时时能划出一道道的彩虹,另有一番情趣。可我哪有心思去欣赏这美景呢?我们心里清楚,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稍有闪失,就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因此我们进行了仔细周密的飞行准备和研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进行演练,对开车、停车的每一个开关、每一个动作反复模拟,眼到手到做到万无一失。说实话团领导派出了最强的技术骨干,我们在中、高空共进行了十次停车后再启动的试验,高空三千米停车在滑油温度 25°C 情况下启动,成功!高空六千米再停车,五分钟后滑油温度 25°C 再启动,失败!说明飞机不具备高空六千米启动性能。其中有两次因滑油温度太低启动失败,被迫做单发落地。

飞机飞升限时取得了超过科研人员预想的数据,飞机在爬升时也飞过了飞机的升限高度,没想到发动机还有剩余马力。

单发飞行,作为部队飞行员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更何况机场的管理人员。每次飞机场的救护车、消防车、医护人员、机场领导全都挤在塔台前,他们怕,心里没底呀!为进一步确保飞行安全,在有风险的情况下,我与机场指挥员签下了责任协议书。每次单发着陆成功,指挥员都紧张地擦擦头上的汗,激动地说:“你们真行!”

年关已近,部队训练飞行都停了,调度室接上级通知,还有一天就不能保障飞行了。四十多名在外执行任

务的地勤保障人员和科研人员怎么能在外过春节呢？经过动用单边带电台联系，飞机总算在年关前一天飞回驻地。

WJSE 发动机在运七军用型飞机上试飞了近四年，飞行了三万五千多小时，二百三十多架次，空中停车再启动达四十余次，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此我荣立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等功(1995年)。

三

873 航空电子综合系统技术样机研制试飞是 1993 年 5 月开始，于 1994 年 4 月完成了所有科目，并通过部级鉴定，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航空机载设备的研制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今后研制新一代航空电子综合系统奠定了技术基础。

873 航空电子综合系统技术试飞样机具备导航功能，可以对高速飞行目标进行拦截和格斗，具有对地面、海上目标实施攻击能力，适应单人操作。该系统是为多种任务服务的，每个任务具有特有的工作方式，多功能显示器上的显示符号和飞行指令不同，且传感器的工作状态也不同。为此要精心设计 POP(飞行员操作程序)使系统飞行各阶段的功能与状态要求，自顶向下逐级进入任务角色，所有分系统将按与任务有关的状态方式操作。在此次试飞中首先克服的是理论与语言的困难。由于航空电子综合系统目前在我国属首次试飞，对我们老同志来说，接受新事物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我认真学习理论，刻苦钻研技术，可以说在那一段时间里没

黑没白地工作学习,有时为弄懂一个环节、一个程序熬过通宵。

873 电子综合系统一共有九种画面,一个为空/空、空/地攻击阶段提示画面,另外八种为导航画面。为在试飞中防止错、忘动作的发生,我们编制了自己的检查程序单,为提前完成试飞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顺利地完成了试飞任务,荣立了航空工业总公司二等功(1994年)。

四

设计生产一个新的机种、机型,往往需要科研人员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就如同母亲十月怀胎,孕育新生命一样的艰辛。

1993年9月,我和其他两名试飞员承担了运七 200A 首次试飞任务。

运七 200A 型飞机是继运七选装型、运七 100 型、运七军机型、运七 200B 型之后的又一个新型号,属中短程支线客机,能运载六十名乘客及行李和一定数量的邮件。它的最大区别是运用了美国的全新电子设备和加拿大的动力装置,由五人制改为二人制,只有两名飞行员,取消了通信员、领航员、空中机械师。所以要求飞行员既要在飞行过程中观察飞机飞行动态,又要搞好座舱的资源管理,这就给飞行员加大了工作负荷。

这次新机的首飞,说其艰巨复杂,却只要在空中飞一个简单的起落、空跃;说其简单,它却是一个新的生命,还没有人飞过,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技术参数都是问号,每走一步都伴随着风险和失败。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进行了认真的理论学习和座舱实习,先后做了低、中、高速度的地面滑行、假起飞等,对着首飞任务书做了全面仔细的研究,做好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特情准备。

1993年12月26日,在中国飞机城宽大的机场上,我驾驶新型飞机滑行准备起飞,紧随左右的是整装待发的消防车、救护车,知道内情的人们都揪心地瞪着双眼,紧盯着飞机滑行、增速、离地,象一只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蓝天。

高度一百米、二百米、五百米、一千米,改平飞行,开始做平飞和小坡度转弯,一圈、二圈、三圈,飞机操纵性和稳定性良好,各类数据指示正常,发动机工作状态良好,我们首飞成功了。孕育成熟的生命诞生了!

1994年为使我国自行研制的运七新型机200A获得国际公认的“绿卡”,飞向世界,试飞团选派我和其他几名飞行员组成突击队,向中国运输机试飞的珠穆朗玛峰冲击。

1993年为新机定型试飞我首先飞行了溅水实验,也就是说,在跑道上利用水袋修了一个几十米的大水池,飞机通过低、中、高速滑过水中,反复实验看溅在发动机上的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在高速滑行时,我第一次遇到飞机刹车失灵,由于200A飞机具备负拉力,我把油门收到了最后,并拉至负拉力位置,飞机逐渐停下并开始倒退,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了飞机还能倒滑的感觉。

运七200A型飞机型号合格审定试飞与验证条款要求有九十余项,其中的失速特性、单发停车后继续起飞、

最小离地速度、最小操纵速度、失配平特性、颤振、自然结冰条件下飞行实验都属于技术难、风险较大的科目,所以飞行员必须在飞行中做好每一个动作,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确保飞机与人员的安全。我不但在本场飞行,还在外地机场飞行,并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机场飞行,一飞就是几个月。通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试飞任务。运七 200A 是获得 CCR—25 部国际认证的唯一国产运输机。

在历时五年的运七 200A 飞机试飞中,因试飞成绩突出,我荣立了航空工业总公司二等功(1999 年)、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二等功(1996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全飞行二等功(1997 年)。

1996 年 12 月,我驾驶运七 200A 飞机参加了珠海首届国际航空展览,并进行了试飞表演。1997 年 1 月,我赴老挝担任飞行检察官,在那里带飞,检查老挝飞行员的飞行情况,合格后我亲自向老挝飞行员签发了运七飞行驾驶证书。

五

1997 年 10 月,我们机组四人奉命赴非洲执行任务,配合中国航空总公司完成国产运输机和 K—8 飞机的展示活动,历时三十余天,总行程二万余公里,纵贯南北半球,往返于北起埃及南至莫桑比克之间,曾在埃及、沙特阿拉伯、厄里特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等九个国家的十六个机场降落,共飞行六十余小时。

非洲,乞力马扎罗山,海拔 5895 米,是非洲最高的山,它位于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的交界处。我们机组两次从它上面飞过,美丽的热带风光、壮观的维多利亚大瀑布、世界第一大坝——阿斯旺水坝,都在我们的机翼下闪过。期间有两次飞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某日,航线:阿斯马拉——亚得斯亚贝巴。没想到赤道高原的天是这样变化异常。起飞的时候还是万里无云,但还不到半个小时云就起来了,越来越多,最后飞机完全进入云中,飞机颠簸得越来越厉害,我和老李及时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结冰区。通信员小李报告前方降落场所有的助航设备都已关闭,而且沙特的民航机也已返航。怎么办?大家商议后根据多方条件,我和老李果断地决定:“按计划飞”。但是飞机结冰越来越严重,飞行速度越来越慢。此时通信员小李迅速与起飞机场取得联系,并请示上级航管部门要求改变航线直飞目的地。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终于传来地面指令:可以按新航线飞行。我们迅速改变航向,并根据雷达的指示脱离了结冰层,按卫星导航系统再次确认新航线,飞向降落场位置,安全地完成了这次飞行任务。

某日,航线:达累斯萨拉姆——楠扑拉。楠扑拉是莫桑比克北部小城,位于东非高原,由于历年的国内战乱,该城市正在重建中,我们的到来给当地带来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

当我们的飞机在民航系统的调配与指挥下,安全降落后,正准备加油和办理过境手续时,感到气氛有些异

常。首先得到通知不能起飞,暂时扣留,接着数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将我们两架飞机的人员软禁在停机坪上,随后又有当地记者扛着摄像机要忙于拍摄,想必是把我们当成了非法入境者。说来也难怪,一架涂有迷彩色的中型运输机和一架极象战斗机且机翼下挂着小型副油箱的教练机的突然降临,的确给未得到通知的军方以震惊。

当然这是一场误会,我们的行动在数月前就得到该国的核准,只是具体的降落时间民航系统未通知军方。误会解除了,成了朋友。数日后,我们又回到了莫桑比克楠扑拉小城,军方派出一名少校军官陪同我们参观市容,介绍民情,帮助办理出入境手续,真象到了朋友家。

六

1997年,我被任命为飞行二大队大队长,在试飞任务较重的情况下,又挑起了理论训练和行政管理的重担,我把培养重点放在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身上,对他们严格要求、加倍关心,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2000年3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闭幕,我和其他两名试飞员一起驾驶我国国产飞机新舟60赴北京进行飞行表演,在南苑机场我亲自指挥和实施了这场飞行表演。因为这次乘坐飞机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等国家领导人及各部委领导,责任重大。由于我们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表演非常成功,得到中央首长的好评。

在运七系列各种型号飞机的出厂试飞中,我完成了

七十多架次的出厂试飞任务,并且为部队和各航空公司培养带飞出一批批飞行员,他们现已工作在祖国各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授予我领导的飞行大队集体三等功,1996年、1998年两次授予我三等功。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人年龄一大想得就会多,许多年轻时意识不到的问题,现在都会去考虑,想为自己今后做个打算。近几年,中飞和贵阳、济南等几家航空公司,都找到我,想让我去为他们干事业,并提出了很多诱人的条件,尤其是济南航空公司,离家乡高唐又近,回家方便,我也曾动过心,但这只是一个念头而已。我心中对试飞事业的执着追求在强烈地呼唤着我,我还是钟情于试飞,依然忙碌在试飞战线上。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科学技术无止境。我们完成一项重要试飞任务,接着又要接受另一项新的任务。十月初,我又要带队去东北某机场执行一项重要的科研试飞项目,海上试飞,又是几个月……

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心感满足和欣慰,无愧于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高唐的父老乡亲。

2002年9月25日

故土乡情 育我成人

金华涛

高唐是我的故乡,是我终生魂牵梦绕的老家。1952年我出生在高唐县城西北梁村镇谷官屯村。五十年代初期因父亲的工作关系,我随父母迁入高唐县城内居住,并一直在高唐县城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72年高中毕业后在高唐当过工人,也下过乡做过农民,可以说我在高唐度过了整整二十年的青少年时光。

1973年我考入青岛化工学院,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聊城地区化工厂,曾在化工厂任团委副书记。1978年调入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三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我的军工科研生涯。在五三研究所工作期间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科研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和国家重点武器装备项目行政副总指挥等职。1997年为推动军转民工作,我受五三所委托出任山东金珠粉末注射制造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时光如梭,转眼我离开高唐已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人生最美好的三十年里,我上过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多年军工科研工作,成长为一名国防科研单位的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我曾经主持过某些军工项目的科研工作,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两项;也多次参与组织了国家重点武器产品的开发试制任务,获兵器工

业部级成果奖励两项；特别是我有幸直接参与了国庆三十五周年、五十周年两次阅兵重点型号武器的科研、生产组织工作，为壮我国威、军威贡献了我微薄的力量，并受到国防科工委的表彰奖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受命负责对俄军工技术引进工作，现已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我曾多次被评为五三所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1996年又被国防科工委授予国防科研先进管理工作者荣誉称号，并颁发金鹰奖一项。

近几年，为响应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保军转民，发展经济”的号召，我又率先创办企业，成立了山东金珠粉末注射制造有限公司，把军工科研成果成功地推向了产业化。目前，山东金珠粉末注射制造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万元资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在为国防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领导和山东省、济南市政府领导曾多次对我们的创业精神和业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三十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三十年的奋斗更使我感到充实和自豪。回想我这三十年的人生历程，如果说自己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一些成绩的话，那么，首先应该归功于高唐县人民对我的培养。我出生在高唐，成长在高唐，即使是在我离开高唐以后我也坚持每年回高唐。几十年来让我体会最深的是由于我特殊的家庭历史背景，使我始终受到高唐县诸多老同志的关心、父老乡亲们的关注和朋友、亲人们的热情鼓励。记得高唐一位资深的老同志曾经深情地对我说过：“华涛，将来你不管走到哪

里,也不管你的工作、生活有多大变化,你都不应该忘了高唐,因为在高唐这块土地上有你祖辈的鲜血、父辈的汗水,还有你个人前二十年的喜怒哀乐。”是啊,我不应该忘了高唐,是高唐的父老乡亲哺育我成长,是高唐诸位优秀的老师教育我成人,是高唐的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给予我的家庭以崇高的政治荣誉和生活待遇。

我热爱故乡高唐,热爱高唐县的父老乡亲,更留恋那里令我终生不忘的亲朋好友。许多年以来,每当我回忆起在高唐的那段生活经历,总会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城镇计划供应粮食少,我们全家也难以填饱肚子,但却有不少乡亲曾不止一次地给我家送来三斤、五斤粮食,以接济我们生活上的困难,区区三五斤粮食现在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那可是乡亲们忍饥挨饿一口一口从自己嘴中节省下的救命的粮食啊!特别更使我难忘记的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我的父亲金维城曾一度受到错误的批判,高唐县仍有那么多的干部和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为我父亲伸张正义鸣不平,老百姓多次保护了我的父亲,并且采取各种方式对我和我的家庭表示支持和帮助。这在当时那种派性十足、斗争异常残酷的年代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父亲曾为此深受感动地对我说过:“我们县的人民群众真好,中国的老百姓要求并不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你只要为老百姓干一点实事,老百姓就会记你一辈子。将来你长大了,可一定要为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多干实事。”由于“文革”运动的摧残,父亲在1977年身患绝症,他病重

在北京、高唐住院期间，我亲眼看到父亲的那些老战友、老同志和他多年的老部下一次次深情的探视，多方联系，想尽一切办法治疗和减轻父亲的痛苦，这种战友情同志谊是那样的崇高和纯真，它在我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更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在2000年高唐一中庆祝建校七十五周年的大会上，师生们写出了“怎能忘记金石兰校长为革命血染校园，怎能忘记金维城校长创业率先垂范”的诗句。我没有想到在我家两位老人分别去世七十四年和二十五年以后的今天，高唐人民还能如此深情地纪念缅怀他们。由此，我又想起去年十月份我在高唐遇到的感人一幕。那时我去烈士陵园扫墓，我在距烈士陵园不远的一个小卖店里购买花圈，当我要求店主人写挽联时，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三十多岁的店主人一听说我这花圈是献给金石兰、金谷兰、金维城、金维泉等几位先人的，当即就把四十元钱退还给我，并说：“你家的这几位老人都是我们高唐的功臣，我们从小就常听老人们说起过，你给他们送花圈，这钱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收”。父亲说得对，多么好的人民群众啊，我为我的先辈亲人们感到欣慰，同时，我也由此受到更加真切的教育和鼓舞，它已成为时刻激励我成长、鼓舞我工作的巨大动力。今天高唐县政协文史科的同志约我写篇文章，要求我介绍一下我的工作业绩，我想如果我三十年来有一点工作成绩的话，那首先应该是高唐人民培养教育的结果。还是那句话：故土乡情，育我成长。我感谢高唐的党组织和政府，感谢高唐人民。

高唐人民质朴、勤劳，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精神，高唐县是我们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高唐人民曾经为中国的革命做出过英勇的牺牲和贡献，高唐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好学上进，具有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唐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创新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高唐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身在外地的高唐游子，我每次回到高唐，都能不断地亲身感受到故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近几年，高唐变大了、变美了，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了。就连过去土生土长的乡亲们现在也变得具有现代人的精、气、神儿了。总之，高唐县的一切的确是今非昔比，令世人刮目相看了。作为高唐人民的一分子，我为高唐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欢欣鼓舞。衷心地祝愿高唐人民在新的世纪里创造出新的更加辉煌的业绩，父老乡亲们生活得更加安康、幸福。

谨以此文，略表心迹。感谢高唐人民的培养和厚爱。

潮 头 创 业 者

——记内蒙古北方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方庆

郑 宽 亭

1963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刚过，国力难支、家徒四壁之时，程方庆在山东省高唐县杨屯乡三里村一农民家庭中出世了。他来这个世界第一眼看到的是穷困和无奈。二十多年过去了，生活的艰辛和良好的家教将程方庆磨砺成一块好钢，使其具备了刚强不屈、奋发向上、爱国爱乡的高尚品格。

一 坎坷学涯路

程方庆聪慧敏捷，七岁那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中，他踏进了以“语录”为主课的小学大门。从背“语录”、写“语录”开始，他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读写，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时期便显现出“不服输”的坚毅性格，值日，地要扫得比别人干净；赛跑，要在别人前头；就是每天上学也要第一个进入校门。小学四年他年年是三好学生。升入以劳动为主要教材的初级中学后，“文革”还在进行，教育仍然是重灾区。程方庆继续走在坎坷的求学路上。初中课程不全开，劳动是主课。拔草、锄地、拾残棉，样样农活程方庆都领先，被师生推为班级劳动委员。

他当劳动委员后,班级劳动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名。“只有一次评比有风波。”当年的同班同学、班长程家林回忆起了那件事。那是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全校师生为生产队平整土地,由于分得的任务比其他班难度大,故在完工评比时班级被评为第二名。大队人马收工回校了,程方庆动员全班同学留在工地返工再干。他说:“我们被评为第二是因为活没干好,质量没达到要求,我们不为争第一,必须依照标准把活干好,达到第一的水平。”此举惊动了校长和其他班级的干部,他们返回工地时,程方庆和同学们已将耕地重新平整一遍,超标准完成了任务。校长提议将第一名的荣誉给了程方庆所在班级。

程方庆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唐县的最高学府——高唐第一中学。由于“文革”的干扰,教学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教学秩序被打乱,学生学不到系统的知识。程方庆虽然在小学和初级中学成绩名列前茅,但距教学大纲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所以“文革”结束教育步入正规后,他在一中刻苦学习拼搏三年,成绩也只能从下游进入中等,再从中等进入“前三帮”,尽了全力也没达到“名列前茅”的目标,毕业后无缘进入大学校门,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读高中的三年中,他以品德高尚和学习进步快而赢得了师生的赞许,一直被推选为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关心同学,自己当时十分贫困,还想尽办法节省,先后以钱物支援了班内三个同学,使其没有辍学。他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组织同学们学政治、学时事,使全班同学政治素

质有所提高。他在组织团员活动和培养入团对象、发展新团员等方面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模范团干部。他团结同学,从没与同学吵嘴争斗,更没有受社会影响拉帮结派闹矛盾,同学们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

1980年高中毕业后,通过熟人介绍他在本乡张四屯农业中学任教师,他备课充分,上课认真,教学成绩突出,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二 创业六部曲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程方庆的心扉。1986年,借暑假之机,他打算出去看看,到外闯闯。经过反复思考认真分析,避开人才南下的流向,北上内蒙呼和浩特,进行打工调研。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搞建筑机械从市场情况到发展前景在内蒙大有可为,呼和浩特是创业者的用武之地,他下决心要在此大干一场。1986年底,他毅然辞去了收入虽不丰厚但还算安逸稳定的教师工作,怀揣一百八十五元人民币只身到呼和浩特开始创业。当时人地两生,无关系,没靠山,只有一股闯劲和不满足的人生追求。他克服种种困难,打开了素不相识的人际关系,利用呼市建设项目遍地开花,建筑机械配件俏销售的好商机,在当地党政部门及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从北京、河北、山西等地购进建筑机械配件,在呼市搞推销。程方庆的身份由打工者变成了销售商,这是他创业的第一部曲。

1991年,程方庆有了点积蓄,便承包了内蒙冶金建设公司服务公司门市部,注册资金三万元。开始有了自己

固定的经营场所,他的身份成了门市部经理,这是他创业的第二部曲。

1991年,国家出台了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程方庆成立了呼和浩特市北方建筑设备材料公司,注册资金四十万元,员工五人,他是公司经理。这是他创业的第三部曲。

1993年,《公司法》颁布施行。此时程方庆的公司注册资金已达一百万元,职工增加到十五人,企业规模扩大了,公司又被山东方园集团和江苏扬州机械厂聘为内蒙总代理。在呼市程方庆已是小有名气的私企老板了,这是他创业的第四部曲。

1997年,随着呼和浩特市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程方庆的经营业务向加工、维修、经销、租赁和制造为一体的方向发展。产品由原来的提升机增加了钢模板、砂浆搅拌机等十几种新产品。他最先进入金川开发区,投资四百八十万元,置地四十余亩,建成 5200m^2 的生产车间和 2600m^2 的办公大楼,安装了八百万元的生产设备。公司注册资金达到一千万元,更名为北方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程方庆为总经理。这是他创业的第五部曲。

2000年,程方庆任北方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减少或避免重大问题的决策失误,公司成立了董事会,同时为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先后从浙江、杭州重金聘请全国著名建机专家任公司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从四川和军工企业聘请七名技术员,充实生产一线。还从内蒙工业大学

等大专院校和人才市场招来硕士生、本科生、大中专学历的经济、技术管理人员五十多名,改变了原来员工队伍的知识结构。现在企业内部既有知识渊博的建机专家,又有技术精湛的一线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生产管理人员。随着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善,生产得到飞快发展。2002年,企业规模再度扩大,他在金山开发区征地二百多亩,开始建设北方工业园。北方公司现已是拥有四个分公司,二百多名员工,四千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年收入五千万元的跨行业跨地区的中型企业,十余种产品远销京、津、晋、鲁、陕、新疆和东北各省,提升机还出口蒙古国,生产规模、年销售额、经济效益、上缴利税、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指标连年居内蒙古自治区同行业之首。这是程方庆创业的第六部曲。

三 耿耿故乡情

程方庆到达呼和浩特市后,便把这方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自己富了,没忘回报社会,尽自己所能,替呼市人民着想,为呼市领导分忧,除依法及时缴足利税外,还为社会教育等公益事业捐资。他为古锡盟东苏旗十七名失学儿童每年捐资一万一千元支持他们求学,直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在企业中创造就业岗位,先后安排呼市待业人员一百零六名,下岗工人四十八名,吸纳大专院校毕业生七十六人。并为一线职工办了人身安全保险,为部分职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为改善市民生活和社会安定做出了贡献。

他心系家乡高唐。高唐一中七十五周年校庆时,百

忙中抽时间不远千里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探望老师和同学,并慷慨解囊为母校捐资一万元。

对生他养他的三里村和邻里乡亲更是念念不忘。他的家庭是文明家庭,祖祖辈辈与乡亲和睦相处,从未有吵闹争斗之事。程方庆更是闻名遐迩的孝子,除对祖辈及父母尽孝道外,对村内的年迈、体衰、身残、弱智者特别关心。风雨天气挂着他们,逢年过节想着他们。

1996年夏,程方庆回家探亲。一天突降大雨,顷刻间大街雨水横流。他照例想起了那些老弱乡亲,与同乡程立山一起提起铁锹在如注的大雨中,沿街疏导水流,保护民房院落。尤其对那些宅基偏低、家无劳力的宅院特别关注。落汤鸡似的程方庆此时那还有大经理的形象!

每次回村,程方庆都有个不成文的程序,就是先登门拜访长辈和孤寡老人,给他们送点钱或物以表心情。村中老人程家农,常有精神不正常之时,老伴痴呆,无子女,生活极困难,这是程方庆每次回村必访之户,每访定要问寒问暖长谈一次,并给钱物帮其解决生活困难,每年春节年货都是由程方庆为他置办的。

随着企业的发展,程方庆先后从家乡招带了二十多人到他的企业中参加生产或管理。较高的报酬使这二十多个家庭提前进入小康生活,其中四户已拥有轿车,过上了超小康的生活。

近几年程方庆先后出资近三十万元解决了全村吃水难和走路难的问题,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三里村祖祖辈辈吃苦水。全村没有一眼甜水井,欲

吃甜水就要东到林寨或北上高庄去挑,吃喝用水成了三里村村民的负担。为此,不少本村姑娘愿外嫁,外村姑娘不敢来。程方庆自懂事时起便暗下决心:长大有了本事一定让三里村有口甜水井。1995年,他手头刚有一点积蓄,便出资七千元,在村里打了有史以来的第一眼浅水井。由于出水量太少,便带领乡亲在井附近挖一水库,将村内雨水雪水导入其中,为井补源。此计效果可以,井水基本满足了需要。但遇天旱无雨或附近深井抽水时,便库干井枯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2001年程方庆出资十三万元,由水利局勘探并凿了三百多米深的机井,成功地找到地下甜水。继而安装了抽水、输水、控水设备,将甜水送往每家的缸口锅头,全村人吃上了卫生甘甜的自来水。

三里村人自古以来就走着晴天一脸土、雨天两脚泥的土路。2002年春程方庆又投资十万多元,并运来搅拌机、大平板震动器、压路碾、铁轨等修路机械设备,组织乡亲将全村总长两千多米的南北、东西街道修成宽敞、平整的水泥路,并与村外的柏油路相连接。现在无论雨雪再大,三里村都不存在走路难的问题了。

程方庆对呼和浩特市、对家乡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高唐人民不会忘记,他的功德碑永立在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心中;呼和浩特市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将他推选为市政协委员,并授予他“十大优秀务工青年”的荣誉称号。

程方庆与时俱进,从不自满,注意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他先后学习了有关建机等方面的理论,又系统地学习

了工商管理(MBA)知识,已经着手改革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模式,分三期投资五千万元的北方工业园已经起步。相信“北方”的未来在程方庆“以人为本、德技双馨、造福社会”的经营理念和“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企业精神指导下,会更加辉煌。

后 记

为本辑资料的征集给予支持的有：

各乡镇分管政协工作的副书记王哲俊、张德印、赵吉生、李希军、徐启静、于汝华、赵洪志、魏合祥、王旭升、范永青；

党史办主任张金洪；

史志办主任焦祥田；

工商联副主任刘希福；

对台办副主任刘玉洁；

还有吴光中、于兰、高加星、吴鹏辉、李春跃等同志。

顺致谢意！

政协文史科
2002年12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高唐文史资料 第 1 5 辑 海内外高唐人专辑

作者 =

页数 = 2 3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9 2 0 7 9 9 6 8